
穿越幽谷

刘扬芬 著



非卖品* 欢迎翻印

未经同意，不可任意删改内容

目 录

一	我的祖父、父亲与美国宣教士	2
二	恩主呼召我的父亲建教会	4
三	笃信基督贤惠的母亲	6
四	九岁逃走南洋未成	12
五	南洋求学谋生五年	14
六	回国求学归家信主	17
七	福建协和大学四年	29
八	组织家庭	38
九	任闽清联合中学校长五年	40
十	拒绝神第一次呼召	47
十一	福州协和医院代院长一年	53
十二	在美国留学两年的日子	59
十三	在中国大陆三十六年的牧师生涯	71
十四	“文革”十年和“拨乱反正”三年	90
	1. 破四旧、抄家、游街示众、监督劳动	90
	2. 清理阶级队伍	98
	3. 强迫送往闽北山区监督劳动的艰难岁月	102
十五	我妻子起死回生	107
十六	我们所信的主是轻慢不得的	109
十七	我的软弱	112
十八	“文革”浩劫结束、教会恢复礼拜活动	115
十九	“三自会”是执政当局管理和控制教会的机构	123
二十	“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	126
二十一	帮补受迫害肢体及困难家属计划	131
二十二	小女儿恢复美国公民身份，前往美国	133
二十三	泥牛入海，几经波折，我和太太获准移居美国	135
二十四	美国，我事奉道路新的开端	142
二十五	加拿大之行，失去爱妻	144
二十六	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147
二十七	我在纽约华埠卫理公会任义务牧师，建立福音站	150
二十八	东南亚福音之旅	152
二十九	创办纽约基督闽南教会	155
三十	创办纽约基督家庭教会	160
三十一	创立录音带福音小册子传道机构	162
三十二	纽约康宁大厦（团契）老人院传福音五年不间断	163
三十三	奉主的名祷告、医病和赶鬼的经历	167
三十四	基要派与现代派（不信派）的斗争	169
三十五	我的盼望	171
附录一	怀念主的使女、我的爱妻陈贞娟姐妹	175
附录二	传福音的经历和见证	183

自序



感謝讚美主的鴻恩大愛，使我在人生的第九十個年頭能夠充滿喜樂地來回憶我與主同行的歲月，我感恩的心情，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千言萬語只有一句話；“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

我自1985年2月來到美國，至今已有十九個年頭，我訪問了近二百家的教會，參加了講臺的事奉，我作為一個傳道人、一個主所差遣的人，能夠盡職盡忠傳講主的福音實在是出于神的大愛。

鑒于眾教會弟兄姐妹的要求，教會同工、親友及海內外一些認識我的人，希望我將幾十年來主在我和我全家人身上的恩典、聖靈帶領我經歷過死蔭幽谷的艱難歲月記錄下來，見證神的真實、和 的大能，神的無限的愛，留給后人，激勵后人。在這種情勢的催促下，我就禱告主，主也給了我證據，使我知道這是合乎的旨意，且讓我用講話錄音的形式記錄下來，由我的孩子以及我的同工弟兄整理成這本小冊子，與各位愛主的肢體分享。

既然是見證，那所記錄的必定是我及我的家人親身經歷過的，真實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實。我所走過的這九十年的歲月，見證了我們這一代傳道人跟隨主同行的腳踪，每一個穿行在死蔭幽谷的腳印，都充滿了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和神的慈愛。為此，我必須從我家最初信主得救的祖先談起，一直談到我來美國所走過的事奉道路。

我真心感謝主給我留下這樣清晰的記憶，使我能夠靠着聖靈的引導，說出我的見證，特別感謝吳恩溥老牧師的指導和鼓勵，黃得恩老弟兄的閱飾與校正。也感謝眾弟兄姐妹及兒女的代禱。相信主必報答。但願榮耀，尊貴，讚美都歸至高的父神和寶座上的羔羊，直至永遠！

主 劉揚芬

2004夏于紐約寓所

一. 我祖父、父亲与 美国宣教士



先父劉作源牧師

我家的祖居地是在福建省闽清县六都镇。我的曾祖父是清朝有名的武举人，他有七个孩子，我的祖父是第五个孩子。祖父念了几年的私塾，也学作中医。在他做中医、教书很有名望时，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他也是医生，名叫 Dr. Site，来到我们的村镇，他和他的夫人租我祖父所住的院落里，一边行医，一边传道。Dr.Site 夫妇来到我们村镇的时候，当地没有诊所、医院，所以他们每天一个背着药箱和看病的器具，另一个背着一个布袋，布袋里有个装着几隻昆虫的瓶子，另外还带了一些

晒乾的树叶和一根棍子。到了街上，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吹单簧管，唱诗歌，这样先是街上的孩子围到他们跟前，随后大人们也都围了过来。多数的人是要来叫他看病的，因为他看病从来不收钱、药也不收钱。这样看病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传道、做见证。他们就拿出预备好的两三幅图画，上面写着圣经的话语。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还有一些写着信耶稣好处的简单易懂道理的单张，分发给路人，讲解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就在地上画一个小圆圈，将乾树叶圆圈摆好，洒上酒精，又将瓶子里的昆虫倒在圆圈当中，点着火，圆圈当中受热烘烤的昆虫，痛苦难当，到处乱闯，濒临死亡，这时他就用木棍把昆虫一个个挑出来，放到瓶子

里。接着他就说，我们人得救就像这昆虫，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主耶稣就会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这种形象的表演和传道，使在场的路人听得容易明白。Dr. Site 夫妇非常热心爱主，但是，那时我们村镇的老百姓相当迷信，信奉佛教，供奉儒教。我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是尊崇孔子的儒教学说。开始 Dr. Site 夫妇在他们身上花了许多功夫，劝他们要信靠天上的真神，可是收效不大。但是时间长了，我祖父、父亲慢慢地就被这对来自异国夫妇真诚的行为、和蔼的态度、热心助人的精神所打动，他们在谈论这对异国夫妇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敬意，同时也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位这样的真神，这对夫妇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一次 Dr. Site 出去佈道，进来一帮反对他的歹人，把他家门口的水井用烂石头填满。他回家不能用水，于是就到邻居家去挑水喝，又花钱雇人把水井的石头取出，没有一点怨叹。后来又有一次，他正在街上向一些人传道，突然闯进几个人，用粪便往他身上泼，他没有震怒，却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默默地回家去洗澡换衣服。第二天，他仍然继续在那个街道上传道。在福州的外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提出要向领事馆报告，向满清政府交涉，因为外国宣教士是受治外法权保护的。可是 Dr. Site 却对他们说，我是为主的缘故受苦，这是我个人的事，那些人的举动，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原谅他们。这许多的事情对我的祖父、父亲震动很大，他们的心里对这对异国的宣教士夫妇，从疑惑转为信任，继而敬佩和认同。不久，在 Dr. Site 夫妇的带领下，我祖父、父亲都接受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位真神。当时，一起相信的还有我的堂伯父刘作金和另外的两个同乡。祖父、父亲得救重生后，一直很热心。祖父一面行医，一面与刘作金伯父一起研读圣经。这以后，他们为了会友的聚会做礼拜有一个合适的场所，积极奔走筹备了几年，在村里建起了一座礼拜堂，叫做“基督堂”。

二．恩主呼召我的父亲建教会

我的祖父有四个男孩，一个女孩，我父亲是最大的孩子。祖父、父亲信主以后，常给孩子做见证。父亲是满清的秀才，在乡下也算是有地位的人。他一方面教私塾，又要做乡绅，信主对他的社会地位是有妨碍的。也是Dr. Site 夫妇的爱心和热心的感化，使他成了基督徒。说起他的信主，实在不容易。有一天，Dr. Site 在街上遇见我父亲，他恳求我的父亲说，可以不可以我们今天一起跪在这里，求圣灵感动，让你今天接受相信主耶稣。我父亲不知是圣灵的感动还是在他的恳求下感动了，真的跪了下来。这个“跪”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一个秀才，一个儒教的信徒，与外国人、一个洋教徒当街跪在一起，旁若无人，在那里祷告，尴尬情况可想而知。当时街上围观好奇的人，嗤笑的、说闲话的、攻击毁谤的都有，但圣灵确实感动了我的父亲，就是这一天，他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从此以后，Dr. Site 夫妇请我父亲教他们中文，我父亲便一边教书，一边跟着Dr. Site 夫妇学习圣经和福音真理知识。

Dr. Site 夫妇很用心教导我父亲，当时没有神学学校，可是在他们夫妇悉心培养下，有两三年的时间，父亲勤奋研读圣经、阅读很多灵修书籍，掌握了许多神学的知识和道理。有一天，主呼召他出来当传道，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场争战，多数人不理解他，一个私塾教师成了基督徒以后，又要做传道，许多人攻击讥笑他，看不起他，甚至他的学生都避开他。但是主的灵却更坚定了他的选择，他踏上了传道的路途。他先后在闽北的南平、尤溪、沙县、永安四个县开展他的传道工作。这四个县的人口共有28万之多。一百多年前，这些地方交通很不方便，连接村镇的只有崎岖的山路和田间小径，只能靠两条腿不停地奔走。在我父亲的辛勤努力下，他在那几个县建立了8个教会。就这样，我父亲艰苦传道了10年，由于过度劳累和

恶劣的生活条件，在我刚满周岁不久，父亲就被主接走了。留下了一贫如洗的家庭和四男三女（最大的只有十四岁，最小的还是遗腹子）给我的母亲。



三．笃信基督的贤慧母亲

我的母亲是乡下人，文盲而且缠足。她比我父亲小两岁。嫁给父亲后，父亲常给她讲解福音的道理，不久她也信主了，而且解开了缠足，之后她又跟着外国宣教士学习罗马字拼音，能够阅读罗马字拼音的福州话圣经。母亲原本就是一个贤慧的乡村妇女，信主成了基督徒以后，在父亲的教导下，成了一个称职的牧师娘。父亲去世后，整个家庭生活的重担就落在她的肩上，家境的贫寒、幼小未成年的孩子们，没有压垮她、也没有削弱她对主的信心。感谢赞美主，靠着信心和盼望，一家人省吃俭用，靠着她夜以继日地手工做布鞋，拿到县城卖钱维持家庭的生计。母亲竭尽全力抚养七个孩子，而且她还要我们读书上学。那时我们弟兄姐妹七个小孩先后在教会办的小学里读书。母亲的勤劳节俭、待人朴实大方在我们幼小的心里扎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次，已经是夜里两点多钟了，我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了，原来是母亲跪着祷告的抽泣的声音，微弱的煤油灯光下，一只未完成的手工布鞋放在母亲的身边。我用手拉着母亲说：“妈妈，时间晚了，睡吧。”母亲就是这样勤劳操持着、生活着，但是她时刻没有忘记事奉主、爱主。感谢讚美主，那时的教会没有养老金，但是有一种补助金是给牧师、传道的遗属。因而，每三个月母亲都会从教会领到补助金，这些钱对母亲来说非常宝贵，是一家维持生计的养生钱。但她还是不忘奉献，每次领到钱加上卖鞋得来的钱，她都要奉献十分之一出来。有人对她说，你家庭生活这么艰难，何必这样呢？母亲笑着说，我所得来的，都是神的恩典，我应该要奉献给主和祂的教会。这正如林后8：2所说的那样“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父亲离世前不久，又来了一个女宣教士，叫 Ms. Rose Mace，她真是一个有生命有爱心的宣教士。她在我们那里办了一个女学校，

传福音。她曾经与我父亲同工过一段时间。在我父亲尚未离世前，她来看我父亲，父亲恳切地对她说，Ms. Mace，主就要接我去了，我现在把我的三个女孩子托付给你，请你帮助她们。这位女宣教士Mace欣然接受了。在她的安排下，我家的三个姐妹都受到了中等教育：一个在普通中学，一个在幼稚师范学校，还有一个在护士学校。有这样一个有爱心的外国传教士培养我家的三个姐妹，这真是神的恩典。Miss Mace 不但培养我家的三姐妹，她还培养许许多多的青年基督徒。Miss Mace 办的学校离我家来回要走路一个半小时，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她总是要来看望我妈和别的几个孤儿，她必为我们祷告、读圣经。我印象最深的事，她常常读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祂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后来她还在福州兴办了女子神学校，凡是由女子神学校出来当传道人的，基要信仰纯正虔诚。中共统治大陆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许多人离弃了主、出卖了主和祂的教会，但女神学校培养出来的女传道，没有一位离开主。Miss Mace 在中国的事奉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我大姐高中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小学教书，开始有了收入，虽然工资不高，但她节约殷勤、任劳任怨，减轻了我母亲的压力和经济负担。

我母亲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她的宽容和忍耐，她忍受着难言的精神压力和心中的痛苦。这个精神的压力和痛苦是来自我的堂叔和我的大哥和二哥。我堂叔是个游手好闲、嗜赌如命的人，他常常逼着我母亲给他钱，甚至要将我家祖传的家具搬走。乡间的长辈于心不忍，就会让乡丁把他抓走。反过来他又求我母亲保他出来，我母亲总是这样常常保他出来，总是希望用基督的爱和宽容来感化他。我大哥和二哥十几岁就跟随一位叔父当兵去了。可是两年以后他们却把兵痞的习气带回家里，对我母亲都是恶语相向，令我母亲伤心、忧虑，心中痛苦。后来我的两个哥哥都跑到南洋去了。幸好我的三哥努力向上，用功念书，高中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以后又到南京金陵神学院念了两年多。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到家乡在教会的小学任校长，又在初中任

代理校长，还在县城任宗教教育干事。我三哥、三嫂对我们家的贡献很大，我母亲都是他们在照顾着，因为我们几个都是离家工作、生活的。我们家的三姐妹给我母亲很大的安慰，因为从小家境贫寒，养成她们节俭、勤劳、待人和善有礼貌，持守信仰热心爱主。我大姐嫁给一个侨生，这个侨生姐夫是个很好的人，以后的二十多年，大姐、大姐夫对家庭经济有很大的支持。

有两件事情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可以说明我母亲操持家庭的艰难状况。那是一个久旱无雨的秋天，农民们没有收成，有钱都很难买到粮食。我们家几个人花了一天的时间分头去找粮食，都没有找到。天黑的时候，母亲拿了一个米袋，带着钱领着我跑到我一个婶婶的家里。我婶婶家道富裕。我叔叔曾由我父亲培养到南平学医，毕业后在医院和军队工作，因而有钱也有粮食。想不到婶婶竟不卖粮食给我们。我母亲说我们跑了一整天，到处买不到粮食，难道你要看我们一家老小挨饿吗？可是婶婶就是不理我们，还气势汹汹的说，我不卖给你又怎么样？我跟在母亲身后，心如刀割。母亲哭了，我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妈，我们回家吧。我母亲含着眼泪带着我到很远的小街买了一些面乾、加上野菜煮了给一家人充饥。又有一次，家里揭不开锅了，走投无路，母亲带着我回娘家去找她的哥哥和她的一个做生意的堂弟。路途有五十多里，我们沿途向路边人家讨水，配上家里带的乾粮充饥，走了一整天才到舅舅家里，舅舅家也不宽裕，他拿了地瓜米饭、咸菜招待我们，我们吃的真是津津有味。我们拿了一些舅舅给的杂粮，回到家已是半夜了。这些经历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促使我从小就考虑如何去求生存，也促使我萌生了逃离家乡下南洋的念头。

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我母亲仍然辛勤地劳作，节俭持家，充满了虔诚的信心仰望主。幸好我的母亲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到了70岁时才患了胆石症，痛起来很厉害，按理应该手术，但医院考虑她的年龄，和当时的医疗条件，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靠着神的恩典又借助我三哥大儿子的中西医的治疗，我母亲又活了28年。我母亲92岁时

一次病危，那时我为主的缘故正在山区“劳改”，是犯人，不能随便离开的。我收到了三哥的电报，说母亲十三天卧床，昏迷了，不久于人世，要我速回。我拿了电报去找当时的“人民公社”书记，一路上祷告着，求主让我在这个书记面前蒙恩。到了那里，看见书记脸色阴沉，我的心怦怦地跳，对我这个犯人，书记理都不理我。我只好鼓起勇气对他说：郑书记，……刚开口，他就大声呵斥：什么事？我说：家里来电报，他又大声说：你给我念出来。我念了电报，他责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回答：应该是真的，我母亲已经九十二岁了，她患病20多年了。他又问：你要请假多久？我答：因要安排后事，恐怕要一个月。他迟疑了很久，才说：好吧，给你一个月，你务必要按时回来。我满心感谢赞美主走出来，匆匆整理行装，随后赶往公路边等待。想拦住过往的货车，等了好久，我拦住一辆运送木材的货车，央求司机带我到100多公里外的火车站，司机见我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很同情我，就带上我。一路上我滴水未进，日夜兼程赶回老家，来到母亲跟前我已泣不成声。回想我父亲去世后，几十年母亲是那样辛苦和艰难，母亲又是何等刚强敬畏主，又想到我自己几十年蒙召成为基督的僕人，今天竟是以犯人的身份来看望母亲，这许许多多坎坷的经历，令我泪流不止。我不禁跪地呼求我的主：“主耶稣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能力，求你赐给我们吧，让我们在你那里得安慰得喜乐，得能力。”看到母亲不能说话、昏迷不醒，我就祷告主“主啊，若是你的旨意，求你医治我的母亲。”我祷告了很久，累了就睡去了。我在梦中忽然看见我自己又接到了电报，回家由后门走到前门，在大厅见到母亲的棺木，有鲜花，有蜡烛，亲人们都在哭。我又看见棺木只有三分之二长，棺木里没有我的母亲，我心里暗中感谢主：母亲这次不会死。天亮了，医生来看母亲，亲友来探望我母亲，我满有信心对他们说：母亲不会死。众人都笑我有点神经失常了，老人病到这种程度，怎么会不死？我便对他们说了我昨夜的梦，我说，本来母亲会死，但主恩待她，医治了她，留她活命。众人背后都讥笑我，不相信我。但我心里很平静，很安慰，相信主听了我

的祷告。那天我一直守在母亲的身旁，中午母亲体温又升高了一度，还在输液，到了傍晚，再测体温，恢复了正常。由于我在劳改的这些年，被迫行医，有了一定的医疗经验，看母亲的症状，像是疟疾，便给母亲服用奎宁。第二天中午，母亲烧退了，第三天母亲睁开了眼睛要喝水。就这样，母亲服用奎宁，一天天好转。我每天用米汤、鸡蛋和好的酱油喂她，再加上奶粉、葡萄糖、水果等调养她有一个月，母亲便能起床了。这时，我妻子从劳改地给我发了电报，催我赶快回去，不然当地政府要处罚我了。我只好含泪告别母亲。感谢赞美主！母亲九十五岁时，国内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化，“四人帮”倒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这些犯人，也已得以释放回到福州。我的二姐、二姐夫回国探亲，我们就一起为母亲祝寿，祝寿仪式热闹喜乐，充满了神的恩典。二姐夫说，等母亲一百岁时再回来为老人家祝寿。

母亲是九十八岁时离世的。很奇妙，她自己知道主在什么时候接她回家。1980年春节正月初一早上，按风俗习惯，大家吃太平线面，即长寿面。母亲对三哥的几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说，今年你们要留意，一旦收到电报就要赶回来。她的意思是，自己去世时打电报大家要回来。我三哥便笑着对母亲说，今天是正月初一，要说吉利的话，你怎么说这种话！母亲微笑不答。当时母亲的身体还是很健康的，她却预知自己将离世。三月的一天，母亲吃过午饭，躺下时感觉身体不适，当即通知在外乡当中学的教务主任的侄儿赶回来为老人家输液，但一直输不进去，大家明白主要接老人家回去了。母亲神志尚清醒，她请三嫂把二十多年前准备好的每一件都绣有十字架的衣裤、床单等拿出来，为她洗过澡再穿上。我的三嫂、侄儿和赶来探望的信徒们一同在她的床边唱她所喜欢的三首歌：《任遭何事不要惧怕》，《唯独耶稣》，《仰望我家乡在那边》。唱着唱着，母亲的脸色十分安详，仿佛发光，眼睛仰望天上，欢欢喜喜让主接她回家了。三哥打电报给我，当天我还在僻远的另一个山村没有汽车，幸好侨务部门的支持，派专车送我回到老家。按当地的习俗，人死后，当天要放进棺木并盖上。家人一直在等着我，因为母亲九十八岁高龄，算是乡间的女族

长，又是侨眷，各方都很重视，来了很多人。

晚上我到家，母亲已放在棺木中，我用手抚摸母亲的脸，我祷告、我流泪，我想到主的恩典，主的爱在我们家里是何等的浩大：父亲四十二岁离世，我母亲活到九十八岁，主让她平平安安地离开。全体在场的亲友、许多基督徒都陪着我流泪、感恩祷告。随后，棺木盖上了。第二天，我的妹妹、妹夫，我的妻子和大孩子也从福州赶到了，为母亲送葬的有两百多人，算是很热闹、盛大了。我的祖屋很大，可以容纳二、三百人，就在那里为母亲举行了盖棺礼拜和安葬后的追思礼拜。为了教会的事工，第二天我就携妻子、孩子先回福州去了。母亲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个美好的结束，是充满了盼望的结束。母亲的一生见证了神的大能、怜悯、慈爱和恩典。感谢赞美主，母亲给我们留下的是基督徒的财富——信心和盼望。正如圣经歌罗西书1：4-5 说的那样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四. 九岁逃走南洋未成

我家庭极度的贫穷，母亲的辛劳与艰苦，刺激了我幼小的心灵，那时就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动力在我心中滋长着。虽然我还没有清楚认识天上的神，还没有完全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但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自小就随母亲在教会做礼拜，又在教会学校念书，我也懂得了依靠祷告。家里遇到困难，没有饭吃了，我常常跑到野外，眼睛向上，流泪请求天父一定要拯救我的家人。我祷告说，父亲做牧师，为了祢劳苦，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困难的光景。我相信主会听我的祷告的。但我的脑子里老是有一个念头，我要帮助家庭，拯救家庭。那时乡间许多人因生活所逼，背井离乡到南洋谋生。二十多年来不断有乡亲到马来西亚的沙拉越、诗巫。我也想着要去，路途遥远，年纪又小，那时只有九岁，念小学五年级，谈何容易。我同班有两位同学，一个13岁、一个15岁，是俩兄弟，卫理公会教区长的儿子。他们的母亲早去世了，继母对他们很不好。他们的亲舅舅在新加坡做生意，而且热心爱主。他回到福州捐巨款给青年会和英华中学。他得知两个外甥受继母虐待，就想把他们带到南洋去。听到这个消息，我便求他们兄弟俩把我的情况、家庭的困难处境介绍给他们的舅舅，求他把我也带去，而船票（半价）六块大洋，我到南洋后可以在他家扫地、倒痰盂、做工偿还。这舅舅同意我的请求，并且讲好动身的安排。未料，这件事情被其兄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教区长与我们家、我母亲都很熟悉，就让我母亲知道了。虽然家中穷困，但母亲那里舍得我这么小就离家去南洋呢，于是我被母亲关起来，直到那两兄弟动身了好几天才放我出来。我非常失望、难过。乡间的人都议论我，这小孩胆子大，才九岁念五年级，个头不大，就想漂洋过海下南洋，真不知天高地厚。我想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是神的手不让我去，凡事神都有安排都有时间。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到南洋去

谋生的念头。两年后，我念初中一年级，我大姐与一位回国念书的侨生结婚，他们要回南洋去，我求大姐、姐夫带我去，终于了却了我下南洋的心愿。



五．南洋求学谋生五年

七、八十年前，想要飘洋过海下南洋，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贫穷落后的乡村交通的不便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先要从家乡乘小船到福州，再换挪威的船经厦门、汕头、香港到新加坡，再改乘荷兰的船走三天到达马国的沙拉越、诗巫，前后二十一天。去南洋谋生，算是一件大事。为生活所迫，我离乡背井，特别是离开亲爱的母亲，离开患难的家庭，那种思乡之情、思念亲人的渴望之心，不禁令我常常伤心流泪。到达诗巫的那天晚上，才得知不久前的一场火灾，几乎烧毁了诗巫市所有的房子。大姐夫的房子也烧了，我们无处安身，只好连夜乘小船到姐夫的母亲所居住的偏远山村茅屋里暂时栖身。那个小山村是第一代移民南洋的人所居住的，名叫“南平厂”。异常偏僻落后，像是原始部落的小山村，令人害怕。许多水土不服的移民就这样客死在这个异乡。我和姐姐不敢见面，因为一见面我们就要伤心流泪。那时，家乡来信要两个月，每次收到来信，我们姐弟俩总是晚饭吃不下，呆坐着想家，想着母亲和亲人们，这样有半年的光景。当地有一个很好的风俗习惯，学生念书时，小学是中午12点开始的。而初中定11点开始，早上让所有的学生参加劳动。有钱人的小孩，穷人的小孩都要参加劳动。那时，我经常参加的是割橡胶，每天早上3—4点就要起来，因为天未亮之前割的橡胶出乳液多。吃过点心后，我们就戴上前面装着小灯的帽子上路了。黎明前橡胶园里小灯的亮光时隐时现，颇为迷人。我很怕蛇，可是橡胶园里的蛇又特别多，还有毒蛇。我好几次与毒蛇相遇，有一次，一头毒蛇昂起头、发出嘶嘶的叫声跟着我的灯火。那以后我就跟我姐夫说，我怕蛇，不敢去割橡胶，还是让我去养猪。就这样。我在南洋当了几年猪倌，每一年都要养72头猪。感谢赞美主，神也特别祝福我，我养的猪都长得很好。上半年36头小猪在我的精心喂养下，六个月就能上市出售。又再养36头，全年72头猪

的收入，够我支付我的学费、生活费，还可以寄钱回家。为了我的前途，到达的第一年，姐夫把我送到巴萨的天主教堂去学马来语和英语。但是我水土不服，得了脚气病，还有过两次重病，医生劝我离开巴萨，我只好又回到姐姐那儿。有一次病重，虽然我还没有得着主的生命，但我却懂得祷告，我恳切流泪地祈求，我相信我的病是主垂听了我的祷告，医治了我，拯救了我。（赛：45：4）“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

在南洋五年，我每一个主日都去做礼拜，参加主日学，甚至我快回国时还到“公益社”讲圣经道理。我不知道是怎么讲和怎么祷告的，而大家颇赞许，不过我也承认自己尚未认识耶稣。中学最后一年，学校组织一次征文比赛，题目是“宗教信仰”我的文章第一句是：“宗教者，匡扶人心也……”我的意思是不管什么宗教都是匡扶人心，叫人做好事，修行，有好品德，通过宗教信仰叫人节制、向上、不会堕落等等。因此，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好青年、好学生。在南洋的五年，我没有抽烟、喝酒、不赌钱，在学校念书第一名，有两年任学生会会长，毕业时获学校特别奖，那时被大家誉为标准的青年，不少女孩子仰慕我。日本发动侵华“九一八”事变时，我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演剧、募捐，手臂戴黑纱，以表示绝不要忘记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捐款都汇到新加坡华侨爱国会会长陈嘉庚先生处。

我当时是住在马来西亚的诗巫，诗巫有很多来自福州的人，热带的地方，有土人、马来人和中国来的。马来人的男女小孩发育得很快，女孩子十二三岁怀孕生小孩的都很常见。我在那里念初中。我到马国的第六年，就在一个小学当上了教员，也没有再养猪了。在那个小学，有很多来自福州的女孩子，年龄都在11岁到15岁之间。当中有一个女孩子是我姐夫哥哥的女儿，长得很漂亮，而且我们都住在我姐夫的家里，同桌吃饭。这女孩子看见我总是很有礼貌，她知道我很用功读书，功课很好。她数学不好，我常常辅导帮助她，而她英文比我好。她便教我英文。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就有了感情。她比我主动，

我那时也已经十六岁了，发育进入了青春期，我们两个人暗中谈恋爱了。她父亲是县长，母亲很有钱。可是我姐姐不喜欢我与她交往，她说我们是穷光蛋，他们有钱买牛肉，我们却没钱买酱油，门不当户不对。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准备以后成家了。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到新加坡或是英国去攻读更高的学位，我们商量着，我要回去大陆继续求学，完成学业，她第二年也回到大陆。那时她所在的小学很严格，不允许男生到学校找女生的。我们约定通信的办法，我的信件由我姐姐转交给她。回到大陆后，三个月我写了六封信给她，可是都没有得到她的回信，令我失望。

到了高中二年的时候，我侄高中毕业，要到马来西亚谋生，我就托他带一封信请他亲手交给我的女朋友卢幼玉，他答应了。可是这以后我仍然没有得到她的回信，我很纳闷。后来我信了耶稣，心想要以学业为重就把这件事搁置，没有再与她联络了，我中学毕业又去念大学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侄没有把信给她，而是就这样认识了她，并且以后还跟她就结婚了。这事，可以看出人心是多么的诡诈。我知道他们的结婚还是很偶然的。那是1991年我到马来西亚还福音的债时，与熟人谈起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与我的侄结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孩子，她因为难产死去了。这事使我体悟到，可能是神不愿意让她与我过早地结合，神要拣选我，要我专心做一个传道人。



六. 回国求学归家信主

因为是回国升学，所以我姐姐及许多亲友为我送行。他们送钱给我，置办了几套白色的西装、皮鞋、礼帽，把我打扮得像“番客”。回到福州，再回到老家闽清。母亲见到我十分高兴，她说，自从我走后，几乎每天流泪。我将身上剩下的几十块大洋悉数交给了母亲。母亲要我留着自己升学用，我对母亲说，我在南洋五年已养成劳动，自食其力的习惯，我回国求学也要选择半工半读的学校，我能自食其力，这些钱你拿去。我回国时正是冬季，那时学校只有秋季才招生。于是我来到福州，寄居在仓前山我婶婶家时，还找了两份工作，半年的时间，除了伙食费，我靠做工积攒了几十块钱。我已养成十分节俭的习惯，但对需要帮助的人，我慷慨乐施。我婶婶有两个男孩，三个女孩。第二个孩子在北京大学上学，大儿子在家。有一天晚上，我的大堂兄的一个中学同学来找他，这位同学是一个传道人——翁节敦弟兄。堂兄告诉我，这个同学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正在为毕业后的工作、前途而忧虑。有一天他路过一座教堂，听到佈道家正在传道，他就进去听了一下，佈道家讲的福音题目是：“归家吧，归家吧，天父愿意你归家！”听了以后，圣灵在他里面动工，他当时就接受了主耶稣得救恩。这以后到毕业的半年的时间里，他在学校钻研圣经。有一天圣灵又感动他，想到毕业后奉献去做传道。那时他的家人都盼望他毕业后能到海关、邮政、银行或是洋行去工作，有丰厚的薪俸，捧金饭碗。但圣灵继续动工，他最终决心献身做传道。他的家人极力反对，各方的劝阻和阻力很大，而且一时也没有教堂要聘请他。于是他和几位弟兄一起到闽北山区自由传道，两三个月才回到福州，理髮、洗澡，休整几天，又到山区去佈道。那天他来到我堂兄家里，我看见他穿着蓝布衫、拿一把雨伞，背着布包，我觉得他很寒酸，看不起他。堂兄是一个好人，就是不接受耶稣救恩，经过这个传道人长

久耐心地向他传福音，最后堂兄也接受得救了。那天我坐在一边听翁先生的一位同工传道，这个传道人看我听得很认真，便转过身来对着我讲。他问我，你信耶稣吗？你得救了没有？我回答，我是牧师的儿子，每个礼拜我都去礼拜堂的主日学，怎么会没有信耶稣呢？心里想，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这位传道人接着又说，刘先生，我们都是罪人，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所以你也需要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祂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拯救罪人。他还唱“耶稣降生歌”给我们听。可是我听他说我是罪人，心中十分恼火：大家都说我是标准的好青年，就是这位传道人说我是罪人。他也看出我不高兴，又不好意思道别，时间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说要送一节圣经节给我，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其实我没有念过这一节圣经，我不懂装懂，对他说，好啦，我都懂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我会为你祷告，求圣灵感动你。当你觉得需要的时候，当你心里难过的时候，请你到某某地去找我，我是陈恪三弟兄。我心里不耐烦，好啦，你快走吧，我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走了以后，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奇妙得很，一贯以来我劳动回来，夜间睡眠都很好，一躺下就睡着了。但是那天我却辗转难眠。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圣灵在我身上做工。我睡不着：我是不是一个罪人？他所说的这位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罪人吗？我是罪人吗？我会得救吗？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夜未眠，第二天我照常做工，十分疲乏地回家，可是仍然不能入眠。第三天我两眼发红，头昏脑胀地坚持上工，晚上回家，我想今天一定要好好地睡一下，不然我会发疯的。可是越想越睡不着，又是一整夜不能入睡。第四天我到下午三点就回家了，心想好好休息休息。此时我才记起那位陈弟兄。于是我拿出南洋带回来的衣服，打扮一番，就去找他了。到他家时，透过玻璃窗，我看到他正跪在那里祷告。听到我的敲门声，他起来还未开门，就问：刘先生吗？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他请我进屋，说，我知道你会来的，我三天三夜都在为你祷告。我心想，原来你的祷告三天三夜却让我失眠了。进屋后，我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请你再给我讲

一些耶稣的道理。于是，他就从主耶稣爱我们说起，说到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只要我们肯认罪，承认自己是罪人，主耶稣就会用宝血洗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祂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他讲到这些，我的心一阵阵地搏动，好像有一种力量在催逼着我：赶快来到主耶稣跟前，让祂使你得安眠。我忍不住地对陈弟兄说，请你不要再讲了，我现在需要你为我祷告。陈弟兄马上就跪下开口为我祷告，我也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他祷告时，我不住地流泪，以前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模范青年，我不是罪人。但闭目祷告时，圣灵感动我光照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的罪恶，我开口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假冒伪善，我骄傲，我欺骗我姐姐，我偷姐姐的钱，贪爱世界，看到女同学有时心怀邪念……所有这一切都使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确实是一个罪人，我深切的负罪感使我迫不及待地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陈弟兄的祷告，一句又一句地打动我的心，同时又使我感觉到有一隻亲切的手在抚慰着我的心，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祷告完，我站起来，就像千斤重担卸下，如释重负，我顿时感觉到生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感谢赞美主，我来的时候，带着痛苦、惧怕、难过的心情，离开陈弟兄家以后，我的心充满了喜乐、平安、满足和盼望。陈弟兄送了我一本崭新的新旧约圣经，我满心轻松地离开陈弟兄的家。从那一天开始，我按照陈弟兄的指导，从约翰福音书开始读圣经。我天天读圣经、祷告。我在我的家人、亲戚、朋友中做见证，告诉他们说，我是一个罪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但是从那天开始我得救了。我劝他们也信耶稣，罪便得赦免，做神的儿女，就有喜乐，就有平安，有满足有盼望。我天天这样讲，碰到人也这样讲，这样做见证，有人就怀疑我是不是精神病了。感谢赞美主，祂让我爱人的灵魂，爱亲友的灵魂，虽然我懂得不多，但我从那一天开始就学习做见证。在学校秋季招生前，我有一个学期多的时间在做工。我到郊区的一间教会的夜校当教师，每个月有八块大洋，交给婶婶六块做伙食费。我认真教书，每一课快结束时，一定要向学生做见证：我刚来教书时还没有得救，我现在已经得救了。我

努力劝我的学生们要信主，做神的儿女，将来一定会蒙神祝福的。

我们上课的地方是一座庙宇，每天晚上八点有四个神棍一定要在那里“打坐”，拜菩萨。他们很希望我早一点结束课程。好让他们早一点开始仪式。有一天我按时结束课程回家，才走了五分钟，忽然有雨点落下，我记起来时我曾带了雨伞，于是返回庙宇拿伞，我到庙宇时已经有三个神棍疯疯癫癫入魔了，当我走进去，他们没法继续下去，都醒了过来。我觉得奇妙得很，我信上帝，信宇宙中的真神，是圣灵的力量使偶像、假神、邪灵立刻惧怕败退，使得这些装神弄鬼的人不能继续他们骗人的伎俩。“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甚么能害你们。”（路10：19）这个学期的暑假，我饥渴慕义的心，使我天天查考圣经，努力装备自己。礼拜天我就到福州十二棚排基督徒聚会处聚会。8月又有几位年长的弟兄：王连俊、张启珍、陈恪三等主持讲道。夏天在白牙潭有一个月的查经聚会，由两位英国的传教士和受恩姐妹和她的她外甥女一同主持，专门辅导年轻的基督徒查经。我得到很多圣经宝贵的真理，明白了许多圣经的话语。我心中有的许多疑惑，在查经聚会中都解开了。“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归向祂，使以色列到祂那里聚集。”（赛49：5）在仓前山有一位传教士，叫Ms Rose Mace，她是一个极有爱心的传教士，是先父临终前把我家三姐妹托付的人。大姐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毕业，二姐从师范学校毕业，小妹从协和护士学校毕业，都是这位传教士帮助的，不但如此，她还资助了许多女子上了中学和大学。她更创办了女子神学校，那时她是女神学的校长。我从南洋回来以后，对今后的前途没有一点把握，我想找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继续我的学业。她听说我回国了，非常高兴。实际上，我对这位美乐安传教士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十一岁就到南洋去了。有一天她请我到她学校，她非常关心我，说已经为我预备了一条路：她要我到卫理公会办的神学院去念三年，出来以后不要马上去做传道，而是再到南京金陵神学院去读四年，毕业以后也不要去做牧师，就到美国的新泽西的卫理公会的DREW神学院继续深造。

回来以后才做牧师、在教会担任重要职务，对教会的发展更好。她说她还会安排神学院的教师每星期教我两节课的中文，而她自己则负责教我两节课的英文。我听到她这么说，真是非常的高兴。这样的安排就意味着我今后的生活费、学费等等都不用操心了。特别是我有机会到美国留学，真是我梦想不到。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且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后来回到家里，我想起读过的圣经里保罗讲到做使徒是蒙召的，我没有蒙召怎么能够去读神学院做牧师传道呢？我就又去找Miss Mace，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我说我现在还没有蒙召，我不能去读神学院，以后如果神有呼召我出来做传道，我可以出来做传道。我很感谢您的爱心，但是我现在不能按照您的计划去读神学。她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只是在那里流泪。那个眼泪是爱心的眼泪、那个眼泪是对我期待的眼泪、更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爱心的眼泪。后来她就问我说，你有什么打算？我回答说，我已经考上了英华中学，这个学校很好，但是学费相当的昂贵，我恐怕没有能力上这个学校，我可能会到福州西门一个教会办的协和职业中学，可以半工半读，里面可以学到很多工农业方面的技术，我想上帝会帮助我的。她没有反对，她说，那就按照你的意愿去读罢。所以我以后就进了这个协和职业中学。我哥哥也是毕业于这个学校，许多家境不好的基督徒的孩子多半都进了这个学校。其实这个学校是很不错的，学生学到的工农业方面的技术，好比工业的製造、设计、设备维修等等和农业的育种、品种的改良、家禽的饲养等等，毕业以后多半都能很快找到工作。

虽然我没有按照 Ms. Mace 的计划去读神学院，但是在我就读协和职业中学的三年期间，她每年都暗中通过卫理公会的传教士 Mr. Billing 资助我五十块钱，有一年还给两回。Billing 对我说，Mace 知道我们常到农民家传福音，要花时间，叫我少做工，她喜欢资助我。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六位同学要到郊外传福音，遇上日本飞机轰炸，我们经过军事训练便伏身在马路边的田地下，飞机炸后离去，我们被震动，身上都盖满了厚厚的泥土，不知是死是活，好久才翻身起来，发现马路上被炸死好多人，我们马上投入了抢救伤者的救护工

作，当时的情况真是好惨呀。

由于 Ms. Mace 的资助，我就可以少去做工，而把时间用在读圣经、灵修和传道方面。以后 Ms. Mace 回美国一年。这一年，我因为经济拮据，虽然考取了福建协和大学，仍然只好休学一年，就在仓前山的一个小学当教员，同时也是就近能在礼拜天可以参加天安堂和十二棚排的教会聚会，充实自己的属灵生命。Ms. Mace 回来以后，我就进了协和大学，仍然是半工半读，她还继续通过一个人资助我五十块大洋后来抗战爆发，她不得已回国了。我实在非常感谢主为我安排 Ms. Mace 来帮助我，她实实在在是神的使女，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传教士。

就是在这次白牙潭的查经聚会中，我们三十多位的青年弟兄姐妹一起受浸归主，这年的夏天我考取了福州英华中学，这是一个有名的学校，但是我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而放弃入学。时过二十多年我与当年英华中学校长陈芝美同工，我开玩笑对他说，若是我当年认识你就好，可以免费进英华了，他笑答，那是一定的，像你这样的人才，一定免费收你。我进不了英华，就选了福州西郊教会办的“协和职业中学”，可以半工半读。回想起来，这都是神的安排，神让我进了协和职业中学，学到了很多学问知识和各种技艺。除了各种的书本知识以外，我学会了耕田、种植各种农作物、饲养各种家畜、牲畜，学会了养蜂，还学会了铁工、木工、电工，甚至製罐头等等。神为我准备的这些，为我将来的事奉和作牧师是很有用处的。

我在协和职业中学担任青年会主席，我把青年会变成属灵聚会、佈道传福音、青年团契的场所。神知道，无神论将会统治中国，那几年在全国、在福建、福州神兴起许多忠心的僕人，像宋尚节弟兄、贾玉铭牧师、倪柝声弟兄、王载弟兄、王连俊弟兄、赵世光牧师、计志文牧师、赵柳塘牧师、陈恪三弟兄、汪主恩弟兄、郑惠端姐妹、等等都来福州开佈道会、培灵会。因为没钱乘车，我们来去都是步行去参加，有时夜里一点多才回到学校，心中火热追求。学校规定晚上10点熄灯，我们都是走廊读圣经，而求不让训育主任看到，否则就会受罚。早上则很早起床，灵修、祷告、念圣经。礼拜天早上去卫理公会

做礼拜，教主日学，下午去河西街参加聚会处的聚会，那时传道是王峙弟兄。我们常请灵命好的牧师、传道到校主领佈道会和培灵会，我们的灵性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三年间，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能力，我们在学校作了许多有益的事，帮助穷苦的人、和有病、有难处的人。这样也带领了好多同学相信、接受了主，甚至有一个是地下党员。在我念高中二年的时候，夏天放假了，许多人都回家去了，但是一些从闽北来的学生大多都留在学校，因为那时闽北被红军占领了，教会学校停办了，他们不能在那边求学。当时留校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其中有一个从菲律宾来的青年，原来他是地下党员，他想在我们当中宣传马列主义。那时我们宿舍睡的是床架，我在上床。他每一天晚上总是来到我的床边，跟我讲很多马列主义的道理，我哪里会想到什么马列主义，相反我也同样非常热情地向他宣传耶稣基督。我对他说世界上唯有一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共产党不能救中国，只有主耶稣会救中国。所以我们常常辩论。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人是自己办伙食，规定每个月伙食费三块要先交，不然的话，就不能上桌吃饭。交钱的那一天，我从学校的三楼下来，我经过天台时看见一个学生还站在那边，我走过去了，回头一想，现在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怎么还有人站在这里，于是我就回头走过去，一看还是同班的同学，他是从邵武来的，他的家庭也非常困难，他父亲早死，母亲守寡多年实在没有钱。他在那里徘徊。我对他说，我们去吃饭吧，他不讲话，我又说，是不是你还没有交钱呢，他点点头。我说好，我们到外面去吃饭，一起去吃面，那时吃一大碗面才一毛多钱。我的这位同班同学叫危盛谋，我这样说的时侯，他就流下了眼泪，他不想一起去，我就把他拉了去。以后我们就到一个小店铺吃面，借着这个时候我就向他传福音。我说我跟你一样是患难的人。我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母亲也是寡妇，家庭也是非常的困难，连饭都吃不饱。我跟他介绍我怎样信耶稣。我问他你信耶稣吗？他摇摇头，他说他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是为了读书能够得到奖学金，所以在报名的时候说是基督徒，他实在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跟他传救恩，虽然我不

会讲太多的道理，但是讲救恩我有很多的经历，于是我就在回头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讲给他听，同时迫切地为他祷告，结果圣灵就在那天晚上感动了他，他流泪悔改在主面前，他信了主得救了。我从身上拿出三块钱对他说，你先拿着这钱，等你什么时候有钱还的时候再还我，没有钱也不要紧，我有做工，还可以去赚的，你明天就去交饭钱。这个弟兄信主以后心中平安喜乐。他是一个聪明很有天赋的学生，他对无线电很有研究，他在管实验室，大家都叫他科学家。他毕业以后考入了协和医院，在X光科当助理。当我从美国回到协和医院看见他时，他已经是技术员，他仍然保持着他的信仰，一直到解放后主接他去，而且他的太太、孩子等都信了主。后来才知道，如果那天我没有拉他去，他准备从天台跳楼自杀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有爱心，爱心才能感动人。在那天晚上我与危盛谋谈话的时候，那个菲律宾来的同学却躲起来。我第二天就去找这个菲律宾的同学，他很会讲话，他就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去找他时，果然他也没去吃饭，他不是没有钱，而是菲律宾的钱还没有寄到，我就说我们一起去吃面，还是吃面，我就在吃面的时候，热情地向他传讲救恩的道理，同样的劝他信耶稣。所以我非常相信，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能够信耶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只要照着本分去传，圣灵一定会帮助做工的，这是我一生的信念。那天晚上我一边向他传福音，心里一边迫切的仰望主，我们同样在路上边讲边走，在草地上谈了很久，我盼望他能够信主得救。果然，就在那天晚上，他自己说，“扬芬同学我实在谢谢你，你今天不但救我的身体，也救我的灵魂。你的话语感动了我，圣灵也感动我了，请你带领我，一起跪在这草地上祷告，我要向主认罪悔改接受主作我的救主。”就这样他就信主了。同样的，我回到房间拿了三块钱借给他，后来他汇款到了以后就还给我了。他比我低一班，那时他还没有与他的组织脱离关系。有一天，可能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他离开了学校，我相信他是真正信了主的。

当时，我们还在校外办夜校，除了教知识，也传福音。那时福

建省主席陈仪倡导每一个学校选一个模范生，我被选为“协中”的模范生，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是圣灵在我身上，让我有力量行善，有爱心、有能力服务人。福建有二、三百名模范生集中在福州，由省政府招待参观了许多地方，回到学校就向同学们传达。三年的“协中”生活，让我在属灵上大有长进，知识、经历也大有进步。在学校时，我常向别人传主耶稣的生、死、复活、圣灵降临、主耶稣升天和再来的福音。当时学校有一位物理老师，他是挂名的外国宣教士 Mr. Newell，有一天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什么都好，但信仰有问题，你的信仰过时了，是落后的，不适合潮流。圣经说主耶稣的复活是指精神的复活，耶稣再来，其实已经来了。他不信耶稣基督再来，也不相信耶稣钉十字架流血捨命是为拯救我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我对他说，你刚才夸我许多优点、许多好的行为，如果我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真正的信徒，我就不会这么好。我相信这些真理，接受主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圣灵住在我心里我盼望有一天祂会再来。说着说着，我们就冲突起来，他的脸色很难看，他认为他的教育失败了。我对他说，你的教育没有失败，你书教得很好，是我今天不愿讨人的喜悦而要讨主耶稣的喜悦。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以后这个老师退休回国了，我也上大学了。因为我们的主告诉我：“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1：10）“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除灭我。”（伯32：22）这期间我休学一年，在培元小学教书。那一年的每主日我都在仓山区的上渡教堂教主日学，平时在天安堂有各种佈道会、查经会，在十二欄排有聚会查经班，就等于我上神学院。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工作，又到闽清县任5年联合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到福州任协和医院代院长，不久到了美国留学。在我结束留学即将回国前夕，我的物理老师在美国写信给我，在信中他希望中国走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路线，信中坦承只有像我这样基本信仰的人才能带领人真正归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后来我得知他临终之前终于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耶和華说：“我知道我向你们

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2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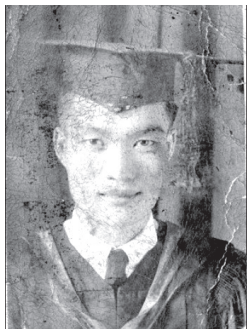
我从“协中”毕业后上大学，首选福建协和大学，一来，这是教会学校又在福州，不必花路费，二来，可以在协和先修医学专业，毕业后再到别的医学院继续深造。我在南洋的家人也都希望我学医，我自己也想当医生，医生这个职业对于领人归主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病人。我考上了协和大学的医学先修科，但我的经济状况不足供我上学，于是我选择保留学籍一年，先去工作，攒足了钱再来上学。那时有十几个单位愿意聘请我，最后我选择仓前山的培元小学。因为这个小学靠近聚会处的十二棚排的聚会地点也靠近天安堂，那时有许多奋兴佈道家来主持佈道会和培灵会、查经会，我可以就近参加。在那一年任小学教师期间，我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常向他们传福音。当时有一个教区长，兼任校长，信仰是新派的。他的信仰、行为实在不配做牧师、做教区长、也不配做校长。他贪污、腐化、什么事都做。我应聘是与他讲好每月的薪水是28元，聘书上也写明28元，但发薪水时却只给20元。他说学校经费不足，只能给20元。我也就不计较，认真做好工作。为了攒足钱上大学，在课余我还去做家庭教师。家长们对我都很好，他们看到我生活十分节俭，学校的伙食也不怎么好，常常做些营养的食物给我吃，让我身体能够强壮。小学里一位女同事的好朋友也住在学校。她是幼稚师范毕业在幼稚园工作的。我们常一起去上主日学。听女同事讲，这位姐妹身世贫苦，小时候，父母亲在同一个月同时染上鼠疫相继死去，留下她这个长女和两个弟妹。弟弟由教会送去孤儿院，妹妹带在身边。我听后十分同情她的处境。我在自己并不充裕的薪金中拿出四分之一给她，她很感激我，为了报恩有意以身相许。平时尽可能在生活上关心我、照顾我。久而久之，我对她也动了感情，大家都是穷苦出身，又是基督徒，于是我答应她，大学毕业以后一定娶她。一年后我上了大学，礼拜天的时候我就回到小学住在一位陈弟兄的家里，吃饭就在学校的食堂，由这位姐妹付钱，一连几个礼拜天都是这样。那时，政府将全省各地的小学校长集中在福州

办训练班。其中有一个官姓的小学校长，礼拜天常来看望这位姐妹。有一个礼拜天，我回来吃饭时，感觉到这位姐妹对我似乎冷淡了，而对那位小学校长特别热情。其实学校的同事们都知道这位姐妹本来与那个校长就是好朋友并且已经订婚了，只是不对我说，怕我伤心。我看到他们十分亲昵的样子，心中不是滋味，饭也吃不下，就到陈弟兄那里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请他将实情坦言相告。陈弟兄告诉我，前几年这位姐妹与官先生同在邵武的一个小学共事，已是好朋友，且已经订婚。后来因为她在培元小学的女朋友邀请她，才离开邵武。这次在福州与官先生重逢，旧情复燃。听到这些，我很痛苦，于是就祷告主。我觉得我因对这位姐妹的同情而产生感情，在这件事上我得罪了主，也许犯了罪。第二天大家一起去做礼拜，礼拜后我找这位姐妹谈话，她不免心虚害怕，因为这件事她一直瞒着我。我对她说，姐妹请你实话告诉我，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违背圣经的话、神的话。她不停地流泪也不说话。我又对她说，你到底跟这位官先生关系到什么程度，她仍不回答。以后却说，我们两个人一起离开这里到南洋去，也就是说到我姐姐那里去。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有不少人去南洋。我回答说，我为了求学，更为了事奉才由南洋回来，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这次的谈话没有结果。以后我不再回到小学校，知道那位小学校长训练班结束回邵武，我才回小学校。这位姐妹仍然对我很殷勤。但我心中感到我应该遵照神的话、圣经的教导来处理这件感情上的问题。我又担心伤了她的心，于是尽可能用温和的方式让相互之间的这种感情冷却下来。后来政府命令所有的大学生参加“军训”三个月，先军训一个月，而后男生都到闽北。我到了崇安，正好碰上国共合作，崇安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福建省的中共党的领导人都在那一带活动，那里的老百姓都被共产党发动起来。不久，我们又到了邵武的洋山，恰好官校长就在当地工作。因为“军训”人员视同政府官员，各地对我们都毕恭毕敬。我们住在小学校里，官校长请带队的到他住处见见面。我一进到官校长的房间就看到他和那位姐妹的订婚照，我十分伤心：这位姐妹不该这样瞒着我！原来这位姐妹送给我的相片竟

然就是从这张订婚照上剪下来的。我有几天寝食难安，还好有几位知道内情的弟兄用主的话安慰我。我祷告主求主光照我，让圣灵帮助我妥善处理这件感情上的纠葛。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位姐妹：为了主，为了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我劝她放弃我，回到官先生的身边。但这位姐妹回信给我却说，死也要跟着我！我十分为难。这样有两三个月，我一再用圣经的话语开导她：为了你将来的蒙福，也为了我自己的事奉的道路，我必须和你分开。我同时为这件事迫切的祷告。结果这位姐妹来信接受了我的劝告。她知道我下决心按主的话做，知道我愿意敬畏神，愿意尊主为大，什么样的损失、什么样的痛苦都愿意忍受。这位姐妹终于回到官先生的身边。感谢赞美主，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让我知道遵照主的旨意处理这样的感情问题。我结束了在崇安的工作，夏天我又去了邵武。



七、福建协和大学四年



福建協和大學畢業照

福建协和大学建在福州市郊魁岐，闽江边。在当时教会创办的十三所大学中，协大的风景区名列第一。我是1935年考入协大的，三个月后学校奉命迁往内地。校长、教职员、传教士教授、学生会代表为此商议多次，并经过“迁校小组”赴闽北几个县市调查考察，认为邵武县（现在已改为市）最为适合。该县教会属中华基督教会邵武区会，设有中学、小学、基督教医院、妇女学校，而且有教士屋多座。红军时期这些学校全部停办，并入福州教会学校、医院。我们建议新建几座，抢修几座校舍，教职员、传教士、学生宿舍。文理学院设在东门，农学院设在西门，以医院作为各科（物理、化学、生物等）的实验室。我们正在筹划时，省政府陈仪主席，命令全省各大学学生集中沙县军训一个月，以后各校按迁校情况分队（协大分三队）依各校迁校地址为原则。比如厦门大学迁闽西长汀，福建学院迁闽清，福建协大迁邵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南平，福建医学院迁沙县……协大分三队，女队由陈教授等带队到闽南各县，男生分两队分别到邵武和崇安，由学生会会长翁绍平和青年会会长刘扬芬等带领，按照军训处规定民训队分队到县各区，除宣传抗日外，设短期训练班，组织妇女队，教唱抗日歌曲，举办抗日讲座，同时附带解决农民因抗日带来的困难问题。

三个月民训很快过去了，学生会、青年会骨干分子跟教职员绝大多数留在邵武，一部分回福州魁岐，马不停蹄地进行迁校事宜。我跟绍耳都留在邵武，我们认为迁校工作十分繁重十分复杂，如果没有县政府和当地教会的大力支持，协大的迁校很难成功的。所以翁绍耳和

副主席邵蕙卿多跑县政府，我与副会长江遂如多走教会、区会。感谢主恩典，最终县政府派副县长和科长区会主席廖元道牧师参加协大驻邵武小组，他们自始至终都尽心尽力帮助我们。迁校花了三个月分几批迁妥，正好赶上1935年8月秋季开学。开学前后三日，陆续来了五百多同学，其中基督徒差不多一半，真正基要信仰的只有五分之一。宣教士教授全是现代派信仰，中国人教授只有五、六位是基要派信仰。但是很奇妙，所有的教授、同学来到那新环境都有一种恐惧心理，晚上没有电灯，到处漆黑一片，老鼠肆意闯行，苍蝇、蚊子更是猖獗。虽然正值举国抗日，但对红军的恐惧情绪犹存。因此教职员工和同学也不分信仰与否，团结一致彼此照顾。尤其是开学的那天晚上，举行感恩礼拜，六、七百人集中在有汽灯的小礼堂里，没有座椅全体站立，由林校长读经、演讲，同唱“坚固保障”。最后，Dr. Stower 祝祷闭会。

会后，学生会职员和青年会职员分开召开本学期第一次会议：学生会职员会议决定：一，敦请政治学教授林希谦为顾问，请他在每周国父纪念会做政治时事报告。二，组建抗日歌咏队。三，组建抗日剧团，组织抗日宣传队。青年会职员会议决定：一，每礼拜二至礼拜五有早祷会，由教授会主领。二，协助东门堂及西门堂主日聚会活动，如讲道、诗班。三，主日下午在协大校园 campus 设主日学学校。对象为本校教职员子女，包括高农学生，邵武县初中生、以及东门、西门两堂的青少年，人数二百余人。四，设青年佈道队，每礼拜六下午到县监狱、孤老院，北门外、南门外郊区佈道。五，拟于1936年夏天，个别教授和若干同学跟市区一些信徒在北门租用一个大厅可容纳三百人，建立地方教会。（这个教会解放后仍存在）六，每学期由上海、南昌、福州邀请名佈道家两名来校领佈道会及培灵会。

我先在协和大学的医学先修科念了三年，学习了许多与医学有关的基础课程。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由福州迁往邵武。这个学校的学生来自福州、闽南、广东、江西、上海等。大家多是主内肢体，和睦相处。学生中有一个团契，礼拜天上午先自己聚会，以后才到礼

拜堂。另外有教授、学生组成的祷告会。礼拜天的下午到邵武县城关的孤儿院、孤老院、监牢去传福音。当时邵武有东门、南门两个礼拜堂，参加礼拜的多是协大的学生。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礼拜堂的事奉工作、讲道和主日学工作都包了下来。我又被选为青年会会长，负责组织安排宗教和社会服务活动。当时学校每一个礼拜一纪念周：纪念孙中山先生。其中礼拜二至礼拜五都有朝会，基督徒师生在学校大礼堂聚会，上讲台讲道的都是教授。但有一天校长破例让我上台讲道。第一次上大学讲台，心想台下坐着校长、教授、宣教士、高班同学，不免心慌。幸好在中学时我曾有过这方面的训练，而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今天上台是事奉神。我为求神的荣耀，我高举神的名，这样就不去注意台下坐的是谁人了。虽然台下坐满了教授、同学，我祷告之后，就不怯场，按照圣灵的引导来讲道。参加礼拜的人信仰观点不尽相同，在选择讲道题目时，我不去迎合他们的观点而是讨神的喜悦，像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前2:2）这也是我得救重生之后，我一直立志要传讲的题目。感谢赞美主，讲道之后，有许多信仰纯正的师生都上来和我握手。此后每一学期，学校都安排1-2次在大学的礼拜中讲道。四年大学结束，我将自己在大学朝会上讲道的讲稿汇总一下，知道自己没有离开这个总题目，也就是主耶稣并祂钉十字架。在大学期间还有许多服务性的工作，服务同学、教师和工友。大学四年中有过二次鼠疫大流行。邵武当地有一个陋习：人死之后不立刻下葬，而是放在楼上让子孙拜谒，好几天才掩埋，这样更加剧了疫病的传播。大学及附中均有人染上了鼠疫，大家人人自危。当时医院院长邱少陵是位热心爱主的医生，他很喜欢我，大学四年都要我在他身边当助手，有时也参加手术。我学习了许多医学知识和技能：打针、换药、量血压和各种体检等等。当鼠疫流行的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一部分同学来照顾病人。又有一次是霍乱的大流行，学校医院的病人，没有人敢去护理。感谢赞美主，祂给了我们爱心和能力，使我们有胆量去护理霍乱病人。一个一个的病人都在我们精心的护理下康复了。在毕

业的讲台上，许多经过我们护理的同学都发表感想说，经过这件事，他们知道了谁是真基督徒，只有真基督徒才有这样的爱心。有一位上海来的同学更在我的毕业留言本上写着：“刘扬芬同学，我看到你，就等于看见了上帝！”我当然是不配，他不应该这样写，这说明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中的见证是多么重要。那时，邵武城南门没有礼拜堂，于是大学的弟兄姐妹便和由福州来的医生、商人中的基督徒一同在城中设立了一个教会，每礼拜天下午聚会，神特别祝福这个教会。聚会是由几位教授和学生轮流主持，常举办一些佈道会、培灵会，十分兴旺。当我们要离开邵武时，由建瓯请了一位弟兄来负责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操练，对以后我当牧师有很大的帮助。当我大学三年时，邱医生要去美国留学，他是一个爱主的好弟兄，我们都为他高兴。可是他去美国的旅费不够，他虽然没有开口，我们都觉得应该帮助他。当时在县政府当处长的张天福借给他几百元，我是他的好朋友我也想尽可能帮助他，我没有钱，于是写信给我的三哥，提出将大姐南洋寄回来给子女的升学、生活的钱先借我一千块，给邱医生凑作路费，三哥很爽快地答应了。邱医生总算凑足路费可以前往美国了。临动身前，邱医生劝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姐妹做朋友，以后成立家庭，彼此匹配。他自己是工作以后家里安排的婚事，夫妇两个一个博士一个中学生，彼此差距太大，幸好都有爱主的心，才得以和睦相处。我回答说，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可不敢有什么妄想，还是以后再说吧。邱医生鼓励我：你不要自卑，你有许多优点，你可以选择一个最好的姐妹做妻子。我说，你是我的好师长，对我好，爱护我才这样说，我不敢奢望什么。邱医生要给我介绍陈贞娟姐妹，我一听连忙表示不敢有此想法，因为陈贞娟是一位虔诚善良的好姐妹，许多男生都想交上这么一位女友。当时至少还有五位男生在追求她，他们都比我英俊、条件好。我可不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邱医生还是鼓励我，并且请他的师母陈静琬也来帮助。提起陈贞娟姐妹，我记得这么一件事：刚到学校时，因校园很大，我听到上课钟声急急忙忙赶去教室，但不知怎么走，此时有一女生也匆匆忙忙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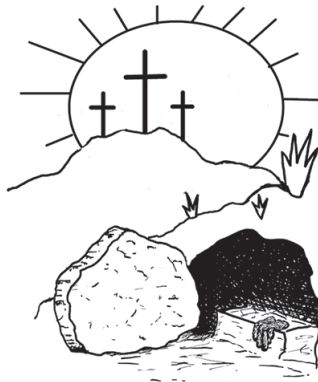
上课，我问她，Miss XX 教室怎么走？她一言不发，只是笑嘻嘻地把我带到那个教室，自己才跑去自己的教室。我心想，这位女生真是十分温顺、和蔼、可亲。以后在聚会团契中见到她，才慢慢熟悉起来，但没有一点想要追求的念头。因为她已上了大学三年级，我才一年级。后来学校要搬迁，她到了上海进了联合大学，但因生活不习惯，而且在上海要照顾哥嫂的两个孩子，身体吃不消病倒了，只好退学返回福州。这时她仍然念三年级，我升至二年级。大学里没有低年级追求高班女生的，但邱医生坚持为我介绍，他写信给陈姐妹的母亲介绍我，后来他把回信给我看。陈姐妹的母亲说，只要邱医生介绍的我都相信。因为邱医生曾在福州柴井医院任外科主任，与陈姐妹的三哥同事，又与其母亲很熟悉。回信又说，不论介绍的男生家里有钱没钱，也不计较是高班还是低班，只要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我愿意将我的女儿许配给他。陈姐妹的母亲是当时圣公会全省模范牧师娘。她有七个女儿、五个儿子，陈姐妹是第四个女儿，邱医生找来陈姐妹，说明用意，陈姐妹一口回绝：我的功课都忙不过来，哪有心事交男朋友，许多求爱的信都拒绝。邱医生坚持要介绍，又说了许多溢美之词。陈姐妹推说，若是母亲同意可以考虑。邱医生拿出母亲的回信，陈姐妹说，我对这位男生的印象也不错，待人热情，虔诚爱主。记得同学在沙县军训时，住地的厕所都让男生占用，女生只好找扬芬，让他将厕所里的人请出去，再站在门口让女生能安心使用。虽然听起来像笑话，但可见这人以助人为乐。我的终生大事只有交托和祷告，心中觉得适合才行。第二天见面时双方都很腼腆。不久我约她谈话：“姐妹，不是我冒昧，而是邱医生作的主……”“我才说到这儿，她面红耳赤，含羞低头，那样子十分可爱。我又说，让我们一起祷告，看看神的旨意……她马上答应说好，好，……就飞也似地跑走了。此后我们仍常常见面，但总不好意思。试验课时我常常等在外面，希望和她一同走，但她老远看到我，就跑在前面与我保持一段距离，免得被人议论。我只好跟在后面，叫着Miss 陈，Miss 陈，等一等，她却头也不回地跑了。有一天她对我说，不要这样跟着我，会被人议论的。我鼓

起勇气对她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件事若是神的旨意，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作证人，先作好朋友，以后再结合为一体好不好？她终于答应了我，并说你不要老跟着我。这样我们就成了朋友，许多同学还不知道。到了大学毕业，我念三年。她要回福州市，我雇了一条船送她。为了筹集路费我们在邵武买了一千斤的大米，租船运往福州出售。谁知道，船到半途触礁，我奋力帮忙抢救，又赤脚冒险沿江涉水走了五里路才找到一条大船，将大家安全转移。陈姐妹看到我的勇敢行为，又看到我浑身受伤，流血，她为心爱的人心痛流泪。几天以后我们回到福州到陈姐妹家已是11点多了。听说未来的新姑爷第一次来到，陈姐妹的哥哥从医院赶回来，兄弟姐妹都出来见面。她母亲煮了许多可口丰盛的点心来招待我，可是我却吃不下，身上又累又髒，那么多的人又看着我。深夜回到我哥哥那儿，因为实在太累了，一连睡了三天三夜，因为鼓不起勇气，也没有到陈姐妹家。到了第四天，我因受大学的委托到“三一”中学办理招生的事，看到了陈姐妹和她姐姐也来到“三一”学校。见到我陈姐妹就跑到我眼前，几乎落泪轻声对我说，这三天你到哪里去了？你有没有想到我是多么惦记着你？那天晚上你把我送到家，就不见踪影了……她的姐姐也过来说，请你明天一定到家里来。第二天我到陈姐妹家，慢慢就坦然了。因为心中有爱，就不再惧怕。那天在他们家过了愉快的一天。陈姐妹毕业了，正在找工作，恰好我中学的母校校长托我在应届毕业生中找两个到学校任教。当时也因抗战时期，学校迁到离福州不远我的老家闽清六都，我就把陈姐妹及另一位女同学介绍给母校。暑假快结束时，我就将她们从福州接到闽清住在我祖家。乡间的人看到我找到一个这样可人的女大学生作未婚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哥哥更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她们。不久我又到邵武继续我的大学课程。此时，福州被日军占领，闽清靠福州太近，学校又被迫迁往将乐山区。陈姐妹随学校徒步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七天六夜才到达将乐。一个学年很快过去了，我大学毕业，校长决定聘我为助教，又因学校在迁往邵武的过程中，我表现突出贡献很大，决定委任我为大学事务

主任，享受副教授的待遇，而且说在工作五年之后，由学校提供奖学金去美国留学。所有这些我只有在神面前献上感恩。同时我向校长提出，陈姐妹可否也调入学校工作，校长略加考虑之后，就一口答应了，我立即写信将这好消息告诉陈姐妹。我任职以后的一个学期，陈姐妹带着妹妹一同来到学校。大家一致称赞我们这一对模范朋友。那时校内几十对男女朋友，校长看到我们这一对有信仰、相亲相爱，懂规矩的未婚夫妻，很满意，破例办家宴请我们，以示称赞和特别的荣誉。我在学校任助教又兼事务主任，工作十分勤奋努力。学校有农场、商店、仓库。学校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几个国家的宣教士教授，共有一千多名的师生、职工，我要为整个学校的伙食、物资的供应打点一切。真是感谢主，给我这样的能力。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各种物资极为缺乏，我们却能在一年内建了七幢楼房，供教授、学生、职工居住用。还盖了大图书馆、建了农场，和工人宿舍。我常常到江西南昌、和省内的永安等地，组织各种物资的供应，学校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不免使我有飘飘然，觉得自己能干，以后还会去美国留学。我对工作事事要求做得最好，一点不能马虎。每星期一，我召集有关人员共几十人，总结一周工作进度情况等，对未完成的或做不好的，因我年轻气盛总想大骂他们一顿。但想到自己是基督徒，便强压火气忍气吞声，闷在心里。久而久之得了胃神经痛。常对工作不认真的人发脾气，到了十一点胃痛就相当厉害。医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许多方法都不见效。于是我就想到这可能是神的管教：因为工作出色在一片赞扬声中骄傲起来，工作要求做到最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祷告主：主啊，我是你所救赎的，我有你的生命，我应该要有耐心，否则像我这样的坏脾气，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呢？感谢赞美主，圣灵感动我，当我读到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恍然大悟，我们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得救。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旧我、犯罪的我、发脾气的我也与主耶稣同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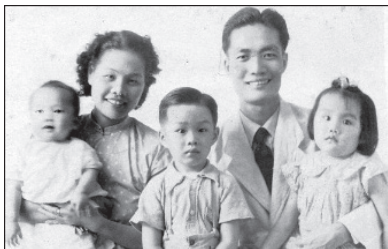
十字架了。因此，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旧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此圣灵光照我、帮助我在工作中纠正了我的坏脾气，我的急性子和爱发脾气解除了，释放了。在那一年，我学到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基督徒应该在那种环境中发出光、爱、和平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学生中有福州、闽南、及其他省份来的，福州和闽南来的分成两派，有闽南同乡会和福州同乡会，他们在学校的学生会、青年会中争执不下，甚至酿成武斗。学校校长和训导长面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我是闽清人不是真正的福州人，与他们关系都很好，尤其是在基督徒同学中更是非同一般。时值抗战时期，学校又迁到了山区，在团契聚会中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校长要我出面调停此事，于是我找了福州和闽南的年长的弟兄，对他们晓之以理：我们都是基督徒，现在又处在战争的非常时期，若是同学之间纷争、甚至械斗，实在不荣耀主的名，也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和他们一同祷告，寻找圣灵的帮助。两派同学的领头人，终于接受我的劝告分别去做同乡同学的思想工作，最后化干戈为玉帛。学校上下都称赞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实在是圣灵运行在当中，为我们做工。正当我春风得意时，有一天校长从福州开会回来，要我到办公室面谈。校长说，我们都舍不得让你离开学校，因为你一年来工作出色有目共睹，成绩斐然，但你家乡闽清县教会办的男女中学因未执行省政府要所有教会中学迁往闽北顺昌县的规定，而被省政府停办。三年来两个学校的毕业生，教育厅不予承认。两所学校的校长、董事长数次到教育厅陈情诉愿，但均未得解决。因此在福州，教会负责人、传教士、两所学校的董事联合向我提出请求，要借用你半年，我只得忍痛割爱，答应借用半年。听了校长这么说，我心里直犯难，那么多人都不能解决，我能行吗？校长知道我的心事，就鼓励我：“我知道难处很大，但你只要尽力去做，如果成功了，几百个毕业生的学籍得到承认，就是为教会、为你们的家乡做了很好的事。”校长的一席话，让我推辞不了，只好接受了。但我心中更多的想到的是，是否还会信守五年后送我到美国留学的承诺？那一年底，我留了一部分行李在学校，带一部分到闽清就任，同时我与陈姐妹计

划结婚，要求学校让我的女朋友也能一起去帮助我，校长同意了我的女朋友一起离校去闽清工作。于是，我带着我的女朋友一同先回福州结婚，那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结婚典礼很隆重，由圣公会第一任华人陈永恩会督证婚。



No está aquí, pues ha resucitado, tal como
dijo. Vengan a ver el lugar donde lo pusieron.
Mateo 28:6

八. 组织家庭



我的家庭

那时，我们结婚既要顾及一些旧的礼教，又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又要按教会的方式来办理。因此婚礼仪式、请什么人来主婚、证婚、邀请什么样的来宾，令我们感到为难。加上我才工作一年，家境贫困，结婚的费用也有一定的困难。感谢赞美

主，祂为我们妥善解决安排了这一切：我在南洋的姐姐们在闽清的哥哥都给我很大的支持。我们的婚礼在福州北门的圣公会的道源堂，也就是我岳父最后任职的礼拜堂举行。由中国第一位中国人圣公会会督陈永恩主婚，来宾数百人。当时不要说买两套结婚礼服，就是租两套结婚礼服的开支也是十分昂贵的。但福州仓前山对湖郑光铨礼服店的老板是圣公会的会友，他免费让我们借用结婚礼服。因为我的岳母是圣公会的全省模范牧师娘，大姨是圣公会进修园的教务长，因此进修园的院长英国人恒师姑 (Miss Hind) 将她的住宅给我们当新房。圣公会柴井医院的护士长英国人 Miss Izard 与我妻子的娘家关系异常亲密。她很热情地提出：我们既在恒师姑那儿做新房，那也应该到她的家做客几天。于是我们到她家做了几天的客人，受到很热情的接待。后来我们回到了闽清老家，又操办酒席，应酬客人。我们这对大学毕业的夫妇回到僻远落后的乡村，自然引起了好一阵的轰动。几天下来，我们都感到十分的劳累，也意识到操办婚事实是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大事。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暗下决心，以后要帮助别人改革这种大肆铺张的风俗习惯，用更简单、更节约、更有意义的方式来举办婚礼。后来我在学校为三位同事办婚事，一切从简，以茶点招待，参加的人

却有全校的师生员工、董事、教会代表、显得更热闹、更隆重、更有意义，一时传为美谈。



九. 任闽清天儒毓真联合中学校长五年

婚后我接任了闽清天儒毓真联合中学校长的职务。原先计划借用半年，但半年后我们都看清了神的旨意和安排，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岗位。因为是一个传福音救人灵魂的好地方：每年有几百个学生来到学校，送上门来听福音、听道，送上门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基督徒，这么好的机会实在难得。其二，我也有本分、有责任为家乡的教会付出我的一份力量。其三，这些莘莘学子十分可爱，学生的家长跟我们都成了好朋友。虽然时值抗战时期，学校又是迁到内地山区上课，但全体教职员同心协力，共度困难把学校办得很好。我们在闽清联合中学前后工作了五年，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深感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同在，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危险、靠着圣灵的帮助，得以一一解决。我们夫妇俩人在神面前同心、虔诚热心爱主，不论何事都把它放在主面前，求主为我们解决，帮助我们解决。这里记述五年中我们所经历的几件大事，几个美好的见证。

第一件事是，学校立案的事情。前面已经提到，因为学校不按省政府规定迁往内地山区，被勒令停办，以往三届毕业生的学籍不予承认。我自己没有办学的经验，但圣灵总是帮助我引导我。此时我想到，既然以往三届毕业生要到教育厅立案，就应该有他们的成绩操行评定等资料。我就在教职员会议上提出，我一定要带一套完整的学生资料以及学校每一年工作报告等去教育厅交涉，大家听了都觉得言之有理。过去都是空手去教育厅，口头交涉不能说明什么。我又提出，学校是卫理公会办的，我们要请求负有责任的卫理公会教育委员会陈芝美博士与我们一同去教育厅力争。会议结束后全校上下同心协力，日夜工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以往三届的毕业生成绩、评语、教育工作总结等资料整理出来。我又征得当时卫理公会教委会主席陈芝美博士的同意和支持，一同到在顺昌的教会学校总校。我们计划由

福州到延平（南平），往延口，再到顺昌。到达南平后，陈芝美博士住进了中南大旅社，我为学校省钱，就到一位以前的同学的学校（现在的剑津中学）宿舍住下。奇妙的很，完全是神的奇妙作为：当时的省教育厅长郑贞文当天也住在延平中南大旅社，第二天就要去福清处理学潮。当晚陈芝美博士带我去见这位厅长。郑厅长留学日本，是一位学者，为人颇宽厚。陈博士是留美博士，是一位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们二位在客厅谈话，我带着资料，等候在门外。他们二位就二次世界大战、国内外形势谈了很久，我几次发出信号让陈博士转入正题。终于陈博士问道：闽清联合中学的事怎么办？郑厅长口气坚决：只能按省政府规定办，以往学生遣散，学校即搬顺昌并入总校。陈博士不愧是外交家，又接着问，厅长明天去哪里？郑回答说，去福清处理学潮。陈又说，那么，厅长去福清后，恐怕也要去闽清了！郑厅长不解其意。陈博士说：闽清三届毕业生（好几百人）的事若处理不当，不给出路，势必引发学潮。这正是厅长最担心的事。陈博士又接着说：看目前的形势，日军不一定会占领福建沿海，况且闽清离福州还有一、二百里，搬一次学校耗费大，损失严重。厅长听了，反问陈博士：那你说该怎么办？陈博士连忙说：闽清联合中学新任校长带来了有关资料在门外等着，可以让他进来谈谈，同时请厅长在学校的报告上签注意见，转教育厅办理。我进到客厅，郑厅长见到我说：原来是你！原来协和大学三十周年校庆时，我时任大学总务主任，又是总招待，当时省长、厅长都光临，也算认识。厅长接着斥责说：“你怎么把学校办成这个样子，而且违抗省政府的规定……”我带着微笑在一旁听完厅长的训斥，才说：我才来闽清联合中学两个月，我是为他人收拾残局的，来给人做一些事后的补救工作，我可没有责任。听完了我的解释，厅长回答说：“好吧，我可以写一封公函，你随同资料一起交给教育厅代厅长郑坦博士。”说着郑厅长写起公函，最后写上：照章办理。我虽不通公函的讲究之处，但这几个字等于学校立案的事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于是我对厅长说，你这样写，有写等于没写……郑厅长笑了：“年轻人哪，你还不了解官场的奥秘，像

这样省政府规定的事，我若按你的要求写“照准”岂不是违抗省府命令？正式公函写“照章”，我私人另写一封信给你带去，不就照你们的愿望办了吗？”我又向厅长打听分管中学教育的科长是何人，厅长说是某某人，我一听真是高兴至极，竟有这么巧的事，此科长正是我大学同班同学，真是神奇妙的安排。第二天我们送别厅长，和陈芝美博士立刻赶往洋口，在洋口陈太太设宴请我，我与陈太太在福州时，就已经十分熟悉，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当时福州基督徒佈道团团长。他们夫妇待我如一家人一样。第三天我动身去了顺昌，当时任基督教联合中学校长的是杨昌栋博士，他也兼任神学院院长，是我上中学时的校长，又是主内的好朋友。我很顺利地办完了手续就赶回永安。在途中我再一次经历了神的爱、神的拯救和神的大能。使我得到一切及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4：16）我先乘小汽船由顺昌去南平，开船时因天下着小雨，船上的八十二人都不知道前两天上游地区的闽北、江西一带下了暴雨，引发山洪暴发。船只行走了半个小时之后，高达3米多的山洪正汹涌冲向我们的水汽船，船象小树叶一样被洪水直冲而下。闽北多高山峻岭，江河两岸的巉岩和江中的礁石，随时都可能将水汽船撞得粉身碎骨。瞬间，船上的人大呼小叫，小孩的哭喊和大人的惊叫声乱成一片，许多人跪在船舱或甲板上，求告菩萨保佑。我心中也非常惧怕，想到自己才二十多岁，新婚不到两个月，难道今天真的葬身此地？但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可以求告主。我立刻祷告主：“主啊，我心中惧怕，求你怜悯眷顾，拯救我，也救这船上人的性命！”祷告之后，我心中顿觉平安。我出门身上总是带着一本小圣经，我拿出圣经念当日早上要念的圣经。我记得很清楚，是马可福音第11章。当我打开圣经，立刻看到有一处的经文特别亮特别醒目，一看是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站在这一节圣经上，心中充满了喜乐和信心。我在激烈摇晃的船舱中站起来，

唱起：“天父必看顾你”这首短歌。我越唱越大声，一旁正在哭喊的人破口大骂：你疯了！船眼看就要沉了你还有心情在此唱歌！我微笑着对他们说：同乡们，不要怕，我是基督徒，刚才我已经祷告我的上帝，拯救我，也要拯救你们大家，不要再哭喊，不要再拜你们的菩萨了，只有创造天地的上帝才会救我们。“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惟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事奉的神，祂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祂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徒27:22-25），在极度的危险当中，人们在惊慌之中，听到有人这么有把握说这些话，都不敢反驳。此时洪水更大了，浪更高，船飞也似地被水冲下，我看了看手表，船失去控制有二十多分钟，但就象过了几年。就在此时，奇迹出现了，本来两岸都是岩石，忽然在前方江边有一片细竹林，受江水的冲击，倒伏在江中，彷彿江中一片“软陆地”，船瞬间被冲上这片细竹林，速度慢了下来，好像坐在沙发上。船员和旅客乘机抓住竹梢，船终于停在其中不再漂流了。因为上游不再下暴雨，闽北的山洪一般1—2小时就过去了。我们的船搁在竹林中约有一个多小时，洪水差不多就退尽了。大难不死的人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想到圣经上有许多见证，遭遇患难时，就是其中有基督徒，神为了拯救他们，其他的人也同时得救，我心中大大感谢赞美主。我对船上的人说：你们要相信我所接受的，赶快接受刚刚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相信，有了这次经历他们一定会认真思考我的话。船又重新发动，继续行程，只是比平常晚到两个多小时到达南平，所有的旅客安然无恙。第二天我到了当时省政府所在地永安，见到同学朋友述说这次奇妙的经历，大家都同声感谢赞美主。在教育厅，原来有我的同学、朋友十多位，他们在三天内帮助我办妥所有手续，随后我就赶回闽清。到达闽清县城将近下午三点，离我们学校还有五十多里的路程，正值抗战时期，为防止日寇入侵，所有公路都已毁坏。我想为学校节省开支，也不习惯坐轿子，心中又想早些见到新婚的妻子，早一点将好消息带

给学校，因此连夜步行走了五十多里山路，半夜十一点多到了学校。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已得知我在永安成功的消息，虽已深夜，大家都等在操场，我们见面时那一阵感恩、快乐、赞美我们的神的场面，言语无法表达，终生难忘。在闽清的宣教士Rev. Loren Humphrey 也是校董事，他的太太是学校的英文教师，为庆贺我的成功，特地准备了一席丰盛的西餐，招待我和我的妻子。抗日战争在乡下要准备一桌西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我办成了多年来未解决的事，县内上下都轰动了，赞不绝口。但我们都清楚，这完全是神奇妙的安排，是圣灵帮助我们，我到处诉说神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把这一切归给神。“耶和華啊，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要因祢的慈愛和誠實歸在祢的名下！”（诗115：1）

我们本来计划在闽清工作半年，就回协和大学去。但这半年，神借着许多事情以及圣经的话语，使我们有了新的计划：虽然回大学工作，于学业、于名位都有利，但在中学工作能更多接触教职员工和学生。一来到闽清，我就想到，学校既然是教会办的，就应该不同于一般的公、私立学校，我得救重生时，曾立志要广传福音，“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现在当校长、办教育，没有许多时间去事奉，但摆在面前的一千多师生员工，不正是传福音的对象吗？我要把学校办得像教会、像礼拜堂。我写信给大学校长，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校长立即回信给我，让我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什么时候觉得工作做好了，再回大学工作。于是我就托我在大学最要好的朋友翁绍耳，当时他留校在农学院任助教，请他将我的行李带回福州。我就在闽清开始了我的校长工作，我决心把学校办成基督化的学校，在学习质量上也要出类拔萃。

抗战时期，大学毕业生要去内地工作的很多，而在福州附近的闽清成了最佳的选择。我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应是基督徒，而且品学兼优，经过整顿在校的老师40多位四分之三达到了这个要求，个别受不了这样严格要求的教师，便借故离职了。我征求同工和学校同事同意后，决定每一学期全校有两次大规模的聚会：开学时的佈道会和学期

结束时的培灵会，每次7—10天。在事奉的事情上，我们从不吝惜钱财。我们从各地，上海、福州、厦门、请来牧师、传道、佈道家、奋兴家来主领聚会。我在校五年每年四次，前后二十多次的大聚会，每一届的毕业生多数都重生得救。平时每周有四天早上是朝会，教职员或当地牧师轮流查经、讲道。我自己带头奉献，带动全体教职员重视奉献。每一年全校的献金足以供应一户五口之家的牧师家庭的生活。我们的学校被当时的卫理公会称为模范的基督化学校。这完全应该感谢神带领我来做这些工作。

我在闽清任中学校长五年中，几乎访遍闽清县内所有的礼拜堂，有时和教区长有时和传教士同去。我在礼拜堂讲道、举行佈道会、培灵会，我觉得自己虽然是中学校长，在教育上尽力，但我也也是基督教年议会成员，并按立为副牧师，我有责任关心县里的礼拜堂，应该将我所信的、所接受的真理向未信的人传讲，做见证、荣耀主基督的圣名。因此在闽清五年，我当校长办教育同时也作牧师、传道很蒙神的祝福也蒙圣灵的带领。我深有体会，教会所有的工作，若不是圣灵的作工就一事无成。教会冷淡还是复兴，就看有没有依靠圣灵的工作。

闽清天儒男中学在县城，毓真女中在六都，二校合并后搬到原女中所在地，校舍不够租民房。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我们决定将学校搬到县城原男中学校址，但校舍还是不够，于是在六都设分校。我们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在暑期搬学校，非常艰苦。学校搬到县城后，距省城福州更近了，学生人数剧增，于是我们计划扩建校舍：可容纳1,200人的大礼堂、膳厅、教职员及学生宿舍。在当时规模算是相当大的。学校的经济相当困难，又是二战时期，校董事会拿不出款来，教会也不能在计划之外拨款，无能为力。我们决定靠自己来筹措一笔款：开学时学生交来的学费、教会一次性拨给的经常费，先用来订购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因为估计建材必定会涨价。在开学典礼上，我宣布同心协力扩建校舍，获一致拥护。学校位于江边小山上，木材、砖、瓦就由水路航运，我带领全校师生义务劳动，肩扛手抬花了几天的时间将建材从溪边搬到了工地。地基的石头，也靠师生

们双手从溪里捞出的鹅卵石解决，节省了一大笔费用，让工程顺利开工。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经费仍然不够。感谢主，仰望和信靠祂的人，从不落空。正当我们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全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总干事来学校视察，住在我家里。晚餐的时候，他问起学校扩建资金的来源，我如实向他报告，并说明困难处境。因为他问起，我才告诉他。他接着问，还差多少？我说至少三万元。他并没有表示什么。第二天我送他启程，他对我说：全国基督教大学、中学不下170所，在抗战期间能够自筹经费，盖1200人的大礼堂，只有你们的学校，力宣德会督告诉我，你是不忍心让学生每天早上在寒风凛冽的操场上聚会听道。过了半个月，我收到了一封电报，全国教育协会拿了五万元给我们学校，原来这位教育协进会的总干事，对我们这种在抗战困难时期，能够励精图治办学治校的精神，很赞赏，因此在教育年会上，特别提议拨给闽清联合中学这一笔款。对我们来说，这笔款真是及时雨，我们不仅建了大礼堂、大膳厅、还建了四层的教职员宿舍楼，共计16单元。这再一次让我们见证了神的大能和大爱。主啊，祢真是耶和華以勒！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意思就是“耶和華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预备。”（创 22：14）。



十. 拒绝神的第一次呼召

我是一位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我的读书生涯，从小学，以后到南洋又回到国内上职业中学一直到大学，多半都是半工半读。到我大学毕业，本来留校工作已经是很理想了，而且校长又答应我五年以后，由美国董事会资助我去美国留学。这是我梦想不到的。那时我还有一个决心，要与我的哥哥共同来兴旺我的家庭，不然在乡村是没有出路的。我应该尽量赚钱，而且认为基督徒只要不是不义之财，是可以去赚的。那时我很贪爱世界，贪爱世界的名、利、地位、还有金钱。我在闽清联合中学一干就是五年，原来大学校长给我去美国留学的承诺，因为我不在大学工作也就自动放弃了。但是在第五年的时候，神又给我一个好机会。在美国的卫理公会设立了一个奖学金，为在二次大战中遭受痛苦的卫理公会的基督徒提供留学的机会。中国卫理公会有一百个名额。分五年进行，第一年20名。福建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卫理公会主席 Bishop Lacy（力宣德）。抗日战争时期福州年议会总办公室搬到六都，也就是我的中学所在地。他常常来视察，常来开会，因此他对我们中学举办的许多基督教会活动很清楚，对我们学校为主办学为教会兴学的宗旨很赞赏。因此他提名我为全国第一名赴美国留学人选。这时，神第一次呼召我，就是当时的年议会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当牧师，因为我由协和大学毕业以后通过考试已经是副牧师了，年议会希望我留下来专职做传道，牧师，同时兼任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或是总干事，以便处理抗战时期年议会和教会工作方面的问题，而在这方面又特别需要忠心为主做工的人。可是，我没有接受神的呼召，却写信给年议会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这在以后在我受管教的时候，我才领悟到这是我第一次拒绝神的呼召的结果。

福州第二次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有大批难民涌向与福州距离不远的闽清县，连医院都充作旅社住满了人。我们的家也腾出来让逃难

的人住，住了两家外国人。一个是任省盐务局长的英国人Peterson先生一家，另一个是任省邮电局长的丹麦人Cuqigard 一家。我们还留了一间给往来的宣教士。许多盟军军人由闽南撤到闽清，再经南平转往内地。亲友们也有来投靠的，因此我们的住房成了名副其实的接待站。那一年我们接待的人数总有上万人之多。那时的生活十分紧张艰苦，白天上课，在教室里吃饭，课桌和地板便是晚上睡觉的床铺。供水也发生了问题，井水都抽干了。这个时期，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当时因为医院挤满了人，无处接生，恰好我太太的二姐从福州逃难来，她是妇产科医生，于是就在家里接生。那天正好是十月十日，双十节，便给她取名“辉”。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名叫 Isaac 意思是我们夫妇要把第一个孩子奉献给神，将来奉献给神做传道。这孩子的出生比预产期晚了14天，12月25日出生，因之取名叫“圣”，纪念耶稣降生。学校搬迁以后，坐落在半山中，树木、草丛茂密，多蚊虫。小孩被蚊虫叮咬，染了重病，没有几天已奄奄一息。医生也束手无策。学校的总务已备好木材，预备做一个小棺木。那天晚上，我和太太抱着2岁的小孩，跪在主面前承认我们不应召当全时间传道的罪。我答应将来留学回来一定应召。我们在小床前流泪祷告：主啊，小孩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也愿意把将小孩奉献给主，现在他才2岁，主就要接他回家吗？求主留他活命吧！可是小孩的情况越来越坏，双眼紧闭，牙关咬紧，已不省人事。那天晚上，我们通宵未眠，一边流泪一边不住地祷告。第二天一早我陪同一位夜里刚刚来到的英军军医吃饭，其间这位少校军医问我，昨天夜里房间十分吵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回答，很抱歉因为我的孩子病危，快死了……，听我这样说，他马上截住我的话：“感谢主，我是一个医生，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孩子？”我心中一阵的感动，我觉得这是神在我的孩子危难的时候为我预备的，让这位军医来诊治我的孩子。我立即带他上楼，他看过我的孩子以后说：“感谢赞美主，你的孩子还有救，他得的是恶性疟疾，已经侵袭到脊髓，若到了大脑就无法救治。真是奇妙，同盟军在东南亚热带丛林作战，常患疟疾，

盟军总部最近刚刚配发一种治疗疟疾的特效药，Posmo Quinin只有这种药对恶性疟疾有效，盟军官兵每人一瓶，我是昨天刚刚领到的。我现在给你几粒，一粒分六次给他服下，我马上要赶往内地，你自己给孩子服药，我想应该会救活孩子的。”说完他拿出瓶子，一下子倒出36粒给我。我表示用不了这么多，他说不要紧的，以后学生、教职员也许用得着。当天早上这位军医就离开闽清往内地去了。我便照着他的吩咐给孩子服药，服到第二次药以后孩子就挣开了眼睛，第三次服药后，孩子会要水喝。此时此刻，我们心中对神的感恩、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实在是言语难以表达的。我们赞美主：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俯听我们的祈求，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是祢亲自差遣借着英军军医的手，医治拯救了我们的孩子，彰显了祢奇妙的大能。主啊，祢真是慈爱从不误事的救主。

那一年，福州第二次沦入日军之手，由前方撤下的盟军由我们接待的多达一百位以上，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虽是战争的艰难时期，我们竭尽全力接待他们。当然面包是吃不到，而且鱼肉也少，我们只有米饭、咸鱼、青菜。盟军官兵爱活动，常常在学校操场上与学生们进行排球友谊赛。福州沦陷之前有20多所的大、中学迁来闽清，以学生为主的青年军有300多名，集中在操场训练，阵容十分威风。为了便于与盟军沟通，我还特别为青年军编纂了一本简易的汉英口语小册子发给青年军官兵，为抗日战争、为国家尽了一点力。

这期间我自己违背圣经的教训，做了不符圣经教训的一件事。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不应为自己不知实情的人、外人作保，“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箴 17：18）“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当。”（箴 20：16）但我由于人情难却，为人作保招致很大危险和烦恼。要我作保的人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大学同学。这个大学同学在政府中当官，为人古怪、凶狠。此人的弟弟纠合十数人干起了土匪的营生，抢劫了一位富商，成了县里的一个大案。当局下决心查办，不久就将这帮土匪抓获。这位

同学由抗战时期福建国民政府所在地福建永安赶回闽清，到监狱看他的弟弟和他的同伙。他编了一套话来骗其它的土匪。他称自己与当时的福建保安司令黄珍吾以及他手下的两位处长是好朋友，只要他弟弟先获释，证明无罪，下一步再来救同伙，也会获释。这伙土匪听信了他的诡计，欢天喜地，答应一旦省保安司令派人来调查时统一口径，以至承认各自有罪，但都证明其弟是无辜的，并无参与抢劫。这样，只要他弟弟出狱，就设法来救他们，接着他们就按计划进行。后来，这同学来见我，虽然我早知道此人在乡间口碑不佳，但碍于同学情面，而抗战期间又不好得罪这样的官员，以免日后麻烦。一见面，他就说，刘学弟，这一次你一定要帮一个忙，我弟弟品行的确不好，可是他确实没有参加抢劫，只因便衣队公报私仇，乘机将我弟弟抓了进去。我今天到过监狱看过他们，那十一个人都已经认罪，并且一致证明我弟弟没参与。你身为校长，与我世交，难道见危难不救，不帮我救出我无辜的弟弟？我问他我能做什么呢？他立即从口袋里拿出早已备好的陈情书，请了十二名社会名流为他签名作保，他要直呈保安司令，请求平反。我一看陈情书，我的名字竟然摆在第一名，心里直犯难，转而一想，陈情书已经写好又只是请求保安司令派人调查，结论又不是我来做，于是就在陈情书上签名盖章了。他拿着我签名盖章的陈情书去找另外十一位，大家看到校长都签了名，应该是可靠没问题的，都签名作保，不久命令下来放人，而其他十一人就只有继续坐牢的份了。这下子我惹出祸来了，因为这件案子是由县保安队办的案，如今上头命令放一个人等于打了便衣队一记耳光。便衣队队长一查就知道是我带头签名作保，为此人平反，就与我过不去，他的部下决定要吓唬我一下。不几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当心你的脑袋，今后跨出校门一步，性命不保！”过几天又来了同样的匿名信。我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但是我心里明白，在这件事情上我违背了神的话语的教导，上了恶人的当。接到信后我不敢出门，但身为校长，正值抗战期间，许多事都要我去办理，有各种会议要去参加。我不敢出校门，整天心事重重，我的太太也为我担惊

受怕，一个月体重减了好几斤。我向主认罪，祈求祂的拯救，教会的肢体也都为我祷告。感谢赞美主，祂有怜悯、祂有慈爱、祂恩待我、拯救我：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我的一位同乡好朋友任国民政府的少将军医，由抗战时的陪都重庆回乡探亲，特意来学校看望我。见面之下，他发现我心事重重、愁容满面，而且消瘦了许多。便问我什么原因，经他这么一问，我禁不住当着他的面哭诉了事情的始末。他听了之后立即说，没有关系，县便衣队队长的哥哥是他的部下，而且二人的关系很好。说完他立即找县便衣队队长，说明缘由。便衣队长笑答，这件事是他的手下瞒着他干的，他知道刘校长为人厚道，被别人利用。当即表示今后不会为难，这件事最终得以妥善解决。

那时卫理公会华南教区会督力宣德的哥哥力陶安对闽清教会及教育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他要退休回美国。此时，我们学校的礼堂已竣工，就请会督莅临剪彩。本来我应该主持剪彩仪式，却得了重病。我自省自己病倒有几个原因：一是这几年在闽清办教育，成绩骄人，心中颇自负，为了事事能更上一层楼，连续辛苦操劳，不注意劳逸结合。二是，忙于学校的公务，教会的事奉少了。当初来闽清立志传道，事奉为主，但却轻重倒置，更多的心力放在校长的工作上，辜负了神的期望，亏欠了神的嘱托，神给我的管教。更主要的是，搬学校的那一年，神第二次呼召我，应该出来全时间事奉，当时我心中答应神，学校礼堂盖好了，新校长人选确定了，我一定献身当牧师。但是事业蒙神祝福大大成功之时，又得知卫理公会选送一百名中国的教牧、医务人员往美国留学，而我因为条件合格，名列福建地区第一名时，兴奋得几天几夜不能入眠。自认为这是神给我的机会，就放弃了当初对神的承诺，拒绝了神第二次对我的呼召。神给我很重的管教：连续几天的剧烈头痛，医生都束手无策。我决定去福州治疗，但在赶往码头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无法上船，只好又被抬了回来。学校的人都吓了一跳，以为我不行了才抬回。后来又到了福州，医生仍然查不出病因。但我心中明白这是神的管教。我流泪求告神，让我留学回来后事奉神、献身当牧师。在医生都束手无策之时，是祂亲手医治

了我的病。“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30：20；21）“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12：10-11）病后我身体极度虚弱，于是我就留在福州休养了两个月，准备出国。



十一. 福州协和医院代院长一年

当我还没有得到卫理公会给我的留学美国名额时，我的好朋友著名的外科教授邱少陵博士去美国 Maye Clinic 医院当医生，也在 John Hopkins 医学院工作。邱医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计划在福州设立一个福音医院，即肿瘤外科医院。他已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十五人的董事会，其成员除了邱医生外，我只认识其中一位是福建协和大学的 Prof. Scott 教授。邱医生选定我为未来福音医院的院长人选，同时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为我申请了一个奖学金。

抗日战争结束前两个月，由蒋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和军医署署长林可胜（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儿子）的邀请，邱少陵医生由美国经印度回到中国大陆，任陆军医院外科主任。两个月后，日本投降，二次大战结束，邱医生又兼任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外科系主任及附属上海仁济医院外科主任。他的母亲、太太、孩子都在福州。邱医生回福州探亲，就在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也成立了一个福音肿瘤医院。医院的董事会由福建医务界及社会名流组成。我是董事之一兼总干事。我们计划在福州的烟台山建医院。因为董事会成员都是社会名流，我们的计划不到一个星期就获得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批准，不久邱医生返上海。后来邱医生考虑到福州还没有自来水，电力及其他综合条件尚不具备建医院的要求，因此他先在上海创办了一家福音医院，以治疗肿瘤及癌症为主。上海福音医院在经费和设备上得到了美国董事会及科研单位的大力支持。美国当时希望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合作开展肿瘤尤其是癌的治疗研究。我留学美国回国后，邱医生仍要我去上海任上海福音医院院长。当时大陆已解放，我决心献身当传道，于是介绍我的好友，也是我大学的同学廖登贤医生以及好几位主内兄弟姐妹到上海福音医院协助邱医生工作。

现在再回到本章开头的话题。当我由闽清来福州后，教会得知邱

医生为我申请了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奖学金，感到教会也需要像这样的人才，况且如上面说过的，美国卫理公会赴美留学100名名额中我是福建的第一名，又对医院的工作有兴趣，因此决定将我送去美国念医院行政管理，回来后可以专职负责教会的医院的工作。二次大战结束后，地下共产党大大扩充实力。当时福建官办的医院不多，水平差，而教会在福建有34所医院，其设备、人才在当时都是一流的。但是各家医院的院长多是外国人，因而成了地下共产党攻击的目标。针对这种形势，教会计划把全省教会医院合并，加强实力，同时培养中国人的院长。福州协和医院属于美国卫理公会、中华基督教会和英国圣公会联合组成的董事会管理。经费、人员也由三公会分派。除了外国专家教授外，国内许多著名的医学专家都曾在协和医院任职。协和医院的病房、电梯、放射科的镭射都是省内唯一的，其规模和医疗水平也是福建第一流的。教会计划先把协和医院，塔亭医院、柴井医院联合为一个医院，等我去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将全省34家教会医院联合起来，由我任总院的院长，旨在大大加强教会医院的实力。照此计划我必须立即动身去美国。但我想带我与我一起同甘共苦的妻子一同前往，当然她不能再占用教会的留学的名额。但由教会为我们申请学费奖学金，拟在Nash Teen Scarret College Peabody 及Vanderbilt University 求学。这时，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我们只好延后一年赴美留学。协和医院原院长Dr. Dyer 例假回美国，于是教会安排我用这一年的时间去协和医院当代理院长，熟悉医院的管理工作。医院对第一个中国人的院长到来十分重视，各科室主任、护士长、护士学校的校长都是外国人，都尊重我支持我。刚上任，我便对医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针对药房药品以及医院粮食、柴火等采购上存在的弊病进行整治。原先负责药品采购是一位德籍的犹太人，也兼X光室主任，他的太太是小儿科的主任。他平时收受药商的好处，药品价格任由药商定。我上任后立即收回药品的采购权，药商送礼来，即加回绝，声明我是基督徒，决不会收受贿赂。“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利，摆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



我曾任代院长的福州协和医院

赛 33: 15)，一定要送礼来的，一律交由医院总务处营养室处理。从此药品价格得到严格控制，其他物品采购也采取同样方法处置，医院的效益明显提高许多。我上任的第二天，院内就发生了一起命案：医院护士学校一对闽东来的姐妹，其妹因为行为不检点，有了身孕，自己乱吃堕胎药，引发出血住进了医院，用西医方法救治。负责治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主内姐妹刘医生。刘医生很有爱心、工作认真负责，亲自为她输液，未料，输液不到十分钟，病人发冷，不久就昏迷，即告不治。当时闽东30多位大学生经福州去内地上大学，闻知此事后，来医院鼓动风潮。医院内谁也不敢插手，我虽上任两天，身为医院院长，不得不出面调停。学生言词激进，闯进医院要抓刘医生，医院人心惶惶。我们除了祷告以外，别无他法。正在焦急之中，我想到抗战期间曾迁址到闽清的福建学院的院长郭公木先生，是闽东人，在当地颇有影响，另一位是当时的福建国大代表石垒先生，他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我请他们及医院的董事会同仁，一同出面调停，但仍未能完全解决，因为学生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难以接受。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曾为当时福建保安司令黄珍吾的孩子看过病的医院小儿科主任Dr .Norman 医生自告奋勇找黄珍吾救急。黄珍吾当然知道这些学生有地下组织的背景，就派人会同院董事会与学生代表谈判。因为保安司令和宪兵的干预，历时一个多月的风潮终告平息。当然院方也给了死者家属十分可观的抚恤赔偿。经过这一事件，我看到教会的医院、学校成了斗争的目标，更感到教会医院联合起来统一管理的重要。

我在协和医院一年的时间里也着重倡导基督教活动、大力推崇灵修生活，不但动员医务人员参加，也向病人传福音，有许多病人得救重生。我在医院里盖了一座小礼拜堂，同时经过董事会的批准为医院的院长和住院牧师盖了一式一样的二幢小洋楼，以示住院牧师与院长是同样重要的。我为医院请了一位牧师和一位女传道，这在医院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留下为数可观

的野战医院和后勤物资，由中国卫理公会医院接受这些物资。我和两位宣教士医生被派到上海去接受分配这批物资。到了上海看到极丰富的物资，从医院的设备到药品，各种生活用品、食品应有尽有。二次大战结束，美国货对所有的人，尤其对贫穷、落后的中国人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有的贵重药品、器材的价钱，够得上百多个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我看到不少各地来的教会医院的代表，乘机中饱私囊、贪污私分。看到人们因贪心犯罪，心中触动很大，十分难过。感谢赞美主，给我一颗爱主诚实对诱惑不动的信心。“我不求祢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祢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注：或作“脱离罪恶”）。”“求祢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祢的道就是真理。”（约 17：15，17）

协和医院招收实习医生，以往要求外省名牌教会医学院的毕业生，像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医学院等，而轻看本地福建医学院的毕业生。但当时福建是一个落后的地区，即便是本省在外省名校的毕业生都不愿意回福建来，更不用说外省籍的毕业生了。我觉得应就地取材，选拔本地医学院培养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是其中的基督徒。因此我上任后，力争在协和医院史上第一次接收了六名福建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基督徒。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批医生都成了福建医学界的栋梁材。从此协和医院每一年都接受一批福建医学院的毕业生同时也培养本省的基督徒到外省名医学院求学。我去美国留学后，医院的外国医生又联名请古田教会医院院长普天寿（美国人）来协和医院主持工作。工作成绩平平。此时中国政局形势突变，共产党军队向南方紧逼。北方许多教会学校、医院纷纷南迁。山东齐鲁医学院便是其中之一。迁到福州便将协和医院作为附属医院，由该院外科系主任Dr.Yang 接任院长。直到中国大陆被共产党接管后，齐鲁医学院才迁回济南。美国留学后我回到大陆时，已献身当牧师，但兼任协和医院董事，为医院做许多事，直至一年后医院被政府接管。

回顾在协和医院一年，我觉得这是神的安排，神愿意让我在那里得到学习磨练的机会，也让我在医院的岗位上服事祂的教会。感谢赞美主，这期间遇到各种困难的事件和问题，实在不是凭我的能力、

学识所胜任的。但我却能在院长的位置上工作，处理医院日常和突发事件，而且进行有益、有成效的改革，完全是靠圣灵在我心中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在医院一年，病床由120张增加到150张，新增了好几个科室，医院的效益大大提高，医院的宗教生活、属灵气氛倍增。特别要感谢主的奇妙安排：神安排我在协和医院一年的工作经历，以及在大学时协助邱少陵医生从事医务工作，为日后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关在山区七年多的犯人生涯，正当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有了一技之长，得以死里逃生，在山区当医生，为农民看病、为干部看病，为主作见证、传福音荣耀主名作预备。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真是奇妙，祂的旨意何等美好。“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祂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赛 12: 5）“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 2:10）



十二. 在美国留学两年的日子



我們在美國留學時與美國朋友的合影

我和太太准备去美国留学，当时申请护照颇不容易，需要本人亲自到南京国府外交部办手续，交十块大洋的手续费。闽清家乡的亲友们闻知我夫妇俩同往美国留学，感到是一件荣耀乡里的事，有友人为我们介绍其兄吴其玉博士，他是当时燕

京大学代校长，同时任国府外交部顾问。吴博士以他的名望和地位为我们很快办好了护照，又以我是传教士的身份为我们的大儿子、大女儿也办了护照。这个消息传到差会人士中，不久在福州的传教士也知道了。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的代表 Mr. Hayes 为此向卫理公会美国总会报告此事。不久卫理公会远东总干事 Dr. Cartwright 发电报给我，指出我们不宜带孩子去美国，若坚持带孩子，我的奖学金可能被取消，我们只好打消带孩子一同去美国的念头。这件事表明，我当时的“雄心壮志”追求世界的荣誉、贪爱世界。实在是神的拦阻：若是带小孩去了美国，我们就会不想回到中国，因为美国的文明、科技进步、物资丰富对每一个人都是有诱惑力的。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中国，我们就没有机会在那样非常的环境中事奉神，也就不能依靠神的眷顾、保守和带领，为主所用，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就没有背负十字架的的经历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如期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卫理公会总部的所在地 Nashville。

当时由卫理公会选派来留学的学生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教会已为我们安排在 Vanderbilt University 攻读学位。此乃美国南方有名的大学，宋子文也毕业于这个大学。

因为我是以传道人身份来美国，学校安排了一大套的房子给我，同学们常常在我们家举行聚会。到了年末账单来了，才知道要交360美元的房租，由我每年的奖学金1600 美元中扣除。我们赶快搬到一个小住房，以节省开支，我的太太选读营养学和儿童教育。我自己念医院管理和医院必修课程。我们靠一个人的奖学金来维持学业和生活的开支，因为我的妻子没有奖学金。这时发觉我妻子又怀孕了。我们用周末的时间为同学们打字，增加一点收入贴补家用。因为我来自中国，而许多美国教会则让我到他们的教会讲道。按外国的习惯，教会会给讲员一些信徒奉献的款，我很不习惯接受这样的款项。但他们说要是我不收这款，则表明我嫌少，于是我只好收下。那时大学的伙食费为每人每月30美元，我们则自己在家煮食，节省了许多。我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日子虽然过得并不富裕，但却也够生活的费用而略有结余。我们到的那一年，正逢卫理公会在中国建立教会一百周年纪念。因为福州是卫理公会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建立的第一间教会所在地，因而极为隆重的纪念活动在福州举行。卫理公会总会在波士顿召开四年一次的会议，会中有一个节目《中国之夜》选一百名中国留学生上台。我作为中国来的代表也在其中。由教会提供路费而且有两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到各地参观医院。我特意到美国陆军总医院拜访，由邱少陵医生介绍在美国组织的中国福音医院董事会主席 Dr. Peterson。他是陆军有两万个床位医院的外科总主任，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是奉中国福音医院董事会的委托来向他报告医院筹建情况，又有邱少陵医生的介绍，因而 Dr. Peterson 对我关怀备至，热情招待，亲自带我参观拥有二万多床位的陆军医院，又在餐厅请我吃美国牛排。由于我没有吃牛排的经验，面对一磅半生的牛排，使尽气力奈何不得，最后只好放弃这块牛排。我在那里有几天的时间和他讨论美中联合在中国办肿瘤医院的设想、计划、组织安排，获益匪浅。从此我和他建立了通

讯联系。没有想到，到了1950年我回到中国后，收到了 Dr. Peterson 的圣诞卡，内中写了几节经文，告知他太太生了一个女孩，小孩7个月早产，蒙神保守一个月一个月地健康成长，因此每个月选一节圣经，共七节祷告、感恩的经文送给我。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教会已和国外的教会断绝了来往。政府管理宗教的不懂英文，更不明白圣诞卡的作用，看到这张圣诞卡寄自美国，而且是陆军医院寄来的，便认为我由美国回来一定身负情报特务的使命，因此审查、迫害便接踵而至，这是后话。

我妻子怀孕后，一家三口单靠我一个人的奖学金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此我只得半工半读。我做的工有周末为外国学生打字准备他们要交给老师的报告、文件。我12岁在南洋时便学会打字。在中学和大学都曾靠打字来赚取生活费，想不到到了美国还要靠打字来维持生计。在美国打字的收入，比在学校膳厅做两小时杂工得到一餐免费的午餐要高得多。学校安排给我们一套住房，我们原以为是免费提供的，到年终才知道要从我的一年1600美元的奖学金中扣除360美元缴房租。这确实让我们感到心痛。于是立即去找廉价房。主特别眷顾我们，不久我们就遇到以前在福州英华中学教书的 Ms .Semester. 这时她在 Scarlet College 任教授。她的父亲也曾任福州当传教士，她的母亲我们称呼 Mother Semester. 他们在 Nashville 近郊有一幢房子。他们热情地为我们在地下室装修了一套住房给我们住，不收房租。但我们需要为他们开车库门、花园的修整种植以及冬季给暖气炉加煤等。虽然生活俭朴，却也过的平安快乐。

这样过了一年，一天早上我的妻子洗过澡，站起来突然发现在左肩膀和锁骨之间有形同鸭蛋的肿块。我们都很紧张，立即将病情告诉实习时的那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他十分认真、慎重和关心我妻子的病情，立即召集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医师会诊。决定立即手术。因肿瘤所在部位有许多血管和神经，手术难度很大，医院列为重大手术。我告诉医生，恐怕不能手术，因为她有身孕，因此医院决定分娩后手术。我查问手术的费用，医生说，两个手术各800美元，一共1600

美元。我一年的奖学金也只有1600美元。，因此我对医生说我们回福州去分娩，可以节省费用。但医生都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国的医院不行。实际上我们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面临分娩和颈部的手术的巨大医疗费，觉得无法继续留学，想回国再作打算。我们在祷告时心中平安，感到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果然，我妻子体检后的第三天，院长对我说：刘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医院经过研究，认为你已经在我们医院实习半年了，今后还要继续实习，你可以享受我们医院成员的待遇，你妻子分娩和颈部手术的费用全免。我们实在大大感谢主的恩典。几个月之后，四八年的六月，我们的小女儿刘美在医院出生。当地除了几个留学生，很少见到中国人，因此刘美的出生成了当地报纸的一大新闻，报社、杂志的记者纷至沓来采访、拍照，天天在报刊、杂志上大加宣扬一对留学生夫妇生了一个千金小姐的新闻。公司、工厂、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送礼物、贺卡、送鲜花。更有的工厂、公司希望我们为他们做广告。我妻子分娩六天后，准备做颈部的血管瘤的手术。当地卫理公会的牧师 Dr. Webster 是一个有威望很有学问的人。我除了在卫理公会做礼拜之外，也与许多别的教会有往来，为的是多了解美国的教会。手术的那一天，一早我送我的妻子进手术室，因为是清晨，牧师以及许多朋友、国内来的留学生都未能赶到，我顿时倍感孤单举目无亲。我乘电梯到医院顶层的阳台，一个人独自在那里流泪祷告。心中牵挂我妻子手术是否顺利平安；长的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一直无法平静。我跪那里有三、四个小时，感谢赞美主，此时有主的话在我心中升起：“你当将一切的事交托耶和华”，“你当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祂顾念你们”（彼前 5: 7）。“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祂，祂就必成全。”（诗 37:5）我用仰望的心灵在那里唱：“天父必看顾你”这首歌。贞娟的手术前六个小时，手术开始后不久，许多的牧师、传道、外国的兄弟姐妹以及许多的中国留学生都来到医院，他们到处找不到我，因为我独自一人在医院顶层的阳台上祷告。手术进行三个小时后，我才走到手术室外，看到这么多的兄弟姐妹都在关心我妻子的手术，为她迫切祷告，

这种出自主的爱，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在异国他乡在我遭遇患难倍感孤单之时，是众弟兄姐妹带来主的爱，给我莫大的安慰和鼓舞。手术后贞娟由手术室送出时尚未恢复知觉，看到她的脸色那么苍白，我心如刀绞，异常伤心和难过。我心里明白，贞娟突然在颈部的凶险部位长出一个肿瘤：是因为我没有回应神第一次的呼召，又拒绝了神第二次的呼召。早在贞娟手术前几个月，我已明白，肿瘤突然在她身上发现，是神对我的管教显明在她的身上，神要彰显祂的公义。我在主面前呼求：主啊，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辜负你的爱，你第一次呼召我，我贪爱世上的名誉地位，第二次呼召我，我仍然放不下世界上的荣誉地位，我们夫妇俩人一同来美国留学是很少有的，在世人看来，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前途无限。我舍不得我的学位、我舍不得这个世界、我舍不得我的名誉地位金钱，我很难接受留学回国作传道牧师顺服神对我的呼召，但神已经把管教显明，也有预兆提醒我们。我跪在那里流泪祷告，恳求主说，你要我回去作传道，我愿意顺服了，只求将这个管教挪开。我在祷告时，有主的话在我耳边响起，主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21：15-17）当时我们二人跪在主的面前流泪说：主啊，我们爱你，但我们爱你不是比这些更深，我更爱我的学位、我更爱我自己的能力、我更爱自己的聪明、名誉、地位，我实在辜负了你的大爱，我的主，你将自己的生命为我舍去，用宝血把我们赎回，我要跟随你走十字架的路，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用祈祷传道来事奉主。想到主的爱，大大的激励了我们。虽然当时有些勉强，但心里确实是愿意顺服下来，所以求主给我能力。主的爱再一次激励我，恢复我当初的爱心，恢复了我当初的热心，恢复了我当初的信心。记得我刚刚得救重生的时候，我对主说：我愿意将整个生命献给主，但以后慢慢冷淡，所以这一次我们这样地应召，这样地顺服主。当贞娟去医院检查出来，尚未确定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感谢主，我们的祈祷蒙神的悦纳，不久就得到报告肿瘤是良性的。当晚我就写信给福州的 Bishops Lacy 说，神第三次呼召我要回

国全时间事奉主和他的教会，我希望到城内的尚友堂当牧师，同时请求选派人选来美学习医院行政管理，将来当福建省六教会办的34个医院联合总院院长。据说以后协和医院董事会选派了中华基督教会信徒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已担任内科医生八年的江医生来美进修，他的太太是四川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跟他一起留美。不幸的是，江医生来美三个月后发现晚期肝癌，在纽约某医院进行手术后不久离世，他妻子次年回福州在协和医院当内科医生。

那时有一对美国夫妇，Mr. and Mrs. Franklin Young 住在我们公寓的附近，他们对中国很有感情，家中收藏了许多中国的物品，但结婚十多年了还没有孩子。他们主动来我们家访问，两家有了来往。Mr. Yang 比我大好几岁，他的太太年龄会更大一些。他们对我们实在是十分友好。我在美国留学二年的时间里得到他们的许多帮助。他们知道我们在国内已经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因此有意收养我们在美国生的小女儿。为了证明他们的诚意，在贞娟分娩前一个月，Mr. Young 的太太 Mrs. Anne Beatty 特意辞去工作，为抚养我们的孩子做准备，孩子生下来是女孩，他们更是高兴，我们也记念他们的爱心，同时让贞娟能继续她的学业，把小孩交给他们。小女孩取名 Anne Beatty Liu。半年后，我们准备回国，虽然我们有了三个小孩，但是仍然割舍不了小女儿，当我们回国的时候还是对他们说，我们愿意将女儿给他们做养女，但我们要让在国内的母亲也就是女孩的祖母看看小孙女后再带来美国给他们做养女。我当时计划得到硕士学位回国工作四年后再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就可以把小孩交给他们。可是，谁能料到这一回去，竟是我们与 Mr. Young 夫妇最后的别离。回顾我们带女儿回国的安排是祸还是福，谁能说清楚呢？当初我们舍不得骨肉分离，带女儿回国让长辈看看，计划四年后再返回美国完成我的博士学位，未料大陆被共产党接管，直到三十年后我的女儿才回到她的出生地。当我们夫妇八五年重返美国，四处打听 Mr. Young 夫妇时，才知道他们先后都已经被天父接回天家。因为我是留学生又是牧师，被当局认为是美国间谍，在大陆的三十六年，历经磨难，而我的女儿也因此上不

了大学，被迫到农村劳动，更罹患严重的哮喘、胃溃疡等疾病。到美国后为生活奔波忙碌愈加严重，曾有两次病重住进医院，濒临死亡的边缘。其中八九年住院，医生已通知刘美（我们在美国生的女儿的中文名字）病危，当晚可能死亡。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全家人彻夜不眠为她祷告，而刘美则发着高烧、身上插着六根管子 in 抢救。她在半昏迷中只能轻微地呼叫：“主啊。救我”，“主啊。赦免我的罪，求主今天救我脱离死亡。我的儿子才六岁，我的丈夫还年轻，我还有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主啊，祢要救我！” 她就这样祷告呼求了三个多小时，忽然病房中显现一道亮光，同病房的一位黑人基督徒也亲眼看到神迹，刘美的体温一下子恢复了正常，同时她的血压也平稳下来，胃出血和哮喘也都趋于缓和。到了夜里二点，刘美自己起床在病房挂电话回家。当时全家人还跪在地上祷告，听到电话铃声，心中惧怕会不会是医院的病危甚至死亡通知。我们却在电话中听到了刘美的声音：“主医治了我，所有的病都好了！我要将身上所有输液管子拔掉……！”我连忙劝阻她要遵守医院的规定，等待主治医师诊察后再决定，我们叮嘱她再忍耐三个小时，待到天亮我们会赶到医院去。没过多久，刘美又打电话过来，她受不了身上挂这么多管子，她要拔掉所有的针头……我们只有极力劝她等到天亮我们赶到医院再说。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我们赶到医院找到主治医师，他不同意停止输液，医师认为刘美仍处在病危状态，怎么可以停止输液。可是刘美一直叨叨地吵着说，主已医治了她，可以出院回家。医生只好为她作全面检查，医生大为惊讶，前一天晚上这个病人病得那么重，今天早上却全然痊愈。在刘美的一再坚持下，医生让刘美签字后出院了。回到家中，刘美停了所有的治疗药物，本来她要吸氧、服用八种药物。过了几个月，在刘美身上看不到病态。她每天读经、祷告，时时为圣灵所充满。她用国语和福州话录了自己的见证，送给亲友和主内肢体，也寄到大陆给许多的弟兄姐妹，为主作见证，愿一切荣耀归给主！刘美的久病，使我感到很大的痛苦和负担，常常为她的病忧心忡忡。我知道刘美的病，其根源乃在于她常年在餐馆工作、受世界的影响，她的

心偏向世界的路、心中想的是世界的事，少与主亲近，着迷看武打电视、言情小说，因此她得病是神给她的管教。感谢主的医治和拯救。

我到美国留学的课程主要是医院行政管理，同时我也在 Peabody College 念教育学。两年后我得到了二个学位：一个是Peabody College 的教育硕士学位，另一个是 Vanderbilt 大学 医学院的医院管理研究员，同时拿了两个学位回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颇为荣耀的事。但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回到中国不到一周，中国的南方相继“解放”，我生活、工作的福州也不例外。中国的教会与西方的教会断绝了一切的往来，我的毕业证书和刘美的美国出生证书同付之一炬，因为留下这些证据，一定大祸临头。我的妻子贞娟在美国从事儿童营养和儿童教育的研究，她的文凭带回中国，遭遇同样的命运。她分娩以后无法再继续她的学业，当时中国正陷入国共内战混乱的局面，我们寄养在亲戚家的三个孩子，亲戚一再来信催促，因为时局动荡，他们无法承担重大责任。于是经过艰难的抉择，我的妻子带小女儿提早回国。当时正好有两个福州姐妹学成回国，陪伴我的妻子和小女儿回国，蒙神眷



1949年4月我妻子攜女兒先回中國

顾，我的妻子比我早四个月回到大陆，而我则继续留在美国完成我的学业，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八月也急忙赶回中国。在美国留学二年期间，有几位往来特别好的美国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正如经上所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

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 13: 34、35）我们一同参加崇拜、彼此交通在属灵、学业、生活上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要特别提出三个美国友人。第一位是Mr.Young。他的弟弟曾是大

学教授，后献身做牧师。Mr. Young 常带我去参加他弟弟的聚会，这位牧师的讲道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使我非常感动，尤其这位牧师不当名利双收的名教授，去做牧师，更是令我佩服和给我很大的启发。这对我回国后不当医院的院长或是大学教授，在大陆教会遭受空前大逼迫的情况下，毅然献身当牧师，不能不说是他的引导和榜样的力量。第二位是 Dr. Pyle 这是一位非常正派对中国有着特别深厚情感的外科医生。他们夫妇常在家里招待我们，并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家人。当时福州市最有名的眼科医生李学义的千金李雅贞也到 Peabody College 读研究生，我在协和医院就认识了她和她的胞兄李国方，他当时在福州协和医院继他父亲当眼科主任，雅贞要求我向 Dr. Pyle 请求为国方担保来美深造成功。但福州解放，迟迟不敢动身而作罢。还有我的襟兄陈宗盘医生，福州塔亭医院外科主任，十几年无法由教会保送到英国深造，我也请求 Dr. Pyle 为他作担保来美国，他也答应了。后来福州圣公会怕人才被卫理公会占有，因此由医务部保送留英研究脑外科，一年后学成回国，改任塔亭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没有说什么也不幸被划成右派，又在文化大革命的清队学习班中为主殉道。1974年我的大女儿夫妇移居香港，我的女婿是个医学专科学校教师，我女儿是中学教师。香港不承认大陆的文凭，虽然有许多朋友给他们帮助，单靠我女婿一个人打工，实在维持不了一家三口人的生计，于是我女儿想回大陆。当时正值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回大陆随时都有可能被认为“特务”。情急之下，他们转而打算前往美国谋生。他们托人带信给我，希望我介绍以前在美国的朋友帮助他们。我们十分为难，那时我们正在福建山区劳动改造，时刻都在被监视之下，况且我所有美国友人的地址、姓名、电话等资料都在大陆解放初期付之一炬。费了一番周折，我设法托友人联系三位美国朋友。其中一个已经离世，另一位已移居加拿大，只有寄给 Dr. Pyle 的信寄到美国的田纳西州，虽然他已经迁居，但 Dr. Pyle 医师已是该州的外科权威，州立医院的院长兼外科主任，给他的信几经辗转仍能送达。Dr. Pyle 立即回信给我的女儿，表达了他的喜悦。他说他一直

没有忘记我们，当年我们送给他的中国画至今仍挂在客厅中。他答应为我女儿一家办理移居美国的所有手续。而且盼望我们全家有机会再到美国，朋友重聚。在 Dr. Pyle 大力帮助下，我大女儿一家于1976年春迁居美国田纳西州。Dr. Pyle 为我大女儿夫妇的工作、居住作了妥善的安排，使我女儿一家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为我大女儿安排好了一切之后，不久 Dr. Pyle 和他的太太就出国旅游了。可是三周以后回来 Dr. Pyle 突感身体不适，经检查发现肺癌，且已经转移。不久，Dr. Pyle 终因不治离世。我们的悲痛不言而喻，而感激他的爱心也是无以言喻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祂奇妙的安排。要是再晚一些时候与 Dr. Pyle 联系不上，他就无法为我女儿一家办理担保移居美国和作妥善的安排了。这不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吗？

还有好几位美国朋友，像当地的卫理公会妇女会会长 Ms. Farern 她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不但常常关心我们日常的生活需要，提供各种帮助，还在妇女会中募捐一千美元，给了我妻子的分娩和血管瘤的手术以极大的帮助。而当地的礼拜堂的牧师 Rev. Paten, 则常常邀请我到他的教会讲道，同时给我们许多属灵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纪念主的爱，也纪念这几位肢体的爱心。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第三位美国友人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 Ms. Mace。她在中国福建山区农村传道几十年，曾与我的父亲同工。她很有爱心，尽自己所能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她担任福建女神学院的院长，当共产党接管中国后，她的学生没有一个背叛她们的信仰。我父亲离世之前，将我的姐姐和妹妹托付给她，后来她确实担负起教养她们的责任，栽培她们直到高中毕业。我来到美国之前 Mr. Mace 早已退休回美国，在佛罗里达一间教会当义务传道。福州女神学院黄淑英教授来美国留学，前往看望她时，看到她仍然像在福州一样克勤克俭，将省下来的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她得知我毕业后决定回国献身当牧师，无比的欢喜，特别寄了20美元给我。(我把支票退还了，因为她比我更需要)。Ms. Mace 是我心中无限尊重的一位长辈、一位为中国的福音事工奉献毕生的一位可敬的宣教士。

我是1949年6月4日毕业，这一年前，1948年6月4日我的小女儿出生。我和妻子在神面前决志返大陆后献身作传道人。当时，大陆的局势尚平静，除了东北、山东个别地方国共有小规模冲突之外，其他地方尚能相安无事。未料一年之后的1949年6月，中国大陆局势已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已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南方已陷入无法控制的动乱之中，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鼓动一波又一波的罢工、示威游行……等，使社会失去控制。亲友、老师、同学都劝我不要回中国大陆，教会总会也认为我不宜回中国大陆，若执意要回去，则建议我先到香港、或新加坡，看看大陆的局势发展后再作决定。大学医院的院长也劝我不要回去，他要聘我当他的助手，二年后他退休，我可以当院长，已经回国的妻小女儿，可以立即再来美国。按人的常理，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确实没有理由飞蛾扑火地赶回去。因为国内为共产党掌权已是不争的事实。共产党是无神论，对待基督徒决不会手软，而我在国外有多间教会愿意聘请。大学里所有二战结束后沦为苏俄附庸国的东欧诸国、流亡美国的同学纷纷以他们亲身的经历，劝我不可自投罗网。但是奇妙的很，主一直在我的内心动工，我心中没有一点惧怕，只有一个念头，中国教会面临巨变，教会需要我，我必须回去。面对危险，坦然无惧，心中充满平安和喜乐。我甚至早已做好准备，若主要我为主殉道，我也甘心乐意。我们乘轮船由旧金山航行了十九天到香港，这时大陆的消息更是吓人，许多国外的留学生转去南洋或台湾或留在香港。而我则婉辞新加坡大学的邀请随身带了两件轻便的行李赶搭香港飞往福州的最后一班货机，回到福州不到一周福州也解放了。我由美国托运的13箱大行李，装满了准备送给国内亲友人人喜爱的美国货，船到闽江口，因解放军已占领港口，而悉数退回香港。当时局势已不允许我们将这些货物再托运，只好委托香港的亲友将全部行李送当地教会和亲友，这些礼品或行李，都是自己在美国课余做工、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购买的，心中万分无奈而感到可惜。直到16年后在国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和保守：这些美国带回来的物品、资料什么的，如果带回

大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必定成为我的罪证，而受到更深的迫害，实在感谢赞美主。

我在美国期间前后到过12所医院实习，发现每个医院饮食房除备有牛乳外还备豆乳，因为有许多病人只饮豆乳，但豆乳的营养与牛乳一样。这种豆乳是安息日会办的大学食品专业部出产製造的专利产品。我虽然献身作传道，如果我会得专利权，将来回国就能有所贡献。所以我就写信给该大学，让我入学约用3学分专门学製豆乳的技术。一周后接到该校校长回信，信中说，知道中国甚缺牛乳，尤其医院病人缺乏牛乳，缺乏营养。印度同样缺牛乳，我校给了第一个製豆乳的秘方，中国同样也需要，我校决定批准你来校学习，并送秘方，但你不可出卖秘方给别人。我在那年的暑假就请我的好友，周一至周五开车接送我，我亲自跟技术员上课学习製作，数周后学校送给我秘方，我感谢校方的热情，送给了镜框以表谢意。

原来豆乳需要加九种矿物质、维他命和豆油。如果糖尿病人，就不加糖。加豆油，需要专门的机器，把豆油高压成喷雾状，才能融合成豆乳。我回国后，这个秘方果然派上了用场。



十三. 在中国大陆三十六年的牧师生涯



我回國任牧師時的福州基督教尚友堂

一九四八年六月我蒙召也应召，决志在留学结束时，一定回大陆教会事奉主和神的教会。我蒙召前，中国大陆相对稳定。到了1949年6月，大陆已经陷入了内战的高潮，共产党已经占领北方地区而且正以势

如破竹之势向南方推进。共产党对基督徒的态度大家都知道，再加上当时的传言恐怖到了极点。所有的亲友、同学、老师、许多由东欧来的难民、流亡者，众口一致劝我千万不要灯蛾扑火，既然回大陆要失去自由甚至要被杀头，何不留在美国或到亚洲没有共产党的地方教会事奉。Nashville 医学院附属医院是美国中南部一家有名的医院。该院的院长找我谈话，要聘我为院长助理，并于两年后他退休，由我担任院长。卫理公会远东事务总干事 Dr. Catrile 写信给我说外国宣教士将全部从中国大陆撤退，你怎么反而要回大陆中国。他提出，如果大陆南方也被共产党解放，我可以留在香港或是到卫理公会在新加坡最大的礼拜堂担任牧师，并兼任大学的教务长。学校许多由东欧流亡美国的学生、老师帮我搬行李时，都不解地问我，他们刚从虎口逃生，你怎么反向虎口去。但是，所有的劝说都不能使我心动，实在是圣灵在我内心的工作。我一点都不感到惧怕，心中抱定一个信念：中国大陆

的教会正面临最大的危机，教会需要我。同时我认定是大陆教会送我来美国留学，是教会提供奖学金，我必须回去为教会服务。我下定决心，即使为主殉道，我也甘心乐意。而且我决定只传两个福音题目：第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过了这三十六年，我没有违背这两个总题目，就是在劳改队也高举着。我义无反顾返回大陆。在福州解放前10天我回到了阔别了两年的家乡。我不再到医院当院长，而回到教会工作，兼任神学院的教师。

1949年10月，福建省全部解放，当时各地教会人心惶惶，不知新政府如何对待教会。卫理公会福建年议会组织了一个访问团到各地教会倾听大家的诉求，安定人心。访问团成员中有教会的领袖，他们主要是看望教友。有负责教会教育的，则了解教会学校及教会教育计划，也有负责去宣传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宗教自由，让大家放心。我则负责培灵事工，每到一处就召开培灵会，传福音、抢救灵魂。当时我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况且我觉得尽管政权更迭，但我们的信仰决不能改变。因此在那动乱的年头大受各地信徒的欢迎，但却也因此得罪了新政府。他们认为我对抗新政权，而且代表西方思想与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也为以后的几十年共产党对我的逼迫留下了伏笔。

1948年福州成立青年佈道队。当时上海有一个称之为“学联”的组织，全称是“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主要是针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福音事工。也派人到各地组织青年学生福音工作。派到福州的是郑惠端姐妹，她毕业于福建女神学校，后到上海江湾神学院深造，同时负责青年佈道队的还有福建协和大学的王岳教授和也是毕业于江湾神学院的杨秀贞姐妹。抗战胜利后有好几所大学由外地迁入福州的。如山东齐鲁医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迁入福建称福建音专；还有暨南大学等，加上福州本地的大专院校有十多所。众多的基督徒大

学生是青年佈道队的基础。最早在福州仓山梅坞顶张姐妹家成立伯大尼团契。每个礼拜天晚上有查经、祷告聚会。参加的多是大学生，少数中学生。聚会被圣灵大大充满，每一个年轻人都很火热。1949年8月我回到福州，立即被青年佈道队聘为总顾问。一共有十五位的顾问，都是有着纯正信仰的年长的肢体。在青年团契中又选出执事，大家热心事工，努力传福音，到各大学开佈道会，抢救灵魂。大家都知道新政府不会允许宗教完全自由，因此趁着政府尚未行动之前，尽量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归入主的名下。这样有一年的光景，在福州各大学福音事工进行得如火如荼。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七、八月间，我们组织了一次夏令会（后来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当时福州有两个不同的基督徒青年夏令会，一个是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大家都知道青年会的负责人多是社会福音的现代派。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负有特殊任务的人物。由此可想而知，青年会的夏令会主要是学习政治。我们的夏令会有各大学及少数中学来的青年学生三百七十人左右。在当时的教会学校福州毓英女中举办为期两周的夏令会。讲员有上海的汪主恩弟兄、厦门的周清泽牧师，闽东的廖登贤弟兄，福州青年佈道队顾问黄光华弟兄、林圣恩牧师。我们每天安排丰富的查经、祷告、佈道、外出传福音。最后一天晚上由我主持献身给主用的聚会。我先作见证：主曾三次呼召我，第一次是在我大学毕业时，那时我贪爱世界，放不下大好前程的诱惑，因为大学校长答应我留在大学工作五年，会送我到美国留学，为了改善我因担任助教待遇差的情况，让我兼任大学的总务主任，享受副教授待遇，我工作了一年，心满意足，推卸了神第一次的呼召。这以后，神管教了我，我的大儿子一岁多时候的重病濒临死亡，我呼告主给我悔改的机会，因着主的怜悯，我的儿子的重病奇迹般好转并得救。但人心败坏，度过了危险，我又忘了在神面前的承诺，于是在我当了五年中学校长后，第二次管教又临到。那时神又一次呼召我，但我更改不了，因为教会给我第一名留学美国的奖学金，学习医院管理学位。我认为这明明是主恩待我，我不愿放弃。不久神的管教就临到了我的身上，我患了重病，医院怎么查都查不出病

因，非常危险。神管教我因祂爱我。我再次求主怜悯，神及时医治了我。我在神面前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我留学回来一定回应神的呼召，去当一个传道人。神第三次呼召我的时候，我在美国，我割舍不了美好的前途。就在这时我妻子突然发现颈部长血管瘤，非常危险，医生甚至怀疑是癌。这是神的再一次管教，我和我的妻子双双跪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我们想到圣经里记载着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那一天主同样问我们：留学、学位、福建三十四所教会医院总院长，在人看来真是我的黄金时代，我们爱这些是否比爱主更深呢？想到主一次又一次呼召我们，我们却一再亏欠主的大爱。当天我们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比这一切更深，我们应召。但我们内心不免对世界仍然恋恋不舍……那一天晚上我们作见证时，台下几乎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被圣灵大大感动，有六十四位肢体拿了金心献在台上（金心表示献身为主用）1951年以后，随着大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肃反、反右派、公社化……这六十四位肢体没有违背在神面前的承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关进监狱、劳改、甚至有三位为主殉道。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受到更大的逼迫。在当天的见证会上，有更多的人拿了银心献在台上（银心表示带职事奉），他们也同样在以后的岁月中为主受苦受难，为主戴锁链。其余的人虽还不能决定献身，但也表示热爱主，帮助教会。这三百多人绝大多数都蒙主保守，他们虽经水火，经过死荫的幽谷，仍坚持他们的信仰。我在主面前纪念他们，不知为他们流了多少眼泪。感谢主，经过了“文革”的磨难，到了八十年代初恢复了教会聚会时，他们回到主面前，但他们的灵受创伤，有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火热爱主。我则继续为他们恒切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夏令会后，因一些学校如山东齐鲁医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都要迁回原地，一些顾问要离开，因此改选了顾问和执事。此外，佈道团是否应该隶属上海的全国学联，为此有过辩论。但最后大家在祷告中得着启示，认为在当时的局势下，从当地教会中分出去不妥，而决定挂在当年宋尚节博士在福州成立的佈道团名下，称之为福州基督徒青年佈道队。感谢主，这个决定使得

青年佈道队在日后的政治运动中少了遭受更大逼迫的借口。夏令会后几个月，也就是在1950年年底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共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并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当局命令教会立即与外国差会断绝一切往来，勒令所有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有的宣教士则被拘捕审查。教会的财产、人员，附属的医院学校等机构，全部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与美国的教会有人事、经济、组织的关系，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总干事被捕，福州青年佈道队也必须审查。我们与政府据理力争，表明只是与上海学联有信仰上的联系，其他并无关联。政府命令立即停止青年佈道队在福州几个地方的聚会，顾问及执事到政府有关部门交待一个月。经过这一事件，政府的公安、统战部门以及“三自”把我定为反动福州青年佈道队的头目，我自己还不知道已经被戴上这顶帽子。直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定我十大罪状之一就有反动“青佈队”头目这一项。因为在清查审问时我不肯卖主卖友，而遭受到专桉组人员的逼供信，精神和身体都受到很大的痛苦。

1950年1月参加年议会，我被正式派到福州尚友堂任牧师。当我在美国蒙召立志到教会事奉时，就已写信给国内教会，表明献身做传道的决心，并表示希望到福州尚友堂。我之所以选定这个礼拜堂，是因为尚友堂地处福州市中心，各大专院校来往方便，礼拜堂规模大，另有附属小学和宽敞的活动场所。如果主许可，我希望靠主的恩典能够在这个地方将福音事工大大发扬。我就职以后，我第一个思考的问题是：我应该传什么？应该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早在美国蒙召时起，就一直在思考。感谢主，神告诉我要像保罗所说的，你不要传别的，也不要知道别的，只传主耶稣并祂钉十字架。我到尚友堂，第一次讲道的内容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连几个月我都传讲这个内容，在信徒中掀起传福音的热潮。为了扩大教堂的影响，我向会督和教会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将附属于堂会的小学改为托儿所。因为当时刚解放，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去工作，许多家庭的幼儿的照顾成问题。尚友堂的花巷托

儿所有十分优美的环境，聘请都是基督徒而且资历很深的教师，好几位是大学毕业，都有过专业的训练。这是福州市第一家托儿所，办得很成功。我们又利用教会的空房子办织布厂，收了四十多位主内的肢体当工友。还办识字班，和协和医院合办公共卫生训练班。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扩大教会的影响，将福音传出去：在托儿所三餐祷告、讲圣经故事，唱圣诗。织布厂四十多位弟兄姐妹由厂长负责主持查经、祷告、聚会。有新来的人员，大家就向他传福音。识字班有一百多名学员，在识字班传福音更是方便。在医护班同样可以向学员传福音。当时刚解放，政府对教会的控制尚未开始，我们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大张旗鼓传福音，抢救灵魂。但是好景不长，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政府命令与外国的差会断绝一切来往，教会的医院、学校、孤儿院、老人院由政府接收，教会的宣教士限期离境。教会的所有财产，包括房产、设备等全部登记造册交政府有关部门，政府暂时不没收这些财产而交给教会自行管理，但必须补交三年的房地产税。这样，教会的经济陷入空前的困境（当时已断绝了与外国差会的一切来往）我们已有一年没有薪俸、教会所有的开支节俭到最低水平，靠主的恩典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在此背景下，我们组织了最大规模的、但也是解放后最后一次的新春佈道会。在福州全市以尚友堂为中心组织了佈道会，青年佈道队有50多位成员参加成为佈道会骨干。白天到郊区佈道，傍晚回到尚友堂。我们将扩音喇叭装到大街上，又在福州市最热闹的中心地带——东街口，挂上宣传画和标语，每天晚上佈道会开始之前，由几位音乐学院的弟兄姐妹用他们的歌声、乐器赞美主。弟兄姐妹到街上拉人来听福音，甚至有的解放军也被拉到教堂，而且还有多人接受了主。新春佈道会进行了15天，靠着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火热的心事奉，有786人归入主的名下。当时政府表面上不干预，但在一年后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十多年后的“文革”，秋后算账，这些都成为我和共产党对抗、争夺青年的大罪。新春佈道会最大的收获，就是各教堂聚会人数大大增加。我主持的尚友堂，1950年1月我接任时，教友只有20多人，

新春佈道会之后，参加聚会的人数一下子增加到700多位教会还有青年团契、妇女团契、祷告会、查经班、主日学、青少年学道班等各项事业非常兴旺。自1950年1月到1951年1月这一年的时间，是我们事业最兴旺的时期。以后政府逐渐增加了对教会的监督和控制，到了1952年初，除了礼拜外，其他的宗教活动一律勒令停止。但靠主的恩典，给我们勇气，仍然保持这些活动，这些都成了我的罪状，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算。感谢赞美主，我靠着1950年解放初期（宣教士还未回国），教会给了我的职务和工作：一，福建基督教会推选九位青年代表参加全省民青联，以后我当选省民青联常务委员。二，协和大学董事会卫理公会代表。三，英华中学董事。四，华南女子大学董事。五，协和职业学校董事。六，华南女子中学董事。七，受聘上海福音医院院长。八，福州市基督教尚友堂主任牧师。九，卫理公会年议会委员兼执行秘书（未就任）十，年议会英文副秘书长。（Dr. Cooler为正秘书）。十一，年议会访问团佈道员。十二，协大、华大、华南女中、英华、协职、塔亭护校等最后一届毕业典礼演讲。十三，福州青年佈道队总顾问兼每周三次三地聚会讲道。十四，1950年8月假仓山毓英女中联合召开的最后一次夏令会。

政府社会方面有：一，当时省卫生厅几位厅长三顾茅庐邀请我担任任何一个医院的院长，惟因我已担任协和医院副董事长，婉言辞之，而介绍李温仁医生担任协和医院院长。二，农学院党委黄某邀请我担任总务处长，我婉辞之。三，闽清县人代会邀请我担任华侨副县长，我婉辞之。四，省宗教事务局长申景韩几次邀请我入党，我也婉辞之。五，我回国时随身带回的製豆乳秘方和医院的许多资料。当时由于教会被迫断绝与外国差会的往来，只有走自养的道路，因此我向尚友堂董事会提出办托儿所、织布厂、识字班、与协和医院合办社区医药卫生服务，有人也提议办豆乳厂或是把秘方专利出售几万元作为资金。以上几项董事会都同意进行。豆乳秘方我决定赠送给政府有关机构，我将该秘方及医院书刊中最新资料一併送省文教委员会主任陈申仁主任，为此获得该委员会颁发的奖状。之后有关方面统筹设厂，

好几年全省医院及其他福利单位都获益非浅。

1950年11月爆发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命令全国教会（基督教和天主教）立即断绝与外国差会的所有的关系、驱逐在华的外国宣教士。中国教会在1950年12月宣布断绝与外国差会的关系。北京的中央政府周恩来紧急召集全国的基督教会领袖数十人在统战部和吴耀宗主持之下，制订了“三自革新运动”，同时将基督教会归到各省已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管制之下，即所谓的“军管”。中国基督教会被“军管”至一九五六年八月，前后达六年半之久。说到“三自”，其实在几十年前，教会内就有人提出，在普天颂赞中也有“三自”这首歌，同时用“三自”这个名称颇能蒙蔽许多人，也易被大家接受。而政府已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断交，教会势必服从国家的旨意，当时许多教会以整个教派的名义加入“三自”。我所属的卫理公会也以全国总会的名义加入，我也就自然加入。当时“三自”的宣言中只提与外国教会停止往来，而政府并不干涉所有教会的事务。随着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运动，“三自会”成了控制教会的工具。那时只有北京的王明道弟兄看清三自会组织者的真面目，为了信仰拒绝加入。1955年6月间，王明道被捕入狱。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逐渐看清了“三自会”的真面目。地方教会的基督徒（聚会处）以倪柝声弟兄带领集体加入“三自会”，不久又宣布退出。其实倪柝声以所谓生化药厂经济问题被捕，是运用特殊手段製作文字、照片、电影等材料作为罪证。

1955年王明道弟兄因坚决不参加“三自会”而被捕，政府及“三自会”在全国各地召集各省市基督教全体同工，集体开会控诉、批判王明道反革命罪行。我所在的福州市开了三天的批判会。第一天所有的同工都要发言并与王明道划清界限。当时我还未见过王明道弟兄，但我读过他许多的着作和灵食季刊。福建的灵食季刊是由我总发行的。我对王明道弟兄的信仰和为人都十分敬佩。当时凡有本省基督徒升大学去北京上学的，我都介绍到王明道弟兄的“基督徒会堂”去聚会。王明道弟兄所著的《我们是为了信仰》小册子，也是我大量地在福建各地分发，我们深感王弟兄这本小册子说出了我们当时心中要

说的话。政府的宗教事务局和三自会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心中明白我必受株连。在前往本市批判会前我与我的妻子一同祷告并交托，同时我也特别小心，尽量少说话。殊不知大会一开始，许多人抢先发言，只剩下我和几位弟兄姐妹低着头，在默默仰望神的怜悯。突然宗教事务处的处长喊着说“刘牧师，你不是与王明道关系很密切吗？今天怎么迟迟不发言呢？现在马上请你发言。”我心中恐慌，暗暗呼求主的同在，遂站起来说：“王明道弟兄……”我刚刚开口，就有人像老虎要吞人似的吼叫起来：“你是王明道的难兄难弟，到如今还称兄道弟，你站在什么立场？”我回答说“因为平时称呼惯了”。此时，心中又一股力量阻止我称呼王明道弟兄为“反革命”。我继续发言：“王明道在政治上是否犯错误我不清楚，这是政府的事。我要说诚实话，至今我还认为他是主的忠心仆人，……”我还未说完，会场里又是一阵大呼小叫：“你跟反革命王明道穿一条裤子，你跟王明道一鼻孔出气，你是帝国主义典型的走狗，你是基督教徒的败类……”就这样，在一阵阵的叫骂声中，会议无法进行，会议主席只好宣布第二天继续开会。第二天批判会换了题目：“批判本省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分子”，批判会虽然很激烈，我心中有主同在，因此不惧怕，不烦、不痛。但开完会回家的路上，因天黑加上一天的批判已经十分疲劳，我骑着自行车不小心撞上修马路用的大铁桶，跌伤了左膝盖，流血不止。幸好一位主内弟兄偷偷带我到医院诊治并注射了破伤风疫苗，我的左膝盖上至今仍然留下了疤痕。这以后三自会的人就把我列为“假三自”、“反三自”分子。当时，教会都处在军管时期，我被军管会管制。那时如果不参加“三自”，就是反“三自”，就是反革命。这种给人定罪的说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教会时期，仍然延续着。那时，福建省宗教事务局局长在召集全体人员开会的时候，在学习班的时候接见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反三自就是反革命，就要抓起来法办。

各地成立三自会，驱逐外国宣教士以及向军管会登记是同期进行的。虽然政府出于政治原因驱逐外国传教士，但我们心中都明白；

大多数的宣教士他们舍弃母国优裕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扬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历尽艰辛，许多人为之献身。当时福建基督教协进会在华南女子大学为宣教士举办了欢送会，会上大家唱着“再相会”，流泪送别，盼望不久他们再回到中国。那时外国宣教士住处都有军人警卫，不允许中国人随便进入。因为新政权的官员们眼中的外国宣教士，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因此被软禁的这些外国宣教士都忧心忡忡，不知能否平安地离开中国。由于当时我被指定负责清查教会财产的工作，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出外国传教士住处进行财产登记。我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安慰，并把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和最新的动态告诉他们，并对他们动身预备的行李给与建议和指导，比如尽可能不带打字文件，因为出境的时候这些文件检查很严的，几乎每一张都要看过，只要记载有关中国的情况的一律以窃取情报罪名论处。Bishop Lacy 他是福建省全体宣教士的头，因此被视作特务头子，留下审查，软禁在卫理公会仓库顶层，国内卫理公会已经与外国的差会断绝关系，都不敢去探视。平时只有一位厨子为他们购物、煮食。Bishop Lacy 的太太已经先期回国，他的身体不好，但他自认在非常时期，自己有责任暂时留下处理教会与新政府的交接事项。不久他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协和医院，医生护士为表示划清界限，对他不闻不问。在清查教会财产时，福建IRC（国际救济会福建分会）的财产，档案漏登，受到了政府官员的严厉指责，由于我此前一段在教会财产登记工作中做得很好，因而指定我来做补登记的工作。Bishop Lacy 是这个组织的主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必须当面向他了解，政府为防止我私下与 Bishop Lacy 会督勾结、串通，特别派了准军警一起去。到了医院先见过军代表以后才到 Bishop Lacy 那儿去。Bishop Lacy 见到我，表情极度痛苦和悲伤，含着眼泪接受了我的询问。我也只有强忍心中的感伤，询问了一些IRC的财产问题。由于有时我们使用英语交谈，两位军警很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就在走廊外面很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我用英语对 Bishop Lacy 会督说，我们所有在外面的人都为你祷告、怀念你，明白你的处境，说到这里我已是泪水盈眶，但又强忍

住不让其流下。而会督则泪流满面对我说：扬芬，我实在太孤单了，孤单得感到自己活不下去了。但随即他又关心询问几个同工的情况，他们是否平安。其实这几位已是惊弓之鸟，成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但为了安慰他，我只能说他们都平安。我问他自己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回美国，他摇摇头，问他医院对他的护理治疗怎样，他也只用摇头作答。半年不见 Bishop Lacy 力会督，他似乎老了10岁，而且显得那样苍老和憔悴。我按住他的手对他说，从现在开始我每一周的一、三、五的下午二点左右，都会在楼房外的马路上三次走过，并且用我的帽子向他挥舞。听到我的安排，Bishop Lacy 是那样的高兴，并且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他明白，只要我会按时出现，表示我和同工们都平安，也让大家知道他也平安。我连续四个月风雨无阻地按约定时间在街道上出现，在挥舞的帽子上，传达我们对一位为中国教会献出他的一生的可敬的教会前辈致意、问候和无尽的思念。四个月后我们得到政府通知，Bishop Lacy 力会督可以离开中国，但只是在前一天通知他本人，第二天一早驱逐出境。教会一位负责事务的杂工奉派去帮助会督整理简单的行李，预备第二天离开。但第二天我们却得到医院和政府的通知：Bishop Lacy于前一天深夜心脏病突发离世。噩耗传来，我们都明白，我们亲爱的会督为了主、为了中国教会他牺牲了，他殉道了。中国教会的信徒们会永远纪念他的。我在此以我亲身的经历见证 Bishop Lacy 力会督一生事奉主、为主殉道的最后的真实的过程。

1951年5月政府组织教会所谓进步人士在北京召开大会，部署代表们在回到原教会后，贯彻全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文化侵略中国的大会精神。政府规定每一个教会都要找一个控诉对象。为了表示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许多人争先恐后，不惜捏造事实和罪名把所有外国传教士说的罪大恶极、一无是处，以示自己的立场鲜明。那时有人就认为我与 Bishop Lacy 力会督关系密切：在抗战时期卫理公会年议会撤退到我的老家闽清，在联合中学的一座大楼办公，当时我任联合中学的校长，经常与会督见面。会督喜欢和青年接触，也赞赏我在这个教会中学所营造的属灵风气，而且抗战胜利后

我获第一批20名的第一名资格赴美留学与会督的推介不无关系。但毕竟我在教会的资历尚浅，而我从事的工作又是教育和医务，而与会督关系密切的又大有人在。因此没有指定我来控诉会督。真是感谢主，否则我该如何“控诉”呢？后来他们又说：你是协和医院第一任中国人院长，必须从中找一个外国人来控诉，但所有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外国医生，个个都心地善良、医德高尚，我找不出他们有什么“罪行”。因此到最后总结时，论定我为外国宣教士歌功颂德，应予以批判。政府当局意图通过控诉会激起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但却打错算盘，因为在大多数中国信徒心目中，对老一辈的外国宣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历尽艰辛传扬福音，爱世人救灵魂忠心事奉主甚至为主殉道，实在是可敬爱的。这些宣传教士，因着主的爱，他们生活在穷苦的老百姓当中，吃尽苦头，在事奉的道路上受尽迫害和攻击，遭遇各种危险，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有目共睹的。像这样的控诉会，怎能抹去他们在广大中国信徒心中高大的形象呢？

我担任尚友堂牧师时，正值教会困难时期，那时教会全体人员一律工资45元人民币。为了家庭生活，我的妻子在离开了工作多年后，重新成了职业妇女。但面对解放后社会全新的环境，要从新工作，将面对的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我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性格温顺、心地善良非常贤惠的贤妻良母。为了家庭，她毅然参加教师培训（政府规定所有旧社会出身的教师都必须经过政治思想教育合格后才能就业）她在学校认真勤奋、每天都备课到深夜。对学生耐心细致、关心爱护。由于工作出色，福州几所卫生职业学校都要她兼课，同时教授生物、寄生虫、微生物，后来又兼课英文和拉丁文等课程。她工作尽忠尽责，虽然留学美国，仍然朴素、谦虚、和善待人，深得师生的爱戴。同时她又是牧师娘，必须协助教会的工作，每天睡前为教会所有需要代祷的人祷告1—2小时。她是留学美国的专业人才，教学、教会的工作都很出色，照例应该工资比别人高出一、二倍，但政府有关部门却从不给她加工资，而她却从无怨言，任劳任怨做好工作。许多同事都说她比共产党员不知好多少倍，这大大荣耀了主的名。“使

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 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腓 2：15-16）

共产党讲阶级斗争，因此每年都要搞政治运动，对我们这对夫妇都在美国留学、解放前夕放弃在医院和大学的工作，返回中国在小教会任牧师，他们满腹的猜疑。，不久更把我列为美国特务嫌疑。在经过1949年到1951年底的观察期，1951年开始了对我的审查。当时正值中共大搞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天傍晚我家里来了两个政府的便衣干部，对我说：上头找你问一些事，不让我与家人说一些话，就把我带走了。因为此前我担任教会财产清查工作，也经常被叫去问话，因此我十分坦然地跟他们走了，他们带我到了一座寺庙。这座寺庙是充作临时监狱用的，因为抓的人太多，监狱人满为患，只好选择这个寺庙来关押犯人。天下着毛毛雨，寺庙阴森森的，没有光线。他们把我带到寺庙后，任我一人站在那里，没有人来招呼我。我看见寺庙的墙上贴着吓人的标语，不一会儿有六个手脚都带着镣铐、脸色浮肿的人犯在军警的押解下步履维艰地从我面前走过。本来我是坦然地进来，我自问自己知道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但这种场面从未见过，不免心中恐惧。再看天色已晚，就焦虑起来：我妻子回来了，孩子们回来了，他们一定会问：我丈夫哪里去了？爸爸哪里去了？正在恐惧与焦虑之中，忽然脑海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我怕什么？我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要怕他们？我默默地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托住我，让我不惧怕。以免上了撒旦的当，如果惧怕，我怎能坦然面对他们？我正祷告着，又有三个带着脚镣手铐的人犯走过，但不同的是，在他们的背后挂着一个名字牌，一条红线贯穿这个名字，这意味着是死刑犯。不久在庙后面的山坡上传来了枪声，那被带去的人已经被处决了。我心中一惊，便更迫切地祷告起来。“耶和華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祂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诗：130：1；5-6，）感谢赞美主，我们信

主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在危难的时候祂不会离开，祂会给我们能力，面对任何环境都不会惧怕、担心。我在心中唱起“天父必看顾你”这首圣歌，充满了平安和安静。“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诗：56：11）不久过来一个警察，叫我跟着其他的犯人一起去吃饭，从此，我失去了自由，就被关在这个庙里度过了我被当着囚犯的第一个四十天。我被关在一个小房间，他们给了我几本书：《斯大林选集》、加里宁《教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联共党史，念这些书写心得。我在里面度日如年，如坐针毡。这样差不多过了十几天，一天晚上，有人把我带到了省公安厅社会处处长长的办公室，处长给我茶喝，桌上还摆着香烟。一开始处长一副笑脸说：“刘扬芬，我是很想帮助你改造的，现在就看你是否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接受共产党的改造。首先要交待你所有的问题。你知道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这十多年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是很清楚的。你上大学、后来留校工作、又到闽清联合中学任校长。抗战时与共产党有过合作，你支持蒋介石的青年军，隆重欢迎他们，你的学校有三青团和国民党组织，这些行为都是反共反人民的。你还为美帝国主义服务，是他们宗教文化侵略中国的帮凶。如果你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我们还是会从宽处理的。你去了美国两年，我们都知道你干了些什么。许多人都不愿意回国，可是你却在解放前赶回来，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在美国念的是教育和医院管理，回来却当牧师。解放后这两年你在福州工作卖力，表面上是热心为你的基督教，但我们知道你是努力为你的美国主子效劳。现在就让你坦白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听到他的这一通话，我不禁好笑：我也爱中国，当年为宣传抗日，还差一点被日本飞机炸死。我当美国特务更是无稽之谈。我放弃许多机会回到中国，是因为信仰，我心中十分坦然。不料这位处长脸一板高声喝道：“你笑什么，老实交待。”在他的威逼下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王处长却一再催促我回答，我只好坦率地对他说，“王处长，你刚才罗列的这许多罪名，都是不实的。我出身贫苦，十一岁去南洋做工，念大学也是半工半读，就是在美国留学也是如此。抗

战期间，我宣传抗日不遗余力，我是爱国的……”“哼，你爱的是什么国，你爱的是蒋介石的国！”。王处长又吼了一声。我又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我是基督徒，圣经教导我们必须爱自己的国家，遵守政府法令。今天，我当了牧师，是因着我的信仰。本来我不愿意当牧师，当牧师是要过清苦的日子。经过神几次管教和呼召，我才顺服当了牧师。我对共产党没有仇恨，也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政府、共产党的事，。”听了我说的这些表白，王处长恼羞成怒，拿出手枪，重重地“拍”的一下放在桌子上，厉声说：“你是披着牧师的外衣，干的是反革命特务的勾当。”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一点惧怕，我凛然对他说：“王处长，我告诉你，除了信仰之外，我对民族、对国家、没有任何亏欠！”我站了起来，甚至用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处长冷笑了一声：“你好象还很有道理，我警告你，不老实交待，没有出路。”我被关押的十几天里，私下也向其他犯人了解了一些情况和王处长的来历，知道他原来是上海交大电机系的大学生，后来参加了革命。因此我对他说：“王处长，听说你是上海交大的高材生，但你为了你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投笔从政。请你理解，我虽然留学美国，学的是教育和医院管理，但因着我对上帝的信仰，而去教会工作，回国帮助自己的教会，是理所当然的。”我接着又对他说，“在美国时，国民党宣传共产党要杀‘三师’，律师、会计师、牧师都要杀，我不相信，因此敢回来。今天看样子，我要是不服从你，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我就要坐牢甚至杀头了！我实在告诉你，我决没有做过对国家人民有害的事情，你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王处长只好让我回去，说：“你先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但我一直无法入眠，因为他们加给我这样莫须有的罪名。我仰望祷告主，寻求主的安慰和怜悯，我得到了主所赐的平安。大约三周后，通知我将八岁开始到现在的经历，做了什么事，按照时间顺序写出来。我用了一周的时间写了2万多字的个人履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交代。以后每次政治运动都用此来对照我新的交代材料，是否有出入、不符，来找出罪证。我在寺庙监狱里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后，他们

放我回家了。我虽获得释放，但已内定我是“特嫌”，我的行踪，一举一动都有专人跟踪达二十多年。我的自行车车牌，二十多万号码，我自己都记不得，公安厅副厅长却记得。我的第二条罪状就是反动“青年佈道队”头子。至此以后，每一次的政治运动，我都要做“运动员”，每一次审查都受到冲击和迫害。就在我由寺庙监狱出来不久，有一天来了两个宗教事务处的干部，未经许可直接上了我所住的楼房，也是我灵修的房间，任意翻看我的书籍。并对我说，为了阻止西方思想对你的影响，今后你不能再看英文书、说英语，接着将我所有的英文书、所写的英文，英文圣经、英文词典等等全部拿走。对我说，你去监狱40天以及今天收缴英文书籍的事情，不能对任何人说。而且为了让我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要我去学俄文。（后来因为俄文班是在礼拜天我去参加了开学式，就以要主持礼拜为由不再参加学习）。从这天开始，一直到我再来美国前，36年的时间里，我被禁止听、说、看英文。本来我在美国留学时，常常用英语讲道，写学校论文等更不在话下。36年后我来到美国，已经无法用英语很流利地与人沟通了。想到政府对我的残害，不免感慨万千，但想到主的保守，我为主受苦，心中就十分坦然。因为我们所遭受的这一切，比起主在十字架所受的实在算不了什么。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临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神所许可的，而祂必保守眷顾我到底，成就美好的见证，让信靠祂的人得到激励。“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林后 1: 3 -7）“耶和華啊，我知道你的判語是公義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誠實待我。”（詩119: 75）

我妻子认为我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要少说话，我也认为是对的。但领导指定我要发言，我就要说真话。1950年市宗教事务处第一次在

尚友堂会议厅召开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工作者政治学习会。处长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学习要根据什么？大家争先恐后发言，绝大多数的发言都说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近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处长起立手指着我说，刘牧师请你发言，我就起来发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我认为我们市宗教界的工作者，作为基督教的牧师，我们学习的根据是圣经。处长听后脸色一沉，但又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发作，只好等秋后算账了。

1951年，市宗教事务处下令各个教会要在显目之处悬挂一个横木牌，上面写上“爱国、爱教、爱人民”。但我叫堂会秘书将其改为“爱教、爱国、爱人民。”后来许多教堂，看了以后都仿效这样的写法。两个月以后，“三自会”同志把横木牌拆掉。

当局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抗美援朝同时进行土改、镇压反革命，接着又搞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这些，虽然教会不是主要的对象，但是教会的人员也必须参加，接受教育。同时强迫把全市五十四个教会合并为十八个。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则是对教会一次重大的冲击。整个教会按“名额”分别定为全国的或地方的右派分子。凡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不是被判刑就是被劳改或监督改造，有的多达十多年。反右运动一开始，我就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并且设了好几个陷阱企图陷害我。感谢赞美主，主奇妙的保守，当局抓不到我的把柄，让我免遭撒旦的陷害。我会在以后的叙述中专门为此作见证。我带着内定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开始了我以后的生活。

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是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作准备的，是针对知识分子而来的。所谓“帮助党整风”的说词，实际上是“引蛇出洞”的政治伎俩。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上当。他们说出了心中的真话，真诚地向党和领导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却视作“右派言论”予以批判，轻微的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记入档案不公开，严重的则划作“右派分子”，在单位予以批斗，下放劳改改造，甚至判刑、坐牢。基督教三自会按政府宗教

管理部门的指示，自全国到地方，前后9个月反覆进行。所有的人员进“学习班”（实际上是集中营），在前后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每一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胆颤心惊、人人自危的气氛中。因为承受不了这样大压力而自杀的人不计其数，更多的人则被判刑、坐牢、劳改。我这个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就成为这次反右运动的对象。但是因为我在抗战时期在家乡当了五年的中学校长，名气还在。正当本市基督教界开展一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同时，我甚至被邀请返回家乡帮助党“整风”。因为我对家乡情况不甚了解，开始只是坐在一边听代表们发言。县委书记起立向会众介绍从省会来的特别同乡客人后，请我先发言。大家都注目希望帮党整风大胆揭发共产党执政以来，乌烟瘴气，本县冤案数千件，饿死几万人……但我已好几年没有回家乡，只从报纸报道上了解到建大桥、铁路、教育发展、医疗卫生大有改善等，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于是有人竟指责我这是锦上添花，并且在当天晚上找我的胞兄说：“告诉令弟，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发言。”一连三、四天的大鸣大放，把我的心也激起，要为家乡讲公道话。果然，大会主席在礼拜四晚上找我，要我在礼拜六闭幕会上代表全体作总结性发言，我也欣然接受。感谢主的拦阻，礼拜五我突然发高烧住院，不能参加礼拜六上午的闭幕会，我礼拜六下午才回家。我明白没有神的许可，一切都不会临到我的身上。有三次，他们安排我发言，说是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但神奇妙的安排，这三次，我不是离开到其他地方去，就是病倒，有一次更是在会议上说不出话来，神的手在保护着我。由于没有我的发言，当局找不到我攻击共产党的罪证，就内定我是右派分子。内定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不同，二者在政治上是一样的，内定的还可以上台讲道，而戴帽右派分子则不许讲道，且扣减工资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我虽然也参加体力劳动，但礼拜天可以回礼拜堂讲道。这都是主的手在保守我，让我继续我讲台的事奉。“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徒 18：9）

随之而来的公社化运动，教会也没有幸免。教会必须办农场、

工厂，教牧人员必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1959至1961年间，由于当局激进政策，人为地造成了中国几千万人饿死。教会同全国的百姓一样经历了极为艰难的时期。1963年又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又被叫进了“学习班”，在里面学习改造了三个月，最后的定论仍然是“未改造好的分子”，停止了我半年的讲道事奉，也不能参加传达政府首长报告的会议。有一次传达福建省委书记的报告，本来通知我可以参加，但会议要开始时，政府宗教事务处的官员，当众叫我起来立即出去，说我没有资格听传达。虽然当众受辱，但我心中平安、喜乐且在主里夸耀。“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 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前 2: 12 - 14）我是神的儿女，为主名受辱，我心甘情愿。我忠心事奉我的主，这是圣灵给我的能力。在政府的命令下，我所在的教会办工厂、建农场、都由我来负责进行。从筹建到生产管理又到找市场销售等等，我尽力去做。感谢主赐给我能力，我的工作很出色，荣耀了主的名。从解放到文革之前，我经历了近二十次的各种政治运动，在政府、在世人眼中我不配做社会主义的公民。当局加给我的所有罪名全是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对我的迫害和陷害。但我问心无愧，我为了自己的信仰，专心事奉主，虽然经历许多苦难，但爱我的主一次又一次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平安和喜乐。“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15: 13）祂爱我爱到底，拯救我拯救到底，保守我保守到底！“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祂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 13: 1）“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祂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来 7：25）

十四．“文革”十年和“拨乱反正”三年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后的“拨乱反正”三年到1978年前后共计13年，是我一生中经历最悲惨、受迫害最深重的13年。感谢赞美主，如果不是主的保守，如果不是圣灵给我们能力，我及我的家人生活悲惨的状况是无法想像的。圣灵带领我们走过了13年的苦难，当我们面对多次死亡的时候，主的手总是牵引着我们，穿越过了死亡的幽谷，使我们经历了神无限的爱和奇妙的恩典。“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 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诗 71：19- 20）“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诗 116：8）“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诗68：20）

破四旧、抄家、游街示众、监督劳动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表了文革16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基督教和全国各地一样，天天学习这16条。看到这16条，我们心里都明白，一场大逼迫、一场大苦难就要来了，只是不知道那一天会来到。到了7月份，政府下令所有礼拜堂停止聚会，我们礼拜堂是最后一个停止聚会的，在这个礼拜堂最后聚会的讲台上，我含泪宣讲了“愿主与你们同在”这个讲题，听道的会友们心情沉重、泪水盈眶默默听完了我的讲道，礼拜要结束时，全体起立颂唱“再相会”时，都已泣不成声。我在礼拜堂门口与会友们握手道别，大家泪眼相送，所有的话语都在交托给主默默的祷告中。

我们连续不断地学习，8月上旬，接到通知，所有的教牧人员到福州鼓山“抗旱”，天还在下雨，哪来的旱情？我们很清楚，这不过是个借口：先将我们集中到山上，等待福州市的统一部署完妥，再来整治我们。我们10多天被隔离在山上，不许与家人联系。然后一批一批通知回去接受批斗。我一回到家，家人便知道空前绝后的大迫害就要来了。那一天晚上全家人在主面前迫切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为你的名传福音17年，可是现在无神论的政府当局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要消灭宗教，所有的信仰都不能幸免。我们的苦难开始了，我们面临生死的关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们坚信不疑，我们的主掌管明天。主啊，我们身心软弱、信心不足，唯有求主托住我们，让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保守我们忠心耿耿事奉主。我们一定要高举主的名至死不渝。求主保守所有教会的肢体，保守我们全家。我们就这样祷告，将一切全心交托给我们全能的主。第二天，来了好几百名青年学生在礼拜堂的里里外外、甚至牧师的屋内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我卧床的蚊帐外面也贴满了大字报，几乎不能透气。那天晚上心中虽有惧怕，但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家人都平安。第三天（8月19日），来了两队的红卫兵100多人，他们先在礼拜堂外空地搭了一个台，并且将从各礼拜堂和信徒家中抄家来的圣经、诗歌、十字架、灵修书籍等等堆在礼拜堂外的空地上，像一座小山。我的太太上班去了，儿子、女儿也都分别上班上学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不久红卫兵像疯狂的野兽扑向我的住处，我从窗户看出去，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像要杀人一样的可怖！我在心中呼喊：我的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仰望依靠你的人一定有力量抵御这可怕的攻击，一定不会让你的名蒙羞！红卫兵们大声吆喝着：“刘扬芬，从楼上滚下来！”我走下楼，红卫兵马上脱掉我的上衣和鞋子、袜子，命令我再上楼：“所有的反动分子都是狗，都是畜牲，只能从楼上爬下来。”我只好从楼上爬下来，否则，红卫兵手上的藤条和木棍就会抽打我的身子。下楼后，他们给我带上写着各种罪状的高帽子，又在我的脖子上挂上一个沉重的写着我的名字的木牌，他们要我上台跪在毛泽东像的前面，

我立即声明我不能跪拜任何人，因为我信奉上帝，我只能跪在上帝和主耶稣面前！红卫兵大声喊道：“毛主席是一万年才出一个的伟人，你必须向他跪拜！”我回答：“我决不会向人跪拜，以前我当校长在抗战时期学校举行国父纪念周，向国父孙中山三鞠躬，我从来都没有鞠过躬。我今天不是故意不向毛泽东跪拜，是因为我的信仰不允许我向人跪拜……”我正说着，背后一个红卫兵用木製教练枪，朝我的脊椎勐烈撞击刺了一枪，我顿时感觉如遭电击一样，一阵巨大的痛楚使我瘫倒在地。又有两个红卫兵夹起我的双肩，硬把我按住跪伏在地。接着红卫兵首领向大众宣布我的十条“罪状”。其中最重的罪名是：美国派遣特务，反动基督教头子，反动青年佈道队头子，反共反苏与党争夺下一代，内定右派的反三自分子……，他们要我承认以上罪名，我以沉默来反抗。红卫兵又把我拉了起来，但巨大的痛楚使我再次跌到在地。红卫兵头子在台上宣布“刘XX是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台下红卫兵高呼：“枪毙刘XX！打倒刘XX！”然后他们又把我押到台下，跪在先前堆放圣经、书籍旁边，面向南方。红卫兵在圣经书籍上面浇了汽油，点火，顿时火势熊熊，烧到我的面前，烧掉了我的眉毛，脸上也出现了火疤，我被大火烤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红卫兵想要烤死我。我虽异常痛苦，但却没有流泪，我默默祷告。我开始精神恍惚，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心中还是清楚。我呼告主：“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之后我就昏倒了。在昏倒时，我仿佛听到一声轻微的叹息在我耳边响起，圣经的字句在我的眼前浮现：“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 8：26）又有声音好像在说着“撒得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也是你的神！”（参但 3：10，17）我不禁呼应着“阿门，阿们！”随后就不省人事了。在我倒下，口中不断喊着“阿门，阿门”的时候，有奇妙的神迹发生：原来正在燃烧着的圣经、书籍等，因为是刮南风，所以火势是朝着我的面扑去的，突然一阵北风刮来，大火突然向站在南边的红卫兵扑去，许多红卫兵倒下，互相践踏，一时间嚎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不少人受伤，不得不抬到医院去，会场一片狼藉。主持批斗的红

卫兵头子，惊慌地用高音喇叭喊着“解散，解散！”这场批斗会以失败草草收场。“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诗 6：10〕后来，有四位基督徒医生把我抬进屋内，用井水喷我的头，直到第二天，我才从昏迷中醒来。

福州有好几个礼拜堂，也有许多牧师，红卫兵为什么要选定尚友堂来召开这次批斗会呢？这除了尚友堂是美国卫理公会在中国的第一家分会，而且又处在市中心的原因以外，据后来知情人告诉我，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一，1950年我到任尚友堂以后，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的福音事工，除了1950年的青年佈道队，还开办了青少年学道班、查经聚会等，一直坚持到1958年才被迫停止。许多大专学生、社会青年都在尚友堂得救并得到造就。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的基督徒学生迫于学校的压力，参加了共产党的青年组织——青年团（后改共青团）。事后这些学生十分痛苦和矛盾，来找我，我就为他们祷告，用圣经上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事蹟，以及以利亚在失望时，耶和華对他们说的话教导激励他们：“我在百姓中留有7000人，没有向巴力屈膝……”。以利亚说：“我为耶和華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華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4，18及但以理三章）他们得着感动，决定不向巴力屈膝。有的学生回到学校后提出要退出共青团，退团比不参加更为严重。许多学校的团委大力追查原因，个别青年学生因软弱，就说出与我交流沟通后才有这样的决定。这件事惊动了上级，最终传到了福建省委书记那里，他指示共青团负责人、公安厅、省委统战部，点名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下一代，必须予以还击。因此“文革”全面开始“破四旧”，上面就指示要让青年接受一次生动的反面的活教材的教育，将刘XX放在圣经、诗歌前面烧烤，看他的上帝会不会救他。第二，1950年我接任尚友堂时，由于前任牧师是新派的牧师，不负责任，甚至贪污、生活作风堕

落，来礼拜堂聚会的人仅二十多人。我接任后参加礼拜堂的人数增加至七百多人，圣经、诗歌等不够用。我与圣经公会商量在尚友堂设立了福音书店，从此圣经、属灵的书籍应有尽有。1953年，中共关闭了上海圣经公会，几个月后又通知所有教会书店不得出售圣经、属灵书籍、福音书刊等。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召集执事开会，告诉大家从此圣经、不能印也不能卖了。我提出将圣经公会寄存在尚友堂的几千本新旧约圣经和几万本四福音单行本，借款购回，以应付今后教会的需要，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共购进6000本新旧约圣经和十万本四福音单行本，分别寄放在各执事家里。这一批圣经及单行本除了供应本教会外，还供应全省各教会直到1957年。政府当局当然知道这件事，因此视我为反动分子。因此，在“破四旧”批斗我这个反动分子之际，将抄家得来的圣经、属灵书籍、诗歌本等，堆放在尚友堂，组织红卫兵、机关干部来看我所信奉的沙得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会不会救我。

这以后我被关在礼拜堂楼上19天，每天不断地批斗，我的左脚因为红卫兵用木枪撞击后背造成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而不能站立。我强忍着伤痛，其中有四天被押送游街示众，其余的时间红卫兵则要我拿着锄头在整个礼拜堂范围内走动。所有红卫兵认为有怀疑可能藏有电台、或其他反革命证据的地方，如花盆、花坛、炉灶、墙壁、地面、不停地挖，甚至礼拜堂的水池、假山、都要抽干水，移开假山石，以期发现武器、电台等特务罪证，结果一无所获。红卫兵不甘心，又命令我到礼拜堂的地下室查找，说实在的当时我十分担心：因为抗日战争福州沦陷时期，礼拜堂隔壁的学校驻有日军，万一有刀剑武器之类的东西，从地下室通风窗丢入，那不成了铁证？蒙主保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红卫兵押我游街示众时，要我光着上身、穿短裤，脸涂黑、戴高帽，赤脚。当时所有游街的“牛鬼蛇神”都是这样，而女的则要剪头髮、穿破衣服、赤脚。这样一路游街，还要挨鞭打和不堪入耳的辱骂。因此当时游街示众结束后，不堪人格受辱，一时想不开而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当时我妻子的学校还没有开始对她行

动，在我要去游街的那一天她从学校赶回来，靠近我说：你要靠主喜乐，勇敢、得胜，我们是为主名受苦……她了解我性格刚烈，担心我经受不起而发生意外，她鼓励我要靠主刚强。在一旁的红卫兵叱责：“你这反革命的老婆子，你在嘀嘀咕咕什么，是不是也想游街？”我妻子点头说：“可以！”红卫兵立即剪掉我妻子的一部分头髮，剪破衣服，让她赤脚，挂牌、戴高帽，陪我一同游街示众。福州的八月，正是骄阳似火，赤脚走在沙石路上刺痛难当。沉重的木牌的绳子挂在颈上，勒出血痕。一路行走，路旁的人群中有基督徒向我们行注目礼，有的则指着天，鼓励我们要仰望天父。

不久，北京的中央文革来了通知，要在全中国统一的时间里进行全国牛鬼蛇神大批斗、游街。此时我的妻子已被关在学校，红卫兵决定把她押回来，与我一同抬着礼拜堂的170多斤的大铜钟，我则必须在后面边抬边敲钟。说起这个大铜钟，还有一段典故。福州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礼拜堂，有几十个这样的铜钟。这些钟当年都是由美国、英国差会或是由罗马教廷从欧洲运来的製作精美的教堂钟。我在1950年到尚友堂任职时，发现当时已经建堂十五年的尚友堂竟然没有大钟。原来尚友堂石结构的礼拜堂始建于1935年，随后爆发二战，国外的差会没有能够运铜钟来。我认为礼拜堂的钟很重要，它是礼拜堂的标志，钟声有召唤人们前来崇拜的作用。我召集执事们开会，讨论去铸一个大铜钟。我们按照福州天安堂的铜钟为样本，请工厂用上好的材料铸了一个铜钟，并于1950年8月挂在尚友堂钟楼的顶部。礼拜天，那悠扬的钟声呼唤人们前来敬拜主，信耶稣得永生。这钟声穿越各种的拦阻，对于有的人来说感到不自在、刺耳，犹如芒刺在背。当时许多礼拜堂，在政府的压力下，都已经停止礼拜天敲钟，只有尚友堂礼拜天的钟声仍然回荡在福州市中心的上空！到了1958年全中国在毛泽东的发动下，兴起土法大炼钢铁，市宗教事务处和三自会通知各礼拜堂一律把铜钟献出来，支援国家大炼钢铁，同时也表示和帝国主义断绝一切关系。我当然不愿意把凝聚着我们敬拜上帝心愿的铜钟交出去。于是我在三自会的会议上发表声明：尚友堂的这座铜钟不同于其他礼拜堂

来自国外差会的钟，因为它是解放后1950年由全体信徒奉献铸造的，若是国家有需要，我们愿意献出相同重量的铜以换取我们的铜钟。我的这一声明，让政府找不出否决的理由，在很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让我们保留礼拜堂的这口铜钟。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来向我算总账了。1958年你据理力争留下这口钟，现在要让你抬这口钟游街，并且要我敲钟向人们宣示与政府对抗的下场。但这口170多斤的大铜钟对于我和我太太来说，实在超过我们所能负担的：我没有被红卫兵戳伤以前，最多只能肩扛80斤，我的太太最多只能40-50斤。让我们夫妇俩赤脚游街几十里，扛着这口170多斤的铜钟，头戴高帽，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大木牌。我们惟有心中切切祷告：“主啊，撒旦用这样的手段来折磨、迫害我们求你眷顾、保守，我们不能扛着这么重的钟到在大街上，不荣耀主的名。”我们不住地祷告，呼求我们的主。主是信实的。祂从不会将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试炼加给祂的儿女。奇妙的很：原定全国“牛鬼蛇神”大游街在中午十二点进行，这一天将有几百万的“牛鬼蛇神”被带上街头示众，而目睹这次大游街的民众将会达到数亿人。红卫兵一个个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一个激动的时刻的到来，他们只要听到“红司令”的一声令下，我们就会立即被拉上街头示众。可是到了十二点半，红卫兵打电话到市委，答复说中央的通知还没有下达，到了下午一点，仍然没有动静，红卫兵就打电话到省委，仍然要他们等待中央的指示。时间到了三点，中央来了通知，说是取消了这一次全国的统一行动。我们此刻内心感谢神的奇妙和大爱，真的是言语无法形容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神，祂的名不容蒙羞。于是我们夫妇俩抬钟游街的闹剧，在神的拦阻下，终于无法上演。“你要压製外邦人的喧哗，好像乾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赛25：5）此后这口铜钟被福州鼓楼区政府占用，用来作为上下班的信号。到了1978年，教会恢复礼拜堂的聚会，有人告诉我，礼拜堂的铜钟在鼓楼区政府，当时正在（纠错）落实政策，因此不久就将这口钟要了回来。重新挂在礼拜堂钟楼的顶部。“文革”十三年后恢复礼拜堂第一次聚会，在只

能容纳九百多人的礼拜堂，里里外外一共有五、六千人聚集，当停止了十三年的浑厚的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这可能是全国第一个敲响的礼拜钟声。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不禁流下了热泪，想到教会经过十三年暴风雨的摧残，许许多多忠心的仆人为主殉道献身，而受尽折磨的肢体，得蒙主的保守和眷顾，十三年后能再相聚，我们都在心中默默地纪念着主的宏恩大爱，感恩的泪水都不停地涌冒流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淚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淚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126〕

我这样被批斗、折磨了19天以后，红卫兵将我交给工厂监督劳动。这六个月，白天在工厂重体力劳动，晚上再到居民委员会劳动到夜里12点。白天我们将木材从江边抬上岸，再抬到工厂去，每根木材200多斤，我不得不忍着腰部及左腿的伤痛，与另一位劳改犯硬扛二、三里路，不能放下，否则将受红卫兵的毒打。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动，我的肩胛骨和肋骨受压变形，左腿肌肉萎缩。有一天疲劳过度，从床架上摔了下来昏迷不醒，工厂的红卫兵担心我会死去，终于监督劳动六个月之后让我回家。从工厂回来后，有半年的时间我躺在床上不能动，我们也没有钱去医治，即使有钱，医院也不会为我这种“五类分子”、“牛鬼蛇神”看病的。感谢主的差遣，我的大学同学许医生冒着危险，每天到我家为我按摩、治疗前后三个月，我开始有了好转，但只能勉强站立，不能太久。这以后我又被送去山区劳改，我只能靠拐杖行走，在山区七年半。

1966年8月我们家第一次遭受“破四旧”冲击的时候，所有的财物、家俱抄的抄、砸的砸，一点的金钱和结婚戒指统统被没收或去向不明；最可惜的是我在尚友堂17年的讲道大纲700多页和一些灵修笔记，全部被烧毁。我们全家被红卫兵赶到一间破庙里居住。这间木板搭盖的放佛像的破庙，夏天像火炉，冬天像冰窟。但我们一家靠主得

胜，没有因为这样恶劣的境遇而丧失对基督的信仰。“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诗116：10）“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路22：21，22）

就在我到工厂劳动半年回家以后不久，福州市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街，这也是最后一次的批斗，其时，全国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局势失去控制。当时基督教有四个人必须押去游街，但其他的三个得到消息，躲到外地去了。我因为脚疾，不能行动，况且我如果跑了，我的家人必定遭殃。我求告主，给我能力、刚强和忍耐。那一天有30万人沿街观看我带着残疾的左腿，在红卫兵的押送下，戴着高帽、挂着木牌一步一跛地走在大街上。虽然身上极度的痛苦，但圣灵给了我能力，我精神饱满、喜乐，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一路上信徒看到我的时候，很受激励和鼓舞，我为主再一次作了美好的见证。“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 4：9）“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林前 4：11-13）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文化大革命是要斗争党内当权派，是要肃清党内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及其追随者。但是这些当权派为转移目标，先来“破四旧”、斗“牛鬼蛇神”，这种做法正合红卫兵的口味，于是乎全国甚至农村掀起了一阵阵批斗、游街、抄家、打、砸、抢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这一波的运动中，冤死的不下几百万人。

清理阶级队伍

当我在工厂监督劳动六个月回家卧床之际，福州有一位名叫王中方的弟兄曾经两次来探望我。王弟兄是主的僕人王载弟兄的弟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福建省最有名望的内科权威之一。王弟兄说了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十分后悔当初我曾蒙召，但没有去应召当传道，我现在虽是名医，但唯有救人的灵魂，才是最有价值的。”我为主名受到这样大的苦难和逼迫，王弟兄贵为名医，却能领悟到为主名受苦的价值，大大地激励了我。他的第二句话是，“目前大家受逼迫只是开始，日后必有更大的试炼临到。为此，每一位信徒最要紧不可否认主，更不可自杀，抓住主的应许，靠主得胜。”果然，在文革最初半年多的迫害之后，由于共产党上层政治势力的角斗，一时无暇顾及“牛鬼蛇神”。到了1969年，共产党发动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所有的人按照各人的政治历史经历进行清理，决定每一个人在阶级队伍中的位置。这对于每一个人特别是各次运动中有问题的人，无疑是一次最严酷的审查。共产党把我们这些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分门别类地关起来进行审查，清队。而一般的人员则照常上班、政治学习、劳动。为了弄清楚有历史问题的人，过去的情况，在全国范围耗费了极大的财力、人力、进行内查外调。无数的专案人员到所谓涉案人过去工作的地方，进行调查了解这些人的历史情况。我的工作经历很丰富：当过中学校长、医院院长、又在大学工作过，还留学美国，当过牧师，许多信徒都与我有关系。因此关进清队学习班以后，每天从全国各地来找我了解的外调人员，总有2—3批以上。这些专案人员一个个气势汹汹把我当作犯人一样审问，我们都要站着接受问话：他们先用毛泽东语录把我们骂了一通，才开始查问要调查人的事。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根本没有是非之分，这些专案人员都是给被调查人加上许多足以吓死人的罪名，然后逼我们这些调查对象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供，以便证明那些被调查人的罪名成立。明明是弄虚作假，栽赃枉法，我们当然不会和他们沆瀣一气。于是这些专案人员便对我们拍桌子瞪眼睛，恶语相向。当年有许多青年佈道队的成员后来到各地就业，他们中不少人已

经是教授、医生、工程师等，他们的简历都会写上曾经参加过福州青年佈道队，证明人一般都就会写上我的名字。当专案人员来调查时，我如实证明他们参加的是合法的正常的宗教活动。有的专案人员硬是要我证明青年佈道队是反动组织，我当然是竭力反对。我所在的清队学习班的负责人是政府统战部人员，也对我施加压力，说我避重就轻为那些被调查人员隐瞒反动历史真面目。于是指示当年参加过青年佈道队留在教会工作的人，卖主卖友，证明青年佈道队是反动组织，以此加害那些无辜的青佈队的人。使这些参加过青佈队的人在清队学习班中遭受磨难，其中有三个为主名殉道。那时来向我调查取证的专案人员都是威逼利诱，再加上统战部的干部频频施压，我每天都处在精神极度紧张和恐惧当中，长期在这样的状态中生活，我得了精神官能症：只要一听见专案人员吼叫我的名字：“刘XX,你出来！”我就会肚子痛，立刻要上厕所。那些专案人员认定我是装模作样，不愿意接受调查，故意拖延时间，就跟我到厕所察看，果然，我每一次拉出来大便都成蓝绿色，他们无话可说。

我们在清队学习班，不能外出，不能与家里人见面。每天不是被批斗，就是看别人批斗受教育，听到的只有穷凶极恶的吼声，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肉体与精神压力很大，寝食难安。政府又利用个别背弃主、卖主卖友的人，编造罪名加害他们认为必须打倒的人，学习班里不少经不起折磨的，就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按照政府的指示，凡在清队学习班里将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便可获得“解放”——允许外出劳动或是活动。经过近一年反复的内查外调，宗教界的清队学习班大多数人都“解放”了，最后只剩下基督教、天主教各两位，一个佛教和尚仍未“解放”，我是其中的一个。我祈求仰望主：主啊，我被关在这里一年了，见不到亲人、主内弟兄姐妹，每天精神受折磨、内心十分痛苦，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的，我不能背离跟随主走过的路，恳求主你解放我！我不求恶人“解放”我，我相信主必搭救我。这天晚上，军代表、专案人员对我进行批斗。他们拿出一大叠材料，要我承认我当中学校长期间曾加入国民党，我立即予以否认。我是基督徒，历来对政治、党派不感兴趣，我的信仰不允许我参加党派。军

代表拿起那一叠材料，说这是外调人员到你当年当校长的中学调查得到的材料，有你的国民党证号码和档案，证明你加入过国民党。我实在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我又如何解释他们手中的材料所说的事实呢？我只好解释：我任中学校长5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战时特殊年代，国民党政府要求校长都要加入国民党，因此可能是我的秘书拿了我的相片，代我办理了集体加入的手续。但我确实不知情，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党证的号码是多少。刚说完，军代表、专案人员如狼似虎地吼叫起来，你这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至今还不老实交待！这时我突然心中感到有一股凛然的正气升起，那是主赐我刚强的灵：“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仍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1:7）面对他们的淫威，我正色对他们说：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你们不相信，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和苛求。我在共产党解放福州前夕赶回来，是因为我的信仰，教会需要我。这十几年你们可以考察我的所作所为，我为了信仰，为了传福音竭尽全力。我从未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家和政府。凡是爱国的事我都参与，教会响应国家号召办工厂、建农场，我带头参加并且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心力。我知道你们不满意我的信仰、不满意我为教会传福音的巨大热情。否则，我实在想不通我为什么得不到“解放”。这番在他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话语，立刻引来了一阵疯狂的咆哮。可是他们再也举证不出我的其他罪名，当天的批斗会直到凌晨才结束。第二天他们只好宣布我“解放”，就是说我可以参加外出的劳役、办事等活动，解除了与外界隔绝的日子。这样又过了两个月，我终于结束了一年两个月的清队学习班的生活。这期间，我的太太也被关进了省市医药卫生界的清队学习班九个月。专案人员对我妻子说，你的丈夫在清队学习班关押时已承认自己是美国派遣特务，已被镇压（意即被枪毙），你若不承认自己也是美国特务，只有死路一条。我妻子精神严重地受到刺激，以致我孩子探望她，告诉她我还在清队学习班，她都不相信。医药卫生界的清队学习班，有几十位有名望的医生、教授自杀。我妻子的三姐夫，留学英国皇家医学院的著名外科专家、以及当医院副院长的四哥，在这个

学习班里，都被迫害致死。

上面提到的冒风险为我治病的忠心的王中方教授也在清队学习班中受迫害致死。更有甚者，有的医生（厦门的一位名医，是基督徒）是被从楼上推下摔死的，这种情况，一律对外都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国这些“牛鬼蛇神”因各种原因非正常死亡的多达好几百万人。难怪，在中共1980年召开的全国会议上，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强迫送往闽北山区监督劳动

我刚从清队学习班回家，第二天又被居住地的街道关进去又批斗了两周才让我回家。此时已经是1970年初，接近中国的旧曆年关。宗教事务处和公安局派人通知我们，为贯彻中央备战精神，像我们这样“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不允许留在沿海城市，必须迁往内地山区监督劳动。他们已经决定二月份我和我的太太要动身搬去福建北边最偏僻的山区建宁县，在那里接受监督劳动。文革期间，我们这类阶级异己分子，都必须关起来，可是监狱一下子容不下这么多的“犯人”，于是就由公安人员押送我们到偏远的山区，由当地的政府、公安机关来监督我们，去农田干活，接受改造。我们心中忧愁，但不走不行，只得将前面的路付托在主的手中。1970年2月20日，我们夫妇在公安人员的押送下，搭乘两天火车又转乘汽车到了闽北山区建宁县。我们被安插在一个远离县城的山区小村庄里。从县城到我们那里，必须先搭汽车到一个生产大队，还要翻山越岭步行两天才能到达。我们那里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方圆二十里没有其它村落，我们被指定住在一个早已不住人的破烂房屋里，周围没有人烟，极其偏僻。我们刚进屋就赫然看见两条大蛇盘卷在屋中央的地上。我平生最怕蛇，只好站在那里祷告，好一会儿这两条大蛇才懒洋洋地爬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山区没有电灯，连煤油都买不到，当地的农民都是烧松枝或是竹片来照明，我们只好照样。房子破旧，冬天寒风穿过破洞，屋外的积雪一尺多高，我们就是盖上三床棉被也不能保暖，而梅雨季节的初春受冷受冻就更是凄惨了。我们到的第二天，村里来人指定我们在屋后的水田里干活，我们只好拿着锄头赤脚下了水田，田里还结着薄冰，我妻子从未干过农活，一脚踩进水田，不料一下子陷进去直到腰部，原来这是无人耕种的烂泥田。我大叫，不要动！我伸过锄头柄让她抓着慢慢地拉她上来。我们换了衣服，在屋里抱头痛哭。我们此刻肉体软弱，信心不足，面对如此的困境，我们觉得世间的路无法再走下去了，我们哭着求主接我们回家。有一些早我们几个月到这个县监督劳动的人，有的不到一个月在精神和恶劣环境的摧残下就死去了。第二天我拄着拐杖走了十五里的山路到大队部，请求让我们去捡猪粪，（猪粪是用来当肥料的）烂泥田我们实在干不了。大队长说，看你们也是快死的老人了，就去捡猪粪吧。从此我们每天早上很早起床，一起读我们偷偷带来的一本小小的新旧约圣经，祷告，然后带上一天的乾粮和水，漫山遍野去捡猪粪。其实在山区很少有猪粪，只能捡到一点牛粪和野兽的粪。一个月后，大队派人来量了我们捡的粪，值人民币1.5元，只够买十斤的大米，我们这样怎能活下去？我们再一次跪下来祈求主的眷顾，我们在屋里痛哭、呼喊：“以马内利，你在那里？”第二天清晨，我在屋前往山坡下看，发现有几个农民正急急忙忙地朝我们的屋子跑上来。我连忙对我妻子说，是不是昨天大队看我们捡了那么一点的粪，以为我们懒惰，抗拒劳动改造，现在要抓我们去大队部，晚上开批斗会？一想到批斗会，我们心中就感到恐惧和愁苦，我们只有再次仰望和交托。不一会儿，来人渐近，有七、八个人，我们看清了竟然还有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在其中，可以说是大队最有权力的人都来了。他们问我们：“你们知道山下村里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赶紧回答：“我们每天在山上捡猪粪，没有到山下走动，也没有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很老实接受改造的。”我以为他们要查问我们有没有搞什么特务活动之类的才这么说。书记说，不

是问你这个。大队长又接着说：“山下村里有六十四个小孩得了麻疹。去年已有四个夭折，书记的四个孩子死了两个。这次又有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现在立即要你去山下抢救病孩。”我一听，连忙说：“我们都不是医生，怎能为小孩治病？若是出了问题，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书记气势汹汹地说：“你一定要去，你不能见死不救。就是医生也有失手的时候，你只要尽你的全力去抢救，我们不怪你。你要是不去，就是嫌恶贫下中农，今晚就要批斗你。”我们只得从命下山了。大队部安排了以前是属于地主的大房间当病房，我的妻子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我自己也有多种病，因此带了一些药品，医学书籍和器械。感谢赞美主，祂知道我们的需要，早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医学方面的知识和一定的技术。“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 2:10）在协和大学时，我学的是医学预科，又跟着邱医生做助手，后来在协和医院当院长，留学美国学的也是医院管理，都与医学有关。我们掌握了一定的医护技能，如打针、量血压、配药和小手术。神允许我们来到这样的山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神总是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呼求，在我们没有活路的时候，给我们开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我们搬到了那座地主屋子的楼上，环境好了许多，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第一个抢救的是大队书记的儿子，因为延误了治疗，已奄奄一息。我们立即为他注射了针剂，同时给他口服药物，过了一天情况大有好转。第三天几乎退烧了。接下去的四十天我们日夜抢救病童，对每一个小孩的治疗，我们都先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是“犯人”不能出一点事故，唯有你才是医生，我们实在没有把握，求你医治这些小孩，让你的名得荣耀！”经过四十天的抢救，六十四个小孩全部康复。全体小孩都叫我们“公公”、“嬷嬷”。当地的农民非常纯朴善良，他们不计较我们是“犯人”，对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建宁县原来有一位牧师，解放后被评为地主，后来又成了反革命，不久被枪毙了。一般当地的农民都认为牧师就是反革命、是坏人。我刚到这个乡村时，有一些农民听说我是牧师，也将我列入反革命、坏人的行列。现在治好了他们孩子的病，改变了他们的观念，看我们是大好人。这以后我们又从县城买了许多药，按大队的要求，开办了一个医疗室，义务为农民看病，而且还为当地培训了五个“赤脚医生”。我们在当地为农民们看病，他们都把我们当作亲人一样。我们的神不但把我们从死荫的幽谷带了出来，而且这也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到这样落后的村庄，乃是要我们传福音，为神做见证，荣耀他的名。这里的山区极为闭塞，农民没有听到福音的信息，他们烧香拜菩萨，甚是迷信。于是我们就开始亲近他们，慢慢地在他们当中传福音。我们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经文抄写在小纸条上，那时我们没有钱买纸张，就叫家里人到印刷厂拿了一些碎纸边料，我们每天晚上抄写30-40张，第二天见到熟悉的农民，就向他们讲解传福音，并把写好经文的纸条送给他们。因为是我们送的，农民们很看重，就把纸条放在原来放佛像和符的地方，认为这样会保一家平安。感谢神，使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传了神儿子的福音。“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提后4：2，5）

我们在山区七年半，看过的病人超过八千多人，不论大病小病，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这实在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保守和医治。我们在医病的时候都将病人交在神的手中，为他们祷告，每一位病人都听到我们传讲的福音，不少人还偷偷地接受了福音。我们要离开山区的时候，农民们甚至连村干部都依依惜别。1977年冬天我们预备回福州了，但是大雪封山，公路无法通行。到了可以通行的那天，周围的农民主动为我们从公路清理出一条通往我们住处的道路，帮助我们抬行李上车，几百人在路边送行，有的放鞭炮，有的拿酒敬我们，许多人流泪不止，甚至有人跪地道别，其感人的场面，至今令我难以忘

怀。

文革结束后，当地的信徒也组织了教会，特地乘汽车、火车，来到福州我们的礼拜堂参加聚会崇拜。我供给他们许多属灵的书籍，还对他们进行了密集的培训，他们回到山区，建立了两所会堂，当年播



下的福音的种子，发芽生长了。

十五. 我妻子起死回生

1974年，我的妻子调到公社卫生院药房工作。她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一天晚上她在药房值班，夜里有病人，她不能休息。第二天是当地赶圩的日子，各大队的赤脚医生要来领取药品，因此工作非常繁忙。到了早上九点多，我太太突然晕倒，得到通知，我赶到了医院，握住她的手，她微微睁开眼睛对我说：“仰望我们的主！”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我跪在床边按住她的手，流泪呼告主：“主啊，求你救她。若是她在这里死去，不荣耀主的名！”我已经说不出其他的话了，唯有呼告：“主啊，求你救她！”，“主啊，求你救她！”。我按住她的脉搏，发现逐渐弱下去，最后没有了跳动。医生看过后说心跳和呼吸都已经停止。我此时更大声地呼告主。当我的妻子刚刚倒下时，医生担心负责任，而要县医院派救护车来接我的妻子到三十几里以外的县医院抢救。我立即反对。因为三十几里的山区公路，一路颠簸，到不了县医院，就会死在半路上。我坚持留在原地抢救，真是神的预备，前一天的抢救室刚刚送来氧气，（在山区公社医院不是天天都有氧气的）而且也是前一天在清理药房时，发现二十多年前美国救济总署留下的一箱药品，其中有三支德国的强心剂。我要求医生立即用氧气、注射强心剂加上人工呼吸，在心跳骤停了三分钟后，她恢复了心跳，可是一会儿又停跳，继续抢救，才又恢复。在以后的五天里，她一直处在危险之中，后来在医院住了十九天，经过治疗，好转以后才回到家里。我妻子做见证：那一天她对我说：“要仰望我们的主！”以后不久她就进入昏迷状态，但起初还有意识，还能在心中默默祷告：“主啊，你一定要医治我，我们全家就靠我每月的工资收入生活，如果我死了，丈夫、孩子都没有了生活费，不荣耀你的名，求主再给我十年的寿命……”说到这里，以后的事她就知道了。感谢赞

美主，神垂听了她的祷告和我的呼求，医治了她，让她起死回生。“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華，祂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祂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107：18-20）我们在山区七年半艰苦的生涯，再次见证了主的应许：凡是临到主的儿女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和安排。我们刚到山区遇到艰苦和困难，但神很快就为我们开出一条路，让我们能在山区为农民看病，有机会接触他们，将福音传给他们，这完全是神美好的安排，若是我继续留在福州，必定会遇到更大的灾难，很可能丢掉性命。留在福州，环境不允许我们讲道、传福音，到了山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借着看病，仍然有机会传福音，这真是神的恩典。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话真的一点也不错。（罗8：28）



十六. 我们所信的主是轻慢不得的

1977年政府终于允许我们返回福州，但规定我的太太必须退休才能将户口迁入福州。我们又回到当年居住的尼姑庵的阁楼上。我们原来居住的街道、派出所百般刁难、阻拦我们户口的迁入。在他们看来，我们这样反革命五类分子押送去山区，就要死在那里不能回来，否则意味着他们对我们的迫害是完全的失败。感谢主，每逢遇到苦难，神总会差遣适合的人帮助我们解决难题。

1966年8月文革“破四旧”时，红卫兵抄家抄去了我们所有的财物，我们还被政府停发工资，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我们被赶出礼拜堂搬到政府指定的一处残破的尼姑庵栖身，一家人就住在原来用木板搭盖的放佛像的阁楼上，我们没有埋怨，因为主时刻都在保守看顾我们。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清理阁楼，用报纸将木板的破洞糊起来，一家安顿下来。一天住在仓山的郑老牧师来到我们的住处，放下了五十元钱就走了，当时这五十元够我们一家过上一个月了。在厦门的亲家翁也托人送来一百元。陈振文弟兄的太太也送来了一百元，而且此后几年，直到1978年我们由山区返回福州，陈弟兄每个月都从香港汇给我们一百元港币。我们因着主的名受逼迫，但我们的主从未离弃我们，在困境中我们从不缺乏。

我们一家人在尼姑庵的阁楼上开始了我们的另一种生活。尼姑庵的楼上原来有一间房间住着一个尼姑，我们则住在原来放佛像的地方。后来，政府派了一对夫妇住进了原来尼姑住的那间房子。男的是餐厅主任，女的解放前是欢场女子，解放后靠为公安派出所做“眼线”，当上了治安主任。他们是奉命来监视我们的。我们说的话、做的事，她都会向公安报告。楼下只有一个公用的小地方，家里来客人，只好坐在这里会面、谈话。她索性就在一旁听我们谈话。我们只得小心翼翼过日子。连吃东西都得小心，以免被怀疑国外资助。公用

电表和环境卫生费，他们都故意不交，而要我们代缴。我们惟有教育小孩，用爱心来对待他们。从1966年9月到1970年2月后来我们从山区回来的1977年至1983年初，我们都用爱心和行为来彰显基督的生命和爱。除了平日生活中的谦让外，他们生病我们为他们打针、送药。甚至她丈夫急病，我的第二个儿子背他上医院就诊。他们的孙女学习不好，我们还热心帮她补习功课。治保主任的母亲来过几次，就对她的女儿说，我看这一家人是好人，不是坏人，你不可仗着是治保主任欺负他们。由于我们的行为感动了他们，文革以后教会恢复了礼拜堂聚会，这位治保主任也去听道，不久也信主了。在街道、区的评定中，我们被评为“五好家庭”，为主名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深感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在世人面前应该有好行为作见证，后来又被政府“无产阶级专政”，送去监督劳动期间，当时住在礼拜堂周围我们的邻居总有几百人，没有一个人出来作伪证、“控诉”我们有“反革命罪行”。就是因为自1950年我到尚友堂任牧师直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与所在地方的居民建立了非常良善的互动关系，总是尽我们的能力帮助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不少的居民或喜或忧都把我们当作亲人一样诉说心里话。这是主的大爱让我们能够学像主一样努力爱人、帮助人，为主作见证，荣耀主名。

我们的主又是信实、公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欺侮不得的主。1966年8月由礼拜堂所在的街道和公安派出所组织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破四旧抄家、抄礼拜堂、游街示众……主要的指挥者就是街道的党支部书记和公安派出所的所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先后遭大祸：先是街道的那个书记，由于在破四旧的时候逼死好几条人命，死者家人要找他算账，他只好东躲西藏。一天清晨，他慌慌张张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在人行道上，被一辆吉普车轧断了双腿，有的说是仇人干的，也有的说是交通事故。送到医院抢救，但十天后还是不治而死。派出所所长参加两派的武斗，背着手枪坐在消防车上，威风凛凛，不料在急转弯处消防车翻车将他双腿压在车下，消防车油箱爆裂起火，这个所长在车下十多分钟才被救出，住院一年多，落得

半身瘫痪精神失常，在世上苟延残喘十多年而死。另一个街道的武装部长也因破四旧后两年得了癌症、被妻子离弃而活活气死。礼拜堂周边的群众纷纷传说：礼拜堂的耶稣真灵，谁敢利用“破四旧”陷害耶稣门徒的下场真惨！当然我们不是希望这些人遭“报应”，但我们所信的主是轻慢不得的，这是真的。



十七. 我的软弱

只要是人，就会有软弱的时候，面对压力和诱惑也会动摇，甚至跌倒。但是我们的主总是保守恩待我，祂的手总是牵引着我，坚固我的信心。在政府发动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中，我遭受的压力和逼迫越来越大时，我也曾经迷失动摇过。

当时政府对每一个礼拜堂的讲道都派人做记录，以便在政治运动时可以以此来定我的罪名。我的礼拜堂里有一个女传道，就是政府指使作记录，每周要向宗教事务处汇报我讲道内容的。那时宗教事务处要求礼拜堂的牧师讲道时，必须结合政治来讲道。我动摇时，心里想：这不是很简单吗？我大小也是一个硕士，会看报纸和政府的各种报刊，我也能预备几篇结合政府的政治口号的讲章，我也这样做了。我在每次的讲道之前都会跪在祷告室内祷告。每当我讲结合政治讲章时，我一跪下，眼前立刻显现主耶稣带着钉痕的手，戴着荆棘的冠冕、血流满面，肋旁渗出血水，我立时泪流满面：“主啊，我得罪了祢，祢选召了我，要我传真道，要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传主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我软弱了，今天我要逃避加给我的磨难。啊，主啊，我得罪祢了！……”祷告完，我站起来，丢掉了原先预备好政治讲道稿，而宣讲了主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真理。讲约翰三章十六节，讲在这世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有一年复活节，礼拜六我刚从农场劳动后回家，我预备了复活节礼拜的讲章，同时写了一个条幅挂在礼拜堂的大门上，我写着“主耶稣复活了”。此时我心中被圣灵充满和感动，我垂下的双手又举起来，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我重新得力，能够在讲台上彰显主的大能，无所畏惧传讲神的大爱和祂救恩的真理。这就是我被共产党定罪为“与党争夺青少年”的证据。

在苦难的岁月里，世俗的诱惑，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和引导，你就会很容易落入魔鬼的圈套。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经历了“破四

旧”、抄家、游街示众以后，由于中央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全国陷入了混乱状态，使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约有两年的时间相对平静的喘息机会。我仍然每天要到工厂监督劳动。有一天，浙江舟山岛来了一个信徒，他是小学校长，因为在学校传福音，文革开始后被批斗开除，他妻子在福建便逃到福建。他来鼓动我，一起从沿海花钱躲在信主的渔民船上，逃离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这个计划确实让我心动：我回到大陆的十几年，一波又一波的逼迫、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对我的迫害，令我心寒。我巴不得离开这个受苦受难的地方、巴不得脱离这个无尽的被逼迫的苦日子，我自觉无法忍受这种苦难，想用人的办法来逃避这一切，一句话就是巴不得放下这苦难的十字架。有一天我下决心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我的妻子，她听完之后一声不响，在一旁不停地流泪，忽然我的心中想起一首歌：“我虽然忘记主，……，……，主总不忘记我”我在心里吟唱这首歌，感到自己的亏欠，我不禁哭了起来。第二天，舟山岛的那位弟兄来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不能去。我不能当逃兵，我宁愿继续跟随主，我回绝了他以后，心里平静下来。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段暂时的平静，预示着更大的逼迫就在后面。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掌权不到二十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都是不停地在整人、斗人，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是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哲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在这种严酷的政治压力下，无论是被斗还是没有被斗许许多多的人都想逃离这个国家。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有担心我今后面临更大的迫害的人，出于对我的关心，又来告诉我，在平潭岛有可靠的人可以送我去台湾，经不起他们一再的怂恿，我又心动了。我对我的妻子说出了我的想法，她停了很长的时间，才对我说：“当初你在美国蒙召时，你心中十分清楚在那样的情况下，以你的身份回到中共统治的大陆，献身做一个牧师，有多少的危险、苦难、逼迫在等着你，你并不畏惧，有那么大的信心，你说你愿意并且准备好为主殉道。当初的勇气、信心和决心，如今到哪里去

了？现在还不到要你殉道的时候，可是当年你所带领的青年佈道队，已经有好几位年轻的兄弟姐妹为主殉道了。你第一次被抓进监牢的时候，靠主胜过魔鬼，对公安厅社会处长说出不怕为主殉道的话语，这种信心和勇气到哪里去了？你想过没有，如果逃不出去怎么办？逃出去了，妻子儿女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家属，我们怎么活下去？你赶紧回头，回到主面前，求主帮助你，求主用圣灵和能力托住你，有信心面对苦难、为主名受苦的人是有福的。我妻子的一席话让我猛醒，感谢主。我相信是主借着妻子的口向我说话，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激励。我被圣灵大大地感动，我流泪自责，我知道自己软弱、失败、亏欠主，“背道的民哪（注：“民”原文作“女子”），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 31:22）但主仍然爱我，用祂的宝血洁净我，用祂的话语安慰我。“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赛 42:3）那位舟山的弟兄，后来也没有走成。原来这一切都有主的美意和恩慈。主让我有了这些经历，使我在1968年到1969年一年两个月的清队学习班的逼迫中，能够靠主的恩典、祂所赐的能力，胜过撒旦加给我的诸多的苦难，并最终得胜荣耀主的名。我所讲的这些见证，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圣灵的能力在保守恩待我们。大陆教会所经历的苦难，从信徒的被迫害、教会礼拜的被禁止、但到文化革命结束后信徒成千成万地增加、教会兴旺，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都是神自己在工作。



十八. 文革浩劫的结束、教会恢复礼拜活动

1976年中共三巨头相继离世，九月间文革的主要头目“四人帮”倒台，象征着大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结束。经过这一场浩劫，中国大陆政体混乱、经济全面崩溃。从1977年至1979年的三年的整顿，才逐步走入正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黑五类分子”等等，才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一些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有许多人才从监狱、劳改农场、农村、山区，回到原来生活工作的地方。我和我太太也从被关押了七年半监督劳动的山区，返回福州。1977年我获准回福州，但当地居委会主任不知道这是党的政策，竟然不准我们户口迁入，说我们仍是犯人，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非法的，粮食的定量也没有。我们只有迫切祷告、感恩和祈求。过了几天我们夫妇又到主任家苦求，这个主任的丈夫是个军人，正与另一个军人在聊天，那个军人是我大儿子高中的同学，是好朋友，我们早已认识他。他听到我们的哀求声，知道了情况，便责备那个主任违反政策，马上要将我们户口迁入，否则要犯错误。主任自知理亏，就为我们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神是爱所有罪人的，也愿意人人得救、重生，这位居委会主任和治保组长（他们由公安局指派监管了我们十三年），后来竟也参加礼拜，也上我们家与我妻子攀谈，最后悔改信主得救重生了。感谢赞美主！“人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悅，耶和華也使祂的仇敵與祂和好。”（箴16：7）

1978年福州基督教界也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十几位同工开了一个追悼会，地点就在尚友堂。这个礼拜堂，文革中已经变成工厂的仓库，没有完整的玻璃窗、没有椅子，大家站在破烂不堪的礼拜堂中开这个追悼会，心情沉重，没有人说话，对文革的腥风血雨仍然心有余悸。但回想起过去十年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对全能的主，充满了

感恩之情。是我们的主保守带领我们走出了死荫的幽谷，祂的杖护佑我们战胜了死亡。

基督教界这次追悼会是由政府统战部宗教事务处召集的，但是由于十年的浩劫，只有三十多位同工参加。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中，基督教人士受到百般的摧残，许多人无端地被冠上各种吓人的罪名，均被置于死地绝境。可是在追悼会上，政府只派了一个宗教事务处的干部，随便做了一个宣布，他代表党和政府宣布为各位平反，一句话带过。这与政府的政策规定相差甚远，政府规定应将个人的档案材料和所定的罪名，交给本人看过，然后当众销毁。可是宗教界没有这么做，一句话轻轻带过。这位干部同时宣布，礼拜堂可以预备恢复礼拜。恢复礼拜，谈何容易。殊不知，文革中所有的礼拜堂都被占据做工厂、仓库、办公、居住……等等用途，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面目全非。文革以前，教会已经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战战兢兢活动，到了文革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证，现在怎么做，政府没有说清楚，大家都心有余悸，不敢也不知道怎样去恢复。有一天，宗教事务处的干部登门来访，他代表政府要我出来主持教会的工作。他们认为我在信徒中有威望、有号召力，只要我出来大家也会跟着出来。当时政府急于以新的面目展示给世界，出于统战和宣传的需要，把好话说尽。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当然不会不明白当局的用意，但为了信仰、为了在中国广传福音，我觉得自己仍然有必要为基督的事工据理力争。我问这位干部，请问：“你们要我出来主持教会的恢复工作，我应该按照什么来讲道？”他立即回答：“讲圣经，当然是讲圣经啦！”我反问：“过去我一直是按照圣经讲道，没有一句反政府、反共的话，可是却被政府扣上反苏、反共、含沙射影攻击共产党等的许多罪名……”这位干部赶紧接着说：“那是当时‘左’的思想造成的，现在不同了，你完全可以讲圣经。”我又反驳他“过去你们规定不许讲主再来，这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不许讲，那还讲什么？”他又承诺：“现在不同了，只要是你们的信仰，都可以讲。”我知道政府的政策是多变的，当有需要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以后则可以随

时清算你。不过我此时心中有上头来的感动，圣灵已经为中国教会的复兴做好了预备，为我们打开了教会的门，尽管有过去惨痛的经历，我仍然认为作为主的僕人，必须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地为恢复教会的活动出力。不久，中共统战部宗教事务处召集全体教会人员开会，宣读了中央的十九号文件。其重要的内容是“四个坚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个文件，国务院对宗教有八条规定：第一，必须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法令。第二，在一定的宗教场所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这就是定点，表明在其他的场所，在家里不能进行宗教活动。）第三，政府认定的教牧神职人员才能主持宗教活动。（这就是定人，未经政府认定，其他人不能讲道、不能领祷告。）第四，不能向十八岁以下青年传教、不能接受他们入教。第五，已推翻的剥削制度不能恢复。第六，不许干预国家政策法令、不违反教育政策。第七，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人民身体健康。第八，服从政府宗教部门的管理。在还没有恢复礼拜活动之前，政府要求我们除了星期天，每周六天学习这个规定三个月，讨论这八条和提意见。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恶梦各个噤若寒蝉，谁还敢发表意见？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靠着主的能力与恩典，大胆向政府、向“三自”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和要求。感谢主给了我恩赐，使我有为了信仰敢于抗争的勇气。对这八条的规定，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的领导不是共产党而是神，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思想的根据是圣经，不允许向青少年传教更不符合圣经，慕道而来的青少年我们不能拒绝。我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许多尖锐的看法。那时政府急于扭转文革带来的恶劣形象，对我们的这些话，表面上不予计较，但已记在“账”上，留待以后清算。我的同工许乐滨牧师是个查经、祷告都有特别恩赐的，当时也提出了与我相似的意见，到了教会恢复聚会、开办神学院、教会也急需牧师，但是有关方面以各种不实之词诬陷他，不许神学院请他讲课，不准他主持礼拜、讲道，处处为难他，最后他不得不暂时离开教会。虽然我们

在会上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合理的意见，当局已经定下的法令是不能更改的，叫你讨论提意见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尽管如此因为文革停止了十三年的崇拜，现在政府允许恢复礼拜和各项宗教活动，我们仍然怀着感恩的心，努力筹办第一座礼拜堂的恢复礼拜。经过半年的整修，重新购置了礼拜堂的椅子、讲台、各种设备，终于在1978年的9月第二个星期日在尚友堂恢复停止了13年的礼拜日崇拜。教会活动被禁止了13年，许多人对政府还心存疑惑，更有人心存余悸，还有交通不便等因素，我们估计来参加礼拜的人数不会超过500人。可是到了那日，出乎预料竟来了5000多人，基督教各教派的都来了，政府统战部宗教事务处的人员全部出动，甚至还来了许多公安便衣警察。理由是保护宗教活动，实际上是监视我们。

礼拜开始，当尚友堂沉静了十三年的礼拜钟声敲响的时候，许多人早已泣不成声了。信徒们想到这十三年来教会的坎坷经历，神的儿女们遭受的逼迫和苦难，如果没有主的手牵引，如果没有圣灵保惠师的带领，我们又怎能穿行死荫的幽谷而不遭害呢？想到主的恩典、想到主的慈爱、想到主的怜悯，信徒们又怎能不感慨万千呢？“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讚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讚美称谢耶和华说：‘祂本为善，祂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讚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

（拉3：10-13）那一天，是我证道。我的题目是：《愿你们平安！》，这是主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自从那天聚会结束后，这句话就成为礼拜堂和信徒们彼此见面时最喜欢说的话。此后，福州全市以及郊县，乃至全省各地许多礼拜堂相继开放恢复礼拜活动。而神学院已经停办了三十多年，经文革幸存下来的教牧人员，最年轻的也有五、六十岁了，因而恢复神学院，培养传道人又成了当务之急。当

时一方面各教堂要恢复聚会收回教堂问题很多，有很大的阻力。要收回使用权，与政府部门及占用单位交涉旷日持久，经费及人员的安置等等棘手问题都要妥善处理；另一方面又要筹办神学院，诸多的事务堆积如山，都要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虽然辛苦疲惫，但有上头来的能力心中平安喜乐。而所有的这一切问题，就必须通过召集当地的同工、信徒代表开会，商量解决之道。因此我经常深入到各地教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在各种会议当中，我特别抓住培灵性质的聚会，乘此良机广传福音，并借着圣灵的工作，复兴各地的教会。比如在福州邻近的福清县，我去主持恢复教会活动的会议，有一千多人参加。十天的会议，我在每天的灵修会中都讲道。而最后一次的聚会，我觉得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就必须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把所有的罪对付清楚。我倡议每一位信徒将自己需要祷告的话写在小纸条上，这样每一位信徒都有表达自己心中话语的机会。据统计，纸条近上千张，这说明差不多的所有信徒都写了。这是一次彻底的认罪：有的人软弱不敢认主、有的否认主，卖主卖友、有的犯奸淫、盗窃、等等都在主面前认了罪。神借着众人的认罪悔改，主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使我们圣洁、称义，能够坚定事奉主的决心，复兴主的教会。后来事实证明，福清教会的复兴成效最明显，最快。福清教会的复兴告诉我们，什么地方的教会认罪悔改、对付自己的罪越彻底，就越有圣灵的能力。越能被圣灵充满，信徒和得救的人数就会增加，越能复兴。据调查，现在福清市信徒之多，与人口的比例全国首位。哈里路亚，赞美主！

全省各地教会陆续恢复聚会活动以后，传道人太少青黄不接，而办神学院又不是说办就能办的容易事，因此在筹划办神学院的同时，为解燃眉之急，我们开办了面对全省义工的培训班。每一期二至三个月，每期五十人。我们将各地已在带领聚会、真正得救信仰纯正的信徒招收进培训班，连续办起了好几期。“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 2：2)接着我

们又以最快的速度盖起了简易教室和宿舍，建立了华东地区也可以说是全国第一所神学院。从各地招收决志献身福音事工的青年来神学院学习两年，初期的义工、培训学员、神学生，都是品学兼优的。他们回到各自原来的教会，都有美好的见证。但是办了几个学期后，政府出来干预了，规定义工和神学生必须由各地三自会推荐、选派。这以后学生的质量大有问题。有的根本未得救、甚至连圣经从未读过的人都送来了。

回想大陆教会文革后恢复聚会等活动的那些日子里，用马不停蹄、夜以继日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我一个人兼任福州市内两间最大的教堂和郊区一家礼拜堂的主任牧师，每个月要到福州的一个郊县证道一次，还要到郊区几个聚会的地方讲道，虽然异常的忙碌辛劳，但心中时时充满了喜乐，以往身体上的疾病，包括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毒打遗留下来的腰椎损伤、腿部肌肉萎缩等疾患，也无关大碍不治而愈。圣经上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15：26 诗103：1-6）“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祂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祂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祂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诗103：1-6）

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亲身经历的见证。1966年8月我在破四旧运动中，因为坚决不肯跪拜毛泽东像，被红卫兵用木製教练枪猛击我的腰部，造成脊椎损伤，并引发左腿肌肉萎缩，半瘫痪，两次卧床半年不能行走，后来虽然经过多方治疗、服药，但十三年来只能借用拐杖助足行走，每次只能行走或站立15分钟左右。教会恢复礼拜以后，这样我只能坐着讲道。于是我凭信心祷告主：“全能的主啊，文革使我离开讲台，这之前我一直都是站着讲道的，我不能在回到讲台时坐着讲道，讲道人从来都是站着讲道的，求主医治我，让我能够靠

着祢所赐的能力，站着讲道，荣耀你的名！”我这样祷告之后心中非常轻松，我妻子也和我同心祷告。有一天，我妻子忽然得到启示，她对我说，你记得吗，我们在山区监督劳动时为人看病，有一位年轻的伐木人，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不能走路，同伴用担架抬着他到我们的住处，请求我们为他治疗。我们没有办法医治他，就抱着不妨一试的念头，建议他使用进口的Bco针剂注射，改善神经传导和肌肉复健，想不到这位工人注射这种针剂以后就好了。还有一个产妇得了“月里疯”也是这样治好的。我妻子要我也试试看，结果注射了三瓶Bco针剂，我不用拐杖就可以站起来了，也可以长久的站立。以后在讲道中，我站着讲道，探访主内弟兄姐妹走很长的路，一点都没有问题。实在是奇妙的神迹。“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赛35：3、6）要知道，我从山区回到福州，看过许多医生，用了许多方法，都不见效，是神给我们启示，用看是普通的办法，治好了我的腿疾，让我为主做工。Bco 不过是维生素而不是药，但它经过神的祝福，治好了我的病。记得教会恢复礼拜的第一次聚会，我站着讲道、祷告一个多小时，礼拜结束大家还是围着我交通久久不肯离开。一位老弟兄对我说：我们有十三年被迫没有礼拜聚会了，一大清早我从三十五里外的郊区赶来，才听了一小时，很不过瘾，我要再听。许多弟兄姐妹都呼应要求再多听一些主的道理和话语，于是我又继续讲了近一个小时。当时大家饥渴慕义、心灵迫切的需要可想而知。“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1：53）

我到郊区农村讲道，一般都要预备三个讲章，就是一个题目也要讲三个小时，奇妙得很，我的腿疾竟然一点也没有给我带来麻烦。而更奇妙的是，为得救的信徒浸礼，一般每天四个小时站在水中为250位信徒施浸，连续三、四天为一千多位信徒行浸礼，很多人担心我不能坚持站在浸礼的冷水中，第二天就不能再进行了。感谢主，神的医治就是这么完全这么奇妙，自1978年到1985年我离开中国前的七年之

中，我都是这样为信徒施浸，我的脊椎神经和腿疾至今十多年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左腿肌肉的萎缩也逐渐恢复。这都是神的医治和作为，神的保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本来我只有一本小小的新旧约圣经，教会恢复聚会以后，海外的主内肢体陆续给我带来了串珠圣经和许多工具书。一天在灵修时，心中有感动：现在我有了许多属灵的书籍和工具书，何不利用这些书写一本关于基本信仰的道理，给刚刚恢复的教会、众多饥渴慕义的肢体一份属灵的粮食。但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动过笔，况且写出这么一本书，政府可能不许出版，岂不是白费心机。感谢主，祂给我圣灵的启示，让我从串珠圣经以及近十多本的工具书中发现，许多都是经文，可以用经文来编写这么一本书。于是我花了几个月编写了一本《使徒信经研究》，帮助传道人和信徒分辨基本信仰的要义，抓住圣经的话语，抵挡异端的侵扰。编好之后放在那里，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出版发行。原来神都有安排，都有美好的旨意：不久义工培训开始，接着神学院开学我正好用这本已经编好的《使徒信经研究》来作为基本要道的教材，甚至供应全国各省市义工培训和神学院的需要。我还在福州郊区马尾礼拜堂用了两年的时间，对近一百五十位各地来的传道人，用这本书进行培训。这本书在全国各地大约印了五万本以上，在当时基督福音教材缺乏的情况下，对于饥渴慕义的传道人、义工灵命的增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没想到神利用我这个小小的器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神的旨意多美好！

教会恢复礼拜活动后，不仅传道人太少，就连圣经、属灵书籍、灵修工具书都非常缺乏。礼拜聚会、家庭聚会、外出传福音讲道、讲道人预备讲章都需要圣经和各类工具书。为此我利用这一段时间，根据多年自己讲道经验和工具书，编写了一本约有二百题的《经题纲要》。这在当时福音书籍、工具书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很受传道人、义工和饥渴慕义信徒们的欢迎。以上这两本书因为都只有经文和简单的说明，政府找不出理由来禁止，便得以在各地广为印刷发行。“祂发命在地，祂的话颁行最快。”（诗147：15）

十九. “三自会”是执政当局管理和控制教会的机构

1980年后，为供应各地教会的需要，国内开始自己印刷圣经，第一批印刷一百二十万本，我们福建在发行计划会上，订购了五十万本，上海要了三十万本、南京要了二十万本。这说明当时福建教会的发展势头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一下子来了五十万本圣经，许多退休的兄弟姐妹，有的在邮电部门工作了几十年，有的是老会计师、老教师等等，他们都有丰富的发行经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这五十万本圣经发行出去了。

在印刷发行圣经这件事情上，始终有争战：在第一次国内计划印刷发行圣经的会议上，我就提出来要印刷简体字圣经，可以从新约圣经开始，目的是要让青年人看得懂。“三自会”负责人来福建三次，每一次我都提出这个建议，但他推说没有简体字圣经的版本，当我拿出香港圣经公会出版的简体字圣经给他看时，他又一口拒绝说：“我们不用别人的！”我反问：“难道香港印的圣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他不置可否。他竭力延迟简体字圣经的出版，其实是秉承当局的旨意，尽可能不让青少年接触基督的信仰，以达到有效控制青少年思想的目的。在出版串珠圣经的这件事情上同样有争战。教会刚恢复聚会，各种属灵工具书异常缺乏，为了帮助传道人、义工、神学生更好地预备证道、讲题、理解圣经，我建议印刷十万本串珠圣经，但“三自会”负责人的“印刷串珠圣经谈何容易”一句话给否决了，根本无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目的很明显。若是传道人、义工有了串珠圣经，必然有助于福音的广传，这是当局不愿意看见的。

当局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理念，当然是与基督教及其它宗教对立的，但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又不得不利用和容忍宗教，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但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必须纳入控制，必须

按规定受到限制。各级的统战部宗教事务部门正是这种管制的职能部门。对于基督教会，则授意建立“三自会”，在统战部宗教事务处统一的管理下运作。其管理骨干、负责人则选拔教会中具有双重信仰特质的人来担任。1985年我迁居美国，当即由许牧世教授介绍去见世界圣经公会的总干事。我向总干事介绍了中国大陆教会发展的情况和现状，也谈到大陆圣经、属灵书籍短缺，教会、传道人、神学生都很需要串珠圣经，请求他同意由圣经公会出资在国内印刷十多万本串珠圣经以应急需，总干事很支持我的想法，他说圣经公会很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只要中国“三自会”同意，我们会立即安排在中国印刷串珠圣经。我满怀希望立即写信给福建教会的负责同工，请他们向政府统战部门说明情况，并向“三自会”转达圣经公会的意愿，可是这位负责人一口回绝：“我们绝不会用外国人的钱来印圣经！”。他想的是信徒的需要、教会的发展还是想着当局的管制不是一语道破了吗？

（注：后来逼于形势，“三自会”才不得不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接受圣经公会赠送全套先进印刷设备和印刷圣经的专用纸，在南京的工厂印刷圣经。圣经公会每年支付相当可观的设备，零配件更换的费用。即使如此，这些设备必须按“三自会”限定的数量印刷圣经和一些属灵书刊，还需供国内营业性印刷使用。）

福州解放前曾经有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一所盲人学校，十分成功。这所学校的乐队和合唱小组还到英国表演，受到英女王接见。解放后这所学校由政府接管，约有二百多位学生，其中不少是基督徒，他们毕业后走上了社会，多数都在我们礼拜堂聚会。文革中，所有的盲人圣经都付之一炬，盲人弟兄姐妹没有盲文圣经，怎么灵修聚会？恢复礼拜聚会以后，有一年，我请求福建教会负责人到南京开会的时候，请“三自会”批准我们由国外寄一本盲文圣经。圣经只有经过三自会的批准，海关才允许放行进口。我们只要一本样本，盲人弟兄姐妹可以自己複製，可是“三自会”负责人就是不肯批准。我醒悟靠三自会是靠不住的，得自己想办法。真是神的预备，我女婿的姑姑由英国回国探亲，他姑丈是英国圣公会伦敦礼拜堂的一位牧师，奇妙的是

这位姑丈的父亲正是解放前圣公会盲人学校校长。我在福州接待他的姑姑，她说她的丈夫也会再次与她一起回福建探亲。我请求他们再来福州时，带一部盲人圣经给盲人信徒。第二年他们再次来中国，在台湾买了盲文圣经，特意乘船由香港到厦门，再从厦门乘火车到福州。除了盲文圣经，还带了一本盲文荒漠甘泉，我喜出望外。此后我们计划组织盲人弟兄姐妹每10人一组，由一位盲人肢体念圣经，其余的製作，再向北京的盲人印刷厂购买专用的纸张。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不久，我们获准移居美国。据说后来负责这事情的一位女同工，在请示统战部宗教事务处后就被搁置下来，没有下文。



二十. “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

1980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在南京召开二十年来头一次“三自会”全国委员扩大会议，福建省有十四位名额。我从来不是三自委员，对这种的“政治荣誉”也毫无兴趣。但文革中有多位的委员去世，又有多位的委员因为年老多病而无法与会。教会推举几位教牧人员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基督教协会，以此来代替基督教界对外关系中声名狼藉的“三自会”，这叫“新瓶装旧酒”。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前所未有的讲话。此人是当时中共的高干，是党内负责制定多种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等等）的关键人物。一开始，他就代表党中央、代表政府向全体与会的基督教的教牧人员道歉，他说他严重违反了党的宗教政策，他坦率地承认过去的几十年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而且有血债。第一，将所有的宗教工作者定性为剥削阶级。因而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迫宗教界办工厂、农场、强迫宗教人士进行劳动改造，有的主教、牧师年纪大，受不了重劳动的折磨而死亡。他宣布将宗教工作者定性为剥削阶级是错误的，宗教工作者与其他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医生、工程师、教师等）都是脑力劳动者。第二，过去几十年中错误地提倡在宗教工作者中培养红色的牧师、主教、神父、修女、和尚、尼姑等等，第三，1964—1965年间，发起“退教运动”，在温州、济南、成都等五个地方进行试点，也是错误的，后患无穷。我相信这位部长的话，说出了当局对待宗教的真实政策定位。回顾中共建政以来的几十年对付基督教的政策和手段，都可以从这位部长的讲话中找到根据。尤其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反右、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在有目的地培养和利用基督教界当中的一些人，使他们成为“红色”的基督教人士。意味深长的是，统战部部长的讲话，在会后分发的文件中被删

除了。这只能说明当局对待基督教控制、管制的政策并未改变。

“三自会”是一个社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说得准确一点，是一个基督教信众的组织，参加与否，全凭个人意愿。可是，就在1980年，仍然有一个宗教事务局的局长公开宣称，谁反对“三自会”，谁就是反革命。许许多多对主忠心的教牧人员，仅仅就是因为拒绝参加“三自会”，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动分子”而遭到批斗、关押、劳改、甚至丧失了性命。

中国官方将未向政府登记的教会称之为“地下教会”，被列为非法的教会，是被取缔和受迫害的对象。生活在广大农村、乡镇的人，以及在城市生活而对官方教会不能认同的人，出于对信仰上的需求，他们常常会以家庭的形式聚集，一起祷告、查经、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称之为“家庭教会”。这就是官方所说的“地下教会”。中国大陆有几十万个家庭教会，尤其在河南、山东、浙江、福建、安徽、广东家庭教会的活动是很活跃的。家庭教会的出现是被逼迫的产物。

1951年陆续发起的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开始时，政府命令所有农村的礼拜堂、市郊的礼拜堂停止聚会一年。而实际上是被停止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段礼拜堂被迫关闭的时间里，广大农村的信徒们到哪里聚会呢？他们只好散到信徒的家中聚会，这就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初创期。镇压反革命时，有一些教会被关闭，如福建的“恩典院”被当作反革命组织遭取缔。1956至1957年间的公私合营和农村的合作化，当局提出各教派也来合营和合作化，一个地方几个教派的礼拜堂的信徒合并在一个地方做礼拜，这样又关闭了许多礼拜堂，由于交通的不便，农村的信徒们只好在一些信徒家里聚会。到了1958年农村的公社化运动，使更多的礼拜堂合并而被关闭。如上海的二百四十多所礼拜堂被强迫合并成二十四所堂会。福州有六十四座礼拜堂，属七个教派，合并成十六座礼拜堂。这样就有无法计数的信徒只好在家里聚会。各地信徒组成家庭教会，人数由几十到几百不等。文化大革命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三年，所有的教堂被关闭、，圣经、福音书籍、诗歌等被焚烧殆尽；教牧人员、传

道人被批斗、游街、押送农村山区劳改。在这场浩劫中幸存的二三十万基督徒经过血与火的试炼之后成为基督的精兵，分布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成为家庭教会的骨干。由于圣灵的亲自作工，尽管家庭教会在当局的逼迫、打压、以至逮捕家庭教会负责人等的摧残下，信徒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快速地增长。中国大陆基督徒的数目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依据官方统计的根本无法反映中国大陆教会发展的真实情况，这从印刷圣经的数字上可以得到证实。世界圣经公会通过爱德基金会获准在中国南京印刷发行圣经，供应中国大陆教会。公布印刷圣经的数量五百万册，这与大陆公布的基督徒的数字五百万人恰好相同。按理中国大陆的圣经足以满足信徒的需求。但是到过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很多的信徒没有圣经。而这些没有圣经得不到灵粮供应的信徒，恰恰就是中国官方未将之归在统计数字之内的广大的“地下教会”的信徒。在圣灵的感召下，家庭教会的人数逐年剧增，1985年我离开中国大陆时，估计有五千万人之多，如今已经翻倍增长，达到一亿人以上。爱德基金会印刷厂印刷的圣经怎能满足这些信徒的需要呢？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大大加给大陆的教会。大陆基督徒人数如此之多，牧师、传道人根本不成比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圣灵自己在作工。靠的是中国家庭教会中的基督精兵，走“群众路线”，人人传福音，一个带一个，全家乃至整个家族归主。家庭教会不愿受政府的管制和约束，按照圣经的真理传讲福音的道理，因此福音广传，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十分惊人，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是中国官方无法阻挡的，也是压制不了的。我可以坦诚地说，在中国大陆时，我自己以及许多有圣灵感动的同工，虽然在官方的教会事奉，但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支持甚至掩护“家庭教会”的发展。我在离开中国之前，按照圣灵在我心中的吩咐，培养了好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为主付出，不顾辛劳和危险，终日奔波在山区、农村传福音。他们宁可周六周一请假不上班没有工资，这样有三天的时间。在周五下班后就骑自行车出发到几十里以外的一个家庭教会主持聚会。第二天、第三天一站又一站，翻山越岭，走过一个又一个山区的村镇，参

加六至八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点聚会。那时我们自己建立了好几个家庭教会。我到美国后，仍然通过回大陆的肢体，在属灵书籍、设备、经济上支持他们。当初我所建立的五个家庭教会现在已经发展到15个，人数由原来的一千人左右发展到现在约有一万五千多人。真是感谢赞美主，神爱中国，在那里借着中国家庭聚会兴起教会、施行拯救灵魂的工作，使人得到救赎。

大陆教会的信徒，无法享受西方国家信徒充分的自由和优越的宗教环境。但是正是这种受逼迫的环境，造就了大陆信徒对信仰的追求。文化大革命对教会十三年的禁止和逼迫，促使了大陆教会（无论是官方控制的教会还是官方压制的家庭教会）奋力的发展。中国大陆基督信徒纯朴的信仰，他们爱主、爱教会、因主的爱心灵火热。我当时主持的尚友堂（文革后改名为花巷堂），是福建省文革后第一家恢复聚会的礼拜堂。那时，大陆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但对主的奉献，却是热心深切，有的可以说是把养生的钱都捐了出来。记得恢复教会礼拜聚会后，教会要筹划印购圣经。一天清晨，我正预备前往礼拜堂，一个靠“倒马桶”为生的老姐妹来见我，（“倒马桶”，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一项工作，那时城市居民大部分的住屋，还是木结构的小平房，没有卫生设施，每天清晨就把装满全家排泄物的马桶，一个个摆放在人行道的边上，让那些负责“倒马桶”的工人，装上粪车，运往集散地。这也是那时城市的一个“景观”。这种工作收入很低没有人愿意干、又累又脏、被人瞧不起。）她拿出1000元对我说，500元给教会印圣经，另一500元预定100本圣经，要送给她家乡的亲友。要知道1000元差不多是她一整年的辛苦劳动所得，她就毫不犹豫地拿出来，这种爱主的心是多么难能可贵！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刚刚订婚，丈夫送给她一条金项链，听说教会要办义工培训班，缺少经费，她热心地捐出了金项链，并且主动要求担负起培训班的厨房工作。花巷堂的奉献款十分可观，刚刚恢复几个月，就能拨出十万元支持仓山的天安堂修理、购置礼拜座椅、讲台等恢复天安堂的聚会。福州台江区苍霞洲的基督堂、和上渡的福音堂的修复，也都由花巷堂拨

款，甚至福州郊县的一些礼拜堂的恢复，都有花巷堂的奉献款。文革十三年对教会的冲击、教堂的被无理占用、毁坏是可想而知的。礼拜堂修复、重建、靠的是信徒们热心的奉献，而信徒迅速的增加又要求新建的教堂来容纳新增的信徒，靠的也是信徒热心的奉献。这些都可以说明主的爱、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的爱已经深入人心，彰显了神的大能和荣耀。



二十一. 帮补受迫害肢体及困难家属计划

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许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为了主、为了自己的信仰被投入监狱和劳改农场，子女多数受到牵连。文革后当局“拨乱反正”落实政策，1980年多数的人被释放回到了原来的城市。这些人失去了工作，政府并不给与补偿，生活十分艰难，子女也并不宽裕，有的甚至无法赡养，生活陷入困境。我和我的妻子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感慨，回想起我们在文革中遭遇困难逼迫时，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用爱心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现在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爱心来帮助这些困难的肢体。我们想到一定有肢体与我们同感。，就商量联络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一起帮助这些生活处于艰难的肢体，尤其是为主的名受过苦又年老多病的肢体。“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罗12：13）我们希望我们小小的奉献，能变成神的祝福，就像“五饼二鱼”能够使他们不至挨饿。1978年我们开始时计划帮助50人，当然这个计划不能让政府、也不能让三自会的人知道。我们暗中悄悄进行，后来人数增至80人，最多时达到200多人接受援助。1985年我来到美国后，国内的肢体寄予更多的希望，盼能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可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并不像在国内所想的那么容易。一是在美国论及金钱是很敏感的事，对奉献金钱人们各有看法。二是这种事不能公开，以免传到国内对当事人不利。但我们心中的负担不能放下，因此除了自己奉献，只对一些十分亲近的肢体提及此事，有感动就会奉献一些金钱。我自己一有空余的时间，就到女儿的餐馆帮工，他们付给我的报酬，有60%奉献出去，我女儿和我在加拿大的亲戚都参与了这个计划。最多的一年有8000美元送到国内，有242位的肢体得到帮助。范围有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福清、连江、永安、沙县、南平、建阳、莆田、古田、闽清、漳湖坂、上海、昆明、重庆、成都、南昌、汕头、温州、烟台以及东北等地。“帮补”的对

象中有二十位为主殉道的遗孀，福建就有十名。在国内各地我们都有
一位肢体负责，由他们来按名单去送达。几年之后，有一位厦门来的
陈弟兄，介绍我认识了惠安籍的林老弟兄，他很有爱心，神也祝福
他，愿意奉献更多的款项，我就将闽南需要帮助的肢体交陈弟兄负
责。在广州和汕头也有一位姐妹负责。这几年有的肢体来信说，他们
的子女收入增加，也孝顺，不需要帮助了，还有60多位肢体已回天家
安息主怀。现在只剩下80多位的肢体需要我们的帮助。近几年国内物
价的上涨，我们的支助计划也相应提高了30%。除了给这些肢体的生
活困难补助以外，我们还帮助一些家庭教会事工上的需要，由国内的
肢体直接交给他们。对于一些多病的、身体虚弱的老人，我们就准备
了一些美国的花旗参、维他命的药品，在我大儿子每年回国探亲的时
候带回去送给他们，以增强他们的体质。我们相信，为主的名对这些
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蒙神悦纳和祝福的。以
利亚说：“我指着所事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
得见我。”（王上18：15）“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
们，”“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
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
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祂的
福音，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与 神。他们也因 神
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林
后9：1，11-14）



二十二. 小女儿恢复美国公民身份、前往美国

我的小女儿1948年出生在美国，当她8个月的时候与我们一起回中国，不久中国大陆解放。由于她的出生背景加上父亲又是牧师，因此从小被人另眼相看。到了她上高中时，文革爆发，课也上不成了，后来就与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上山下乡。那时我们全家都是革命的对象，我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全家仅靠我妻子一人的工资过日子。小女儿和他二哥一起到农村劳动，吃不饱，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长年累月患上了哮喘病和胃病。到了1977年我的妻子退休她才补员进入福州一家医院做杂工，仍然是干重活。由于她自己的努力和进取，而且有高中文化，后来调到门诊挂号收费处，但她的哮喘病仍然常常发作。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渐有人出国留学或定居。我小女儿想也许可以去美国改变她的生活，我的大女儿为她在原出生的美国医院找到了出生证明，我们写了中文的申请信寄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很快就得到了答复：要我的小女儿带上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相片以及当时在美国证人的证明，到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办手续。我小女儿带上所要求的资料去了广州总领馆，等待签证的人有好几百人，她不得其门而入，于是上前询问，没想到惹得后面的人指责她插队，骂她，领馆的人员听见外面吵闹声出来维持秩序，我小女儿上前询问，工作人员一看立即让她进去，原来恢复美国籍并不在签证排队之列，而是特别处理。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不久，仍然以政治为主。像我这样的人，仍然有一种心有余悸的心理，不敢陪女儿一同前往美国总领馆，以免回来后被怀疑里通外国。我对女儿说，我只能在家为你祷告，你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很担心她在学校时由于中共抵制美国的政策不学英语而学俄语，怎么跟领事馆的人交谈。没想到接待的领事说一口流利的中国国语。他看了所有的材料，几分钟后便对我小女儿说：“祝贺你归国成为美国公民，大约14天你的护照就会从国

务院寄来。”我女儿恢复为美国公民，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领事馆要我的小女儿像所有的中国居民一样，按照规定向居住地的公安厅申请中国护照和出国签证。那时，要申请中国护照要好几个月的时间。美国领事对她说，领事馆会与她居住地的公安部门联络。临走前，美国领事还对我小女儿说：按照美国移民法，你可以申请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移民美国，这是你的权利，应该珍惜！我的女儿回来后，按照领事馆所交待的立即向省公安厅申请中国护照，由于领事馆出面联系，一个月就办妥了中国护照和移民美国的签证。我女儿回家后跟我们谈起领事馆建议她申请父母等一家人移民的事情，大家都摇头，不敢去进行。我们仍然心有余悸，况且教会刚刚恢复，有很多的教会事工等着我去做，我还放不下国内的事奉工作和多年的同工与弟兄姐妹，因此我们一致决定放弃移民申请。当我的小女儿第二次到广州领取美国护照的时候，领事才告诉她，像她这样的“归国者”是按照特殊的个案处理，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归国者拿中国护照离开中国，出境后将中国护照放入领事馆提供的外交信封寄回总领事馆，才向中国的外交部办理注销中国国籍。小女儿第二次到广州，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为父母申请了美国移民，她回来后我们担心惹出什么麻烦，还因此责怪她。我小女儿重新恢复为美国公民，在当时中国是罕见的先例，后来才有人陆续循此方法申请。我们办理的过程，全部付托在神的手中出乎意料的顺利，感谢赞美主！“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33：3）“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 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32：27）



二十三. 泥牛入海, 几经波折, 我和妻子获准移民美国

我的小女儿去广州美国总领馆领取美国护照时, 自作主张为父母申请了美国移民签证, 我得知后, 没有思想准备, 而且国内教会的事工繁多, 我们不想离开中国, 更不想离开多年相处的主内肢体。但是既然已经办了手续, 心想申请签证不是一时就能办成的, 并不把它放在心上, 专心于我的教会事工。不料未到两个月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就来通知要我们去广州办理签证, 可能是总领馆看了我们的材料以后有特别的对待吧。当时人们的思想、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脱离“左”的倾向, 使得我们也不敢到公安局申请中国护照。总领馆又来了签证通知, 我们才硬着头皮向公安局递交了申请。但我们的申请如泥牛入海, 一点消息都没有。此后美国广州总领馆每年都来了两次签证通知, 无奈我们拿不到中国护照无法前往办理签证。原来神的时间还未到,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和安排。当时大陆教会恢复活动百废待兴, 各地建堂、办义工学习班、开办神学院, 都需要我尽力为之。而我自己也在暗中建立家庭教会, 运用自己的影响竭力保护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事工, 再加上印刷发行圣经、讚美诗和培训教材等等, 诸多的事工要做, 因此我此时也不愿意离开中国, 这样一拖就是四年。此时, 获准出国的已经很普遍。我的一个外甥女是公费医疗门诊部的医生, 内科主任, 政府的干部多是她的病人。她看到我们的申请拖了这么久不予受理, 出于抱不平的心理, 她到一个任职公安局处长的同学也是她的病人那里打听消息。这位处长告诉他, 刘某人的妻子随时可以批准, 但刘某人永远别想得到批准出国! 听到这些话, 我心情沉重, 想不到文革结束时已经宣布给我平反,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把我看成敌人对待! 到了1984年的上半年美国领事馆寄来了一封询问函: 问我们是不是放弃申请美国的移民签证。因为四年了我们一直没

有去办理签证。不得已我们只得告知实情，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取得中国护照。一周后，美国总领馆通知我们：一，决定保留我们的申请，二，将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联络，希望有助于我们的申请。此后我们不再做任何的努力，在祷告中将这件事完全交给主。我们静候神的安排：如果神不要我们去美国，我们安心在中国的事奉，因为神的时候还未到。

尽管中国大陆自开放以来教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地陆续建起新的教堂信徒人数迅速增加，国内的教会也允许与国外的教会多种形式的交流，但是出于政治意识的本能，政府仍然没有放松通过三自会限制甚至阻挠各项事工。为此，我与政府、与三自会之间的抗争逐渐显露在台面上。

1984年4月间，我们得到市公安局的通知，决定给我们探亲签证的护照（当时中国的护照有移民签证护照和非移民签证护照之分）。后来得知，中央看到开放后申请出国人员剧增，有相当数量的申请被积压未处理，因而决定将以往几年积压的个案限期清理，不管结果如何都应该通知申请人。也可能美国总领馆的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才有这么一个通知给我们。其实这是一个一箭双鸮的手法：一方面，你申请出国，政府有权决定给你哪一种签证，总之政府已经放行；另一方面，道理很简单，申请移民美国签证，必须持有相应的中国的移民签证护照。而公安局只同意给我们探亲签证的护照，显然这是一个早已商定的陷阱：不符的签证护照，如果美国领事馆予以放行，则可证明我们与美国方面的特殊关系，同时也可以对国内教会宣布，刘某人宣称一心为教会，现在却借探亲为由，叛逃美国。（按当时规定，持探亲签证护照者，必须按时回国，否则以叛国论处。）我们考虑再三，决定拿探亲护照去广州，看看美国领事馆能否将我们的移民申请改为探亲申请。

我们到了广州，一位曾经为主名失去自由的林姐妹，热情接待我们，与我们一起在主前祷告交托，寻求神在签证问题上给我们祂的旨意。到了领事馆，人潮汹涌，我们交上证件、表格材料等，静候一

旁, 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們。出乎预料没有多久, 出来一位女领事叫Lancy帶我們进去, 令大厅的人惊讶不已, 以為我們跟领事很熟悉。到了一个办公室, Lancy 問我們要不要翻译, 我以為按惯例必须有翻译, 点头表示可以, 幸好我的妻子十分冷静, 她提醒我, 表示我們自己会沟通不必用翻译。我醒悟外国领事馆的中方工作人员多由政府选派, 负有特殊背景和任务。坐下来之后, 谈了几句, Lancy 说, 你們一定受了很多的苦。我們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含笑点头。多年的政治迫害令我們只能小心翼翼。Lancy拿起笔要签字, 我赶紧说, 领事, 我們的护照是探亲不是移民类的。她看了一下说, 不行, 中国的签证护照必须与你的美国移民申请同一类别, 你必须將护照改为移民护照。我慎重地对她说, 我取得这本探亲签证护照, 花了近五年的时间, 要取得移民护照我办不到。Lancy感到为难, 但决定与总领事商量, 讓我們第二天再来。回到住处, 我們立即跪下祷告: “主啊, 去美国的签证我們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們只求一切按你的旨意行。” 第二天我們内心很平静地来到领事馆, Lancy帶我們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 告訴我們经与总领事商量后為我們做了安排: 离开中国出境去香港用探亲签证, 到了香港后, 已经与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谈妥, 為我們改为移民签证, 以便入境美国。Lancy说这是极为特殊的优待办法。但是我立即表示, 我不能接受。她很惊讶, 我为什么不接受这样特别优待的处理办法。我只好坦率地对她说, 我在中国被怀疑为美国间谍, 如果采取这样特殊的通关办法, 当局就会大做宣传, 而证明我确与美国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同时还会給我冠上叛国的罪名。这对我們的教会不利, 也不荣耀主的名。Lancy因为移民签证条例的规定不能违反, 表示爱莫能助。我們只好打道回府, 而且向省宗教局局长汇报了此行的结果, 他听了以后就说那你就不要去美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统战部 and 公安厅设计好的。回到家里我們心中不免愤愤不平: 政府太不公平, 欺侮我們太过分了而毫无道理。后来我們就祷告主, 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既然神没有许可, 我們就留下来, 专心事奉主。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華, 耐性等候祂。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

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忿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诗37：7-8）

过了许久，有一天我把着自行车正走在路上，一部小车在我面前停下来，里面一个人把我叫住，他探出头来，我一看是一个认识的老前辈，颇受中共赏识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他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少熟人说出国，不多久一个个都成行了，你说要出国，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动静？我把大致的情况对他说了，他立即对我说，我介绍你到省公安厅去找六处的处长，他是我的同乡，也许可以帮忙。在路上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当即拿着介绍信骑上自行车奔往公安厅。到了传达室一问，说是上北京开会去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答复说一年以后。原来这位处长到北京党校学习。于是我转身离开，刚走了几步，突然传达室有人叫：老头子回来！我就又回到传达室。他问我：你找六处处长干什么？我说请教出国的事。他说，你错了，出国归八处管。他又接着说，今天八处副处长在办公室，我为你联络她。我不免心中奇怪：历来公安厅的传达室见到平民都是凶巴巴的，今天怎么这么和气！我又想，八处的处长我根本不认识，恐怕也帮不了忙。既然他为我联络，我坐下等就是了。只过了五分钟。远处走来一位40多岁的妇女，她朝着我打招呼，嘴里还叫着“刘医生，刘医生！”我好生希奇，这个称呼是我在闽北山区建宁县监督劳动时，为农民看病后才有的称呼，在福州今天怎么会有人这样称呼我。她走到我面前就问我：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摇摇头。她又说，当年你在建宁监督劳动，我是下放干部也在建宁，虽然没有什么来往，我认得你。我的小女孩得了癫痫头，各处求医问药，最后幸亏你为她治疗，根治痊愈了。这时我才记起来有这么一对母女来找我治病的事。她又问我，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就把事情的理由告诉她。她看了我提供的文件，对我说，这是我们公安部门的失职，按中央的有关规定，儿女是美国公民，申请父母移民必须在两周内答复。接着她又问我，你现在能不能去市公安局，护照是由市公安局发放的，我现在立即为你联络市公安局，为你办理。我当然点头同意。她立即在电话上

与市公安局的人讲了十多分钟。好像对方有不同的意见，但她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市局立即办理。原来这位女干部正是公安厅负责外事的八处副处长。多奇妙，我不免大大赞美神奇妙的安排，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立即赶到市公安局，这时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只见门口有一个妇女在等着我，她就是市公安局外事处处长，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告诉我外甥女说刘某人永远别想出国的那个处长。等我下了自行车，她就对我说，上级来电话交待，请你把护照留下来，明天下午来付10元手续费就可以拿到你的护照。第二天我们顺利领到了改为移民签证的中国护照。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次前往广州，还是Lancy 领事接待我们，见到我们她面带难色对我们说，我们实在无能为力，我们不能违反移民局和国务院规定，改变申请的签证类别。我们对他说，上帝为我们改为移民签证了。Lance 兴奋地跳起来，亲切地拥抱我们，并立即为我们办了移民签证，还对我们说了三句话：“圣诞快乐！（当时已接近圣诞节）愿你们一路平安！愿你们在美国过民主自由的生活！”我们心中满了喜乐，这是我们三十六年来没有听到过的祝福。“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箴13：12）“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闩。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赛45：2-3）

我们高兴地回到家里，第二天就到省宗教事务局见了局长，告诉他我们已经办好了移民美国的签证。这个局长一下子放下脸来，显出怒气，但全部手续都是合法的，他也无话可说。实际上，我们移民美国的事情，这个局长一直是在从中作梗的。两周以后我们接到省委统战部的邀请，要我们参加为我们送行的茶话会和宴会。这种待遇的规格在当时是很不一般的。茶话会上统战部部长说：“我代表共产党和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向刘先生道歉，三十六年来我们把一个好人当作坏人看待，但我们也是党的‘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希望刘先生到美国后，多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统战部长显然话中有话，但他的

道歉至少证明了过去三十六年共产党一直把我当成坏人，我所承受的冤屈在共产党政治观点上得以昭雪。在丰盛的晚宴上，我深切体悟到诗篇上神的话语“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脂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23：5）这一诗句深刻的含义。是的，过去的三十六年，我没有一刻不面临着危险、逼迫和苦难，若不是主的拯救、主的保守、主的怜悯，若不是圣灵能力的浇灌，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我们早已不在人世了。感谢赞美主！诗篇56篇全篇所说的正是我过去36年的情况，我能脱离死亡，全在乎我们所仰赖的恩主。“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

（诗68：20）我们获准移民美国的消息在教会里传开，许多弟兄姐妹依依不舍，有的肢体出于对我的爱护，认为离开中国的好。他们知道即使中共实行开放的政策，但政府当局对教会的控制和限制是不会放松的，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留在中国，总有一天还会有磨难、还会有逼迫。

我们是1985年1月离开福州的，在火车站有三百多位主内肢体及



各界友好前来送行。弟兄姐妹在站台上唱起《天父必看顾你》、《愿主同在直至再相会》，一一握手道别，歌声长久萦绕在站台的上空，我们的眼睛都饱含着泪水……每一位肢体都明白，三十六年我们共同经历过的苦难，增强了我们之间的爱和信心，坚定了我们事奉主的决心。教会恢复了礼拜活动，这是苦难的成果。我从来不说教会恢复了，文革十年和以后“拨乱反正”的三年，十三年来教会始终没有被摧毁，教堂的门虽然被禁闭，但人们心中教会的门一直敞开着，在许多地方，人们秘密聚会，敬拜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停止过。神开的教会的门，没有人能关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祂（注：“权柄”原文作“门”）。”（太 16：18）“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我必将 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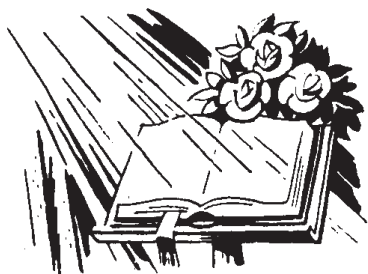
离开中国之前，我着手办了几件事：一是巩固已经建立的家庭教会，商量如何扩充；二是在福州市范围内寻找迷路的羔羊。三十六年来确实有一些得救了的肢体，因一时的软弱、迫于环境的压力和外邦人的逼迫，放弃了信仰。这些人有的自己暗地里认罪悔改，有的还在担心犹豫，因此没有参加聚会，我心里有负担，用了很多的时间，一个一个地到他们的家拜访。见面时我不多说什么，只告诉他（她）们我要离开中国，希望他（她）们能够再次回到主的殿堂，“弟兄（姐妹）要预备你们的心，迎见你的神。“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摩4：12）第三件事是，我对教会负责的弟兄说，我到了国外，我会设法筹措资金在国内印刷串珠圣经。第四件事是，我安排了几位肢体在各地负责分送奉献款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和家庭教会，这件事至今一直都在进行。



二十四. 美国，我事奉道路新的开端

1985年2月我们告别了事奉了三十六年的中国教会，告别了共同经历了惊心动魄年代而相濡以沫的主内同工和弟兄姐妹，重新踏上了这个自由的国土——美国。与三十六年前相比，我们感受到美国巨大的进步和变化。当初我应主的召唤，回中国事奉，虽然现在身在美国，但仍心繫中国教会，甚有负担。尽管三十六年来我们经历了水深火热的又大又久试炼，“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启1：5）“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前4：1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赛43：2）有多少令人不寒而慄痛苦的回忆，但我仍然感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对中国教会的复兴，必须义无反顾地尽自己的能力而行。因为我很清楚中国教会所走过的历程和现状。因此我们计划能够作为教会和外界的桥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来去去，为中国教会和美国教会的交往，提供一些帮助。为此我们打算半年之后再回中国，于是我们首先拜访了一些教会的领袖、肢体、及一些亲友。因为我是卫理公会的牧师，我先拜见了卫理公会的总干事。几年前这位总干事曾经访问过中国，在访问期间，他们预定要在福州会见卫理公会的杨昌栋博士、林观得教授和我。但我们事先接到统战部宗教事务局的通知，不得与他们见面，以至在礼拜堂聚会时，我只能避而不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聚会结束后，从边门走掉。因而，这次会见总干事我首先向他致歉表明当时的处境，他很理解和同情。他带我参观了总部、并约好下次面谈，详细了解中国教会的现状。我的年龄早已超过了规定的65岁的年限，因此他不能安排我的工作，因此我想回到卫理公会为教会做一点事的愿望不能实现。我

拜访了许牧世教授，这位享誉北美的神学家、布道家、作家、记者。他把我介绍给纽约的群羊团契和他太太负责的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让我有机会做义务的事奉。再由这两个团契介绍我到更多的教会讲道、做见证。美国的信徒很希望多了解一些大陆教会的情况，因此我在各地讲道的题目是《我信圣灵》，以我亲身的经历把中国教会经受过大试炼的洗礼告诉大家。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可10:39）许多爱主的肢体遭受残酷迫害的情事，见证了神的大能和无处不在，见证了主的救赎和怜悯，若不是主的保守、圣灵的工作，教会和信徒都将遭遇更大的磨难，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原定计划先逗留半年，到华人教会证道、探访肢体和女儿。也计划到南洋和香港探访教会肢体向儿时的马来西亚的同学、亲友传福音。我到马来西亚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三个月后得到答复，必须五年以后才可以提出申请。我只好放弃前往马来西亚的计划，而改为我和内人一起前往加拿大探望那边的肢体和亲友。



二十五. 加拿大之行，失去爱妻

1985年7月15日，应加拿大蒙特利尔宣道会简牧师的邀请，我前往该处在宣道会年会上证道，我携内子同行，为的是一起探望亲友。想不到我们到加拿大的第五天夜里，我的爱妻在睡眠中被主接回家。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我痛不欲生。那天夜里我们一起祷告后，我先睡了，她仍继续祷告。我第二天醒来还觉得有异，漱洗完毕后来叫她起床，当我推她不醒，才发觉她的脸色不对，双手冰凉，我的心顿时裂开了，我呼求主，我赶紧拨打紧急电话，虽然经过医院全力抢救，终因心脏停止跳动太久，而未能起死回生。我痛哭、茫然不知所措。我与她交友两年，结婚四十三年，为了主的名，爱妻与我同甘共患难，与我携手同行在事奉主的道路上四十三年，一起经过水深火热力不能胜的试炼，而且为了家庭付出了一切，现在溘然离我而去，我伤痛的心，如果没有圣灵救助和保守，我可能也将随她而去。因为这个礼拜天已经安排好到简牧师的宣道会证道，发生如此意外的事，简牧师建议我证道时间更改一下，我妻子的外甥女说，姑丈，上帝把姑姑就这样接走了，你就别去证道了。她不理解、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因而心中有怨气。但我在祷告中，得到圣灵的启示：如果不去证道，就落入了撒旦的圈套，不荣耀主的名。因此我对简牧师说，明天我一定去证道。这次证道，是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以来，所有证道当中圣灵最充满、最有能力的一次证道。我从主得到能力，决心今后更加努力继续传扬福音，事奉主，不向撒旦的权势低头。

我的两个女儿和她的家人得到她们母亲离世的消息，都从美国赶来。礼拜一，我们在当地教会举行了隆重而敬虔、简单而不失纪念意义的安息礼拜。蒙市的教会弟兄姐妹送来了许多花圈，简牧师主持礼拜，教会的唱诗班唱出了主对我的爱妻的疼爱、赐给她永生的盼望，来纪念主对每一个属祂的儿女的眷顾，给我的两个女儿和仍在国

内的两个儿子的安慰，和保守。教会的陈长老我的内弟，含泪叙述了姐姐虔诚事奉主、以深切的爱与我同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主名忍辱负重、受逼迫，陪伴我走过那活在中国大陆艰难的三十六年。我将我亲爱的姐妹我的爱妻遗体火化后，随着我的女儿返回到美国。那时悲痛欲绝的境况和光景，全靠圣灵的托住，否则我实在站立不住而垮塌、没有力量再活下去。由于这次变故，亲友和肢体都不同意我按原计划半年后回中国。为了纪念爱妻的离去，我写了三篇的文章，《纪念陈贞娟姐妹》缅怀爱妻与我同行的日日夜夜。文章刊登在当时的《中信》刊物上。（这篇文章，见附录）我将我的伤恸深藏我自己的心中，靠着圣灵的光照和支持，仍在美国东部许多城市为主作见证和讲道。

十天以后，爱妻的骨灰盒由Montreal 邮局寄到，我双手捧着骨灰盒，双眼早已泪流不止。我的女儿、女婿也陪着流泪哭泣。翌日我到街上选购了一个镜框，镶上我爱妻的遗照，我祈求主给我话语写在遗照上。我选了好几个联，但都不满意且不得安慰，忽然圣灵指示我：“安息在主怀，相会于天家”。我在遗照的两旁写上这两行挽联，又在遗照的上方写上“怀念贤妻陈贞娟姐妹”。写后心灵甚得圣灵的安慰，圣灵这位可靠的保惠师，安慰了我，擦干了我的眼泪。

从今以后若有信徒开追悼会，我不送花环，而送小型镜框，框里写上某某弟兄（或姐妹）安息，镜框的两旁也是“安息在主怀，相会于天家。”落款：主僕——刘扬芬敬挽，丧家都得安慰。

1986年加拿大蒙市宣道会简牧师为我安排了加拿大境内三个月的证道之旅，在加拿大的十几个城市主持培灵会或布道会。这当中有七个教会执意要聘请我担任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我祷告，神未允许，因此我一婉言辞掉他们的盛情和信任。我相信神要我到更多的地方为祂做见证，传扬福音的真理、宣讲见证神的大爱和能力、神的恩典和怜悯，特别是神在大陆教会中施行拯救的神迹奇事，来激发自己以及北美的信徒更多的仰望主、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投入教会的事奉。感谢赞美主，通过在北美巡回的证道、传讲福音，我很清楚地感觉到

主在引领我并且正在为我打开在北美的传道事奉的门，于是我毫不犹豫大步地向这个敞开的门走去。



二十六. 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移民美国之后，我们就计划要像过去宣教士那样来来往往传道。先是打算住半年，前三个月在北美讲道做见证，后三个月到我少年时呆过的印尼、新、马、菲，顺便到台湾、香港。我到纽约的第一个主日就被世界圣经公会中文圣经译本主译许牧世邀请到纽约 Riverside Church 的中国基督教团契讲道。（以后多次被邀到教会、夏令会讲道）。第二个主日就由华福会美东区董事、海外宣道会会长老梁嘉潮弟兄邀请到群羊团契。我一方面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驻纽约总领馆申请签证，结果我们没有被批准。原来新移民去加拿大、墨西哥不要申领签证，其他各国包括香港、台湾、都得五年拿到美国公民身份以后才有权利申请。这样原计划半年以后前往东南亚还福音的债和回中国的计划被打乱了。其时，我的女儿、女婿前往纽约上州 Highland 开餐馆，我们只好随之前往，Highland 属 Poughkeepsie 市，美国IBM总部就设在这里，大陆及台湾来的在IBM当工程师的不下200人，他（她）们多是基督徒，他们到我女婿餐馆来的时候，看见墙上挂着许多用中英文写着圣经经节的横额和条幅，知道我们也是基督徒，后来又知道我是大陆来的牧师，就邀请我去讲道。接着他们就开始筹划购买土地盖会所，两年以后他们盖起了一个能容纳400人的会所，并且聘请了台湾华福神学院毕业又在美国神学院深造的吴文超牧师，我才离开 Highland 到纽约市唐人街灵粮堂有福州新移民二十多人的闽爱团契领会。1985 年7月蒙加拿大 Montreal 省的宣道会的邀请，我们参加宣道年会领会5天，最后一个晚上，主把我妻子安然接回天家，我们原有的计划就被打乱了。我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的家庭以及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四家亲戚包括我妻子的胞弟，都反对我半年以后回大陆，而在大陆的两个儿子也极力反对我回去。在唐人街的福州新移民却都希望我能在唐人街“抢救灵魂”，因为，福州来的新移民不断增加，分布在美

东五个州的就不下三十万人。（现在据说将近一百万人），而我在美国的社安及医疗保险尚未办妥……诸多的原因使我不能凭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我明白了这是神的意思，是神要我像保罗一样，叫人不要花钱得福音。“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甚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林前 9：18）我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神的意思是叫我退而不休，这肯定有神的美意。我顺服神的旨意，将失去患难与共的爱妻的悲痛化作力量投入到我的事奉工作中。我16次前往加拿大讲道、做见证，其中有两次都是三个月不停地在加拿大全国传讲福音。而在美国则被纽约、宾州、新州、康州、加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伊利诺州等多个州的教会请去讲道，参与事奉。接着我担任唐人街卫理公会法拉盛分堂义务牧师两年，随后到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两次到台湾和香港还福音的债。为了抢救众多福州新移民的灵魂，我由团契开始建立了纽约基督闽恩教会，担任义务主任牧师六年；由圣经班建立



加拿大之旅留影

纽约基督家庭教会，并担任义务负责弟兄五年。我还创办了GTBM机构，坚持至今已有15年的以福音录音带和小册子来传福音的事工。从1978年在大陆开始的帮补有困难的老年教牧人士及其遗孀的事工，至今已进行了二十六年。协助大陆主要是福建省各县市募款建新教堂三十七座（也包括上海一座）。倡议编写中国大陆50年基督教史并参与人员的联系和资料收集的工作。参与传回耶路撒冷的大使命事工。最近由于我已年老行动不便，我受圣灵感动开办一带一福音课程函授班，以此来广传福音，收效不错。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说明神在我身上的计划，乃是要我做一个遵行神的旨意，忠于神的事工的忠心的僕人，在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后4：7）“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2：10）



二十七. 我在纽约华埠卫理公会 法拉盛分堂任义务牧师



在基督教衛理公會前的合影

1991年5月，我在去东南亚之前，美国纽约华埠卫理公会主任牧师来见我，要求我从东南亚回来之后到他的礼拜堂事奉。1991年的7月开始在纽约华埠卫理公会任义务牧师，负责主领周一下午的聚会。这是专门为礼拜天不能来礼拜聚会的人设立的。从此有十五个月每一个礼拜一我都主持聚会。在聚会查经时，信徒们对查考“使徒信经”兴味很浓，我自己也喜欢与信徒一起来研究、思考“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大纲，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弟兄姐妹交通、研考跟信经有关的这部分圣经经文，信徒们得到很大的造就。在卫理公会这个礼拜堂聚会的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彼此也热心

帮助。他们喜欢参加教会的事奉，因此当我提出要复兴教会的几个设想，很受他们的认同。其中之一就是，利用礼拜堂位于唐人街闹市，过往华人甚多，尤其是讲福州方言的人就有好几万的特点，在礼拜堂的前厅办福音站。当时这个设想一提出来，就有十六个人踊跃参加。1992年5月，我们福音站开始工作，项目有：“布道”，不管人多人少，都宣讲福音；“交通”，灵性上的交通。许多华人新移民，在新的环境中遭遇许多问题，求告无门，福音站提出帮助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和信仰上的疑惑及问题，很吸引这些人。“代祷”，为所有有需要的肢体代祷；“分发福音单张”，将印有各种福音道理或是见证的单张印刷品，分发给路人，使福音广传；“设立福音小图书馆”，鼓励大家阅读属灵书刊，一同唱诗，听赞美诗歌；“免费为华人量血压、提供医疗咨询。”为新移民或华人提供法律顾问等等诸多的项目。经过实践，不断改进，福音站很受欢迎。

参加卫理公会的事奉，除了福音站的工作外，我还可以参加纽约市内和近郊的一些教会的聚会，甚至到美东附近的城市证道，有时还抽空到加拿大的几个城市讲道。这期间法拉盛的分堂也复兴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事工实在是上帝自己在工作，一切荣耀归给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在播恩傳播中心
時的留影

二十八. 东南亚福音之旅

按照美国移民法，我移民到美国五年，就可以加入美国籍。由于在大陆申请移民美国时，无缘无故被延押了五年才放行，使我们晚了五年来到美国，因此很希望能够有特别的渠道，获得提早入籍美国的机会，以便申请还在大陆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庭。在入籍这件事上，由于自己肉体的软弱，总是不放心神的安排，想靠人的一臂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很多热心人和美国的朋友帮我写信给移民局、议员、甚至总统，要求特别处理。寄出去的信函，都得到了礼貌的回复，但有关当局仍然按章办事，不能给予特别的个案处理。到了五年届满时，我寄出了资料。却因为原来要求个案处理的缘故，我正常的申请反而耽搁了半年。这再次说明，靠人是靠不住的，唯有依靠神。当我们完全依靠神的时候，神就会赐福给我们，我的入籍考试就是这样，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诗118：8）

成了美国公民，我出国就很方便了，立即按计划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接着又转道香港、台湾，马不停蹄。我在这些地方的三十多间教会，做见证、传福音。马来西亚的沙拉越，是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六十五年后重返故地，看到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我所见到的土人过着像原始部落一样，吃生食衣不遮体的生活，在基督教、天主教的宣教士们的艰苦开发之后，建起了教堂、医院、学校，文化教育、生活水准与进步国家相差无几，许多我所认识的人甚至都获得了英国博士的学位。

我原计划的行程是，先到加州，后去台湾、香港，再后去东南亚。后来接到大陆的来信，得知在马来西亚的二姐确诊患了喉癌。于是临时改变行程，先到东南亚。我通知在大陆的大儿子按照我开的治疗喉癌的中医药方，在国内配好带到香港交给我带去马来西亚。在马

来西亚的三个月，我自己为二姐熬药、喂她服药、再配合西医的治疗，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三个月后她的病情竟然日见好转，感谢主！只要我们凡事仰望和交托，临到神的儿女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信主的人都能得着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8：28）我行程的改变，使我有机会参加纪念马来西亚闽清籍侨领黄乃裳的诗巫、沙拉越开埠九十年纪念大会。全球包括大陆福州十邑同乡会都派了代表参加。大会指名要我代表全体来宾发言，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在场的每一位发言，都注重黄乃裳先生带领华人在诗巫、沙拉越，如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如何正派清廉、爱国爱家乡。在中国大陆对黄乃裳的评价也同样偏重于他支持了辛亥革命、乐善好施，带领乡亲艰苦奋斗开创新福州的功绩，而忽略了黄乃裳先生乃是中国早期教会一位极为虔诚、热心事主的基督徒。黄弟兄是前清举人，曾到福州英华道学院念了一年的神学，后被委以教会的传道、为教会办了几份报纸。他看到闽清、古田一带以及福州的农民因地少人多生活十分贫困，他到伦敦找英国政府谈判，请求在当时英国的属地马来西亚的沙拉越、诗巫划地开垦。黄弟兄先后带了三批四千多的乡亲到诗巫垦荒，每一批都配备了各行各业的人才，牧师、教师、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建筑技工、等等。而黄乃裳本身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奔波忙碌、呕心沥血。我们不禁要问，黄乃裳为什么有这样卓越的远见，完全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位上帝，有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在大会上为此作见证。传扬福音的真理。那一天我的发言与众不同，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受到了广泛热烈的赞扬，荣耀了主的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大陆文革后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那几年，统战部曾组织党外人士写黄乃裳事迹回忆录，我认为多数的回忆文章只提爱国的一面，只宣扬他的爱国情操。于是我也写了一篇有关黄乃裳史实的文章《以基督徒的立场看黄乃裳先生》，着重指出黄乃裳先生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力来自他的信仰，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这次东南亚之旅，是主的安排，让我有机会高举基督圣名，宣

扬福音做见证。同时我也发现这里的信徒爱主的心火热，他们信主以后受圣灵感动，会孜孜不倦地传福音，一个带一个，使教会的人数日渐增长。因此我在证道时，呼吁兄弟姐妹在主面前立约，每一个信徒在一年之中最少带一个人归主。在东南亚的三个月证道中，真正举手立约要带人归主的信徒有4700多人，这次东南亚之行传福音的果效，十分可喜。我回到美国以后的几个月，常常有人来或捎口信给我，说那里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忘记与主立的约，报告那里的好消息，说什么人在什么人的带领下信主了，大家一个带一个，信主得救人数大大增加，我心里真是感谢主的大能。所以说，传福音不仅靠传道人，每一个信徒还要尽自己的本分，接受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去传福音，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注：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太28：19）



二十九. 创办纽约基督闽恩教会



我在閩恩堂講臺上證道

我从东南亚回来以后，继续在闽恩堂事奉。那时是一个月一次去讲道，其他的时间还是到各个州去。闽恩堂的人数增加了，大家就觉得应该找一个地方，那时正好在 Allen 街133号有一个住房，原来是作为澡堂的，是政府的财产。有很多年没有使用了，政府登报准备卖掉，要60万元。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呢，我们的现金只有七万。我们为此迫切祷告。正好那社区有犹太人、南美来的组织，就要求政府把这个住房作为社区服务的场所，卖价不能超过三十万。后来政府就按这个价格进行招标。那时，林琦龙弟兄是搞地产买卖的，他对教会的事也热心。我们就研究这件事情，一致认为我们不能超过三十五万投

标。于是我们就迫切禁食祷告，在投标时，我们去了六个人，社区的人来了好多，房地产的生意人也来了很多。竞标开始，主持人喊出三十万，我们赶紧举牌应标。这样我们就开始等，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人出来加价竞标，预示出将一锤定局卖给我们闽恩教会。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奇妙的恩典，赐给我们做教会。以后我们就问社区的来人，你们需要为什么不加价竞标，他们说我们如果说三十一万，你们肯定会说三十二万，我们说三十三万，你们就会加到三十四万以上，我们没有办法和你们竞争，乾脆就让给你们做教堂，我们就不投标了。你看多么奇妙，所以头一期我们就付了六、七万左右把这栋房子买了下来。接着我们就开始装修，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装修，这期间我们仍然在凯瑟琳街那边继续我们的聚会，还是郑以勒弟兄负责。这以后陈书藩弟兄就提出来是不是聘请一个正式的牧师或是长老来，他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陈长老，是永泰人，事奉主已经好多年了，大家也都认识他。他会说福州话，更会讲广东话。是不是请他来负责，大家以后就同意了。就申请他来的证件。实际上我们申请这个证件三年前就开始了，只是到了申请陈长老的时候才得到批准。请了陈长老以后郑以勒当然就离开了。郑以勒后来就在唐人街开了一个移民服务社，林琦龙也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两个合在一起，两人在教会还有事奉。陈长老夫妇来到闽恩教会事奉，教会在布鲁克林找了房子，一个月800元的房租给他们住，还有医疗保险、报税等福利待遇，大概每个月近三千元左右的开支。陈长老事工开展得很好，想不到作了不到二十个月，陈长老就提出来要辞职，因为他太太在这里不习惯，她常哭着打电话给我。陈长老与执事会的一些人特别是陈书藩弟兄关系处理不好。我问他，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得到批准聘请你，你只干了二十个月，怎么回事？他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做下去了，我问他你要是走了谁来做你的接班人，他说没有，我说没有，那怎么行呢？他就说希望我来接他的班。我说我不可能，我还要去东南亚两次，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我实在很难很难。但是我在祷告中，似乎主也要给我这个负担，意思说这个教会从开始到

现在人数也增加了，向政府登记的时候已经有七十多人，又有了礼拜堂，我也应该多负一点责任。后来执事会一致通过，让我来接替主任牧师。我就对他们说，我可以做主任牧师，但我是义务的，因为政府有给我补助，每个月500元，我够用了。陈长老离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生活需用的负担太重，他一个人每个月就要用近三千元。同时我还是要他们去物色主任牧师，我只能在这里半年的时间。在半年的时间里，教会搬到新址我要做三件事，第一，讲台的事奉是我主任牧师负责，第二，继续去找一个接班人；第三，要还清买房子及装修的钱三十一万。这三件事办好了我就要离开。陈长老还没有离开的时候，我曾经问他谁比较适合做接班人，他说郑以勒，我也有同感。我接任以后就开始注意郑以勒，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跟他交通，他说神还没有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人，就是有呼召他也不会回到闽南堂。我就感到有很大的问题，五个月的交通他都不肯接受。不过我事先有跟他讲好，在我接任的六个月里，每一个月他要来讲道一次。郑以勒也答应了，我又想到要找谁来接替的问题了。我知道我自己年龄太大任主任牧师实在是力不从心。我找王蓝田牧师，他各方面的条件我觉得都很具备。但是他也不肯接受长期应聘，也吃不消，只说一个月来讲道一次，于是暂时搁下。关于讲台的事奉，我坚持由我来负责，虽然那时候执事会有个别的人还不同意，用各种的方式来反对，认为讲台的事奉，应该由执事会来决定，但是我坚持要这样做，结果执事会最后意见达成一致，认为讲台很重要，应该由主任牧师负责，邀请什么人来讲道也由主任牧师决定。关于还债的问题，做了六个月以后我还是没有办法提出来，因为那个时候聚会的人数不多，只有七十多人，不过我相信神一定会把得救人数加给我们的。我们最初装修的时候，是把大厅后面的三分之一作为办事处、另外拿出一间房间给管堂所的弟兄居住。还是觉得不妥当，把办公搬到楼上去，另外还想在那个拆掉的地方再盖上一层，可以放十二张的椅子，以便增加人数时使用。我的意见与大家不同，我说假如人数增加，我们可以买一个大型的电视，把讲台上的牧师讲道传送到电视上，上面还可以容纳二、三百人，同

时也可以用来作为主日后就餐的地方，还可以作为小组团契聚会，如青年团契、妇女团契、查经班等。这样做了六个月以后，我就离不开了，大家一定要我留下来，我就继续做下去。到了第二年，大家就想如何扩大，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地下室改建。那时地下室是一个积水、杂乱肮脏的场所，需要花很大的精力、财力清理。但是如果弄好以后，面积就与上面一楼的一样，用起来很方便。于是就发动大家努力奉献，把地下室的一半改建装修了。地下室的后面还有一半是地面比前面高出三英尺，当时我就建议，虽然钱不够，我们乘装修的时候，把这地面的泥土挖掉，弄得与前半部一样平，但是执事会认为钱不够，（这也说明我们信心不够）就没有这样做，于是后半部分就无法使用，只能作为堆放杂物的仓库。过了两年，我感到我们为此所欠下的债务，应该还掉。但是头一个反对的就是林琦龙弟兄，当时也是他最热心主张购买这个教堂。他觉得我们没有欠那么多的钱，应该不包括银行的 Mortgage，我就对琦龙弟兄说，欠银行的也是欠，我们教会有欠债就不荣耀主。教会变成欠债的教会，他说在美国都是这样，买来的房子把 Mortgage 当作租金，那时我们每个月要的 Mortgage 一千六佰美元左右，我说银行的 Mortgage 也就是贷款，还钱就一定通通还掉，大约三十一万美元。我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定会成就的。以后在执事会扩大会上我再一次提出来，大家都通过了，执事必须先写各人的奉献款，但大家都等着我，我是主任嘛。其实不该我先写，但我按照我的经济情况，我一个月只有五百元的收入，我就说，我半年的时间奉献两千元，以后大家都是两千两千的写上奉献的款项。以后执事会主席陈和平就用纸画了一个用砖块垒砌的墙，象征教堂的墙基，一块砖代表奉献五百元，谁在砖块上签名，就表示他要奉献五百元给教会建堂。这样张贴出去以后，很多人就在上面签名，有的不是我们的会友，是福州人来聚会的，也签名在上面。也有的是香港来的福州人也在上面签了名。有好几个在上面写上一万元。这张纸贴出三、四个月之后，我们合计了一下，还欠款的钱已经有了，于是我们就把款全部还清了。那时候，香港的第一个

福州话礼拜堂也在筹建之中，需要向我们先借款，我们还借出了三、四万元。我在那里做了四年，那时教会已经发展到有四、五百会友的大型教会，到节假日（复活节、圣诞节等）一般都有八百人以上参加聚会。家庭医生觉得我这样太劳累会负担不起，建议我离开。于是我就向执事会提出来，他们都流泪，一定不让我离开，他们要我留下来，一同去找适合的接替我的人之后再说，就这样又拖了一年。一年后，我又有病了，我再次提出来离开的请求，但还是不行，到了第六年，我就找执事会商量，我说我可以再在这里一年，不过这一年让我只有讲道，执事会开会等其他活动我就不要参加了，大家也同意了。主日的讲道、查经会仍然需要我来，其他的活动根据我的情况自己决定。到了七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个黄得恩老弟兄他是聚会处的同工，我在福州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在大陆也是受迫害很惨的，他被判无期徒刑。在江西他的老家劳改，到了邓小平时代，他才被平反释放。他坐牢、劳改了十六年。他有一男一女，女儿在北京工作，儿子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远东广播电台工作，申请父母来加拿大。这次是这里的教会请他来讲道。我看到他高兴极了，就想到让他来接我的班。起初他不愿意，我就与他一起祷告。我动员他说，你在大陆受过这样大的苦难，你今天能够出来是神的恩典。这里福州人很多，你也会讲福州话，执事会也同意，你不妨就在这里事奉。后来他就说我只能在这里四个月，四个月以后我要回去两个月，因为已经接受人家的邀请。这样他来了以后，我还是主任牧师，但讲道、查经什么的就由他负责，我只是在一旁协助他。在到处寻找牧师之时，执事会要求我再担任半年，负责主持月初的讲道、主领圣餐。后来执事会找到了陈召清牧师。陈召清牧师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曾经在使者协会事奉。感谢主的预备，后来闽恩堂聘到了合适的牧师，实在是神的恩典。陈牧师来了以后，闽恩堂发展很快，信徒发展到一千二百人左右。

三十. 创办纽约基督家庭教会

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闽恩堂有一些人来做了一次礼拜就没有再来了，这些人多半是从长乐、连江家庭教会来的，大概有二十几个人住在亨利街那边，他们自己在家读圣经、聚会，有一次，他们就请了陈振声弟兄到他们那里讲道，陈振声弟兄是厦门人，我早就认识他了，而且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在那里讲道，但不会说福州话，讲闽南话和普通话，但这两种方言有许多人都听不懂。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那里有二十多人有这种情况：他们不愿意到闽恩堂、以及附近的教堂聚会，要自己聚会。他对我说，你现在已由闽恩堂退休了，应该关心这一群肢体，因为没有擘饼聚会。他还说，现在刚好圣经班结束，黄弟兄是很好的一个传道人。他和张钧都可以在我们中间事奉。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所以我有一次也到他们那里去，另外我就征求圣经班里的许多人的意见，他们都说很好，教会都是要扩大的，那边的地点也不错。我就跟黄弟兄、张钧博士、多佳姐妹经过好几次的祷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念头，邀请黄得恩弟兄主持新的教会聚会，其次就是张钧弟兄。黄老弟兄跟张均弟兄都同意。我们就定在一天选举出一个董事会，以董事会向联邦申请新的教会机构。奇妙的是，我们委托方利明律师楼申请，想不到我们不到两个礼拜就批准下来了，而我们还没有开始呢！这么顺利，是神带领我们建立一个纽约基督家庭教会，虽然当时人数只有二十几个，但是我们觉得很成熟了，参加聚会的肢体，都要求每主日都有擘饼聚会，我们就祷告借用卢扬生弟兄的房子的客厅作为我们聚会的场所，也就是闽恩堂过去团契所用的地方，大家非常高兴，于是那天就开始聚会。很多人都来参加了，黄弟兄来讲道、张均弟兄、林鹤之弟兄以及闽恩堂好几个都来了。但是就在那一天，没想到黄老弟兄讲道完以后，他对我们说他要离开，看以后神怎么样带领，听到这里，我们都流下了眼泪。我不知

道说什么是好，原来黄弟兄有他很大的苦衷。因此会后我就与他进行长时间的交通。我们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黄弟兄就叫张钧弟兄负责了十个月，这期间教会人数增加了四十几位。以后张钧弟兄要离开回加拿大原教会，林鹤之弟兄对基督家庭教会也有负担，自愿参加了事奉，每月的第一主日负责讲台的事奉，每礼拜一的查经聚会。郑以勒弟兄也自愿参加事奉，每周第二主日的讲台事奉，我则在第三主日讲台事奉。林琦龙弟兄买了一栋房子，在市场街，他自己主动对我们说，愿意将第一层奉献给我们用，三年的时间不收房租。感谢主，我们教会人数已经增加了许多，卢弟兄的家已容纳不下了，于是我们就把教会搬到市场街这边。这边可以容纳大约一百人，但是主赐给我们的信徒人数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三十多人，有的只好站在走廊里。就这样又维持了一两年，人数还是在增长。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为建堂迫切祷告，但是我们的钱有限，建堂的奉献款只有十几万。我们看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适合的。有一个楼房我们看了很满意，但是要价六十多万。而且有一个买家比我们先与地产商联系，有卖也是先卖给他，我们只好作罢。到了三年届满，我们就开始付给林琦龙弟兄租金。有一天，地产公司来说，你们想买的那个楼现在可以卖给你们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生病了，年龄已经有八十八岁了。我就把职务交给王兴旺弟兄等执事会正副主席。到了买房子的时候，几位执事都来，说是要用我的名义来发函给大家要求奉献建堂基金，我同意了，并且我还两次抱病到讲台上讲奉献的道理，这样很快奉献就有了四十多万，但是还不够，于是就向信徒无息借钱，加起来有七十万，就买了那栋楼房。经过装修礼堂等总共用去了八十万左右。以后由于我病得更厉害了，脚也因旧病复发，不能久站，再加上我随孩子搬家到十一大道离市场街很远了，我就不能到那边事奉了。我既无法外出事奉，我们就在家里也建立一个大家庭聚会。有读经、查经、祷告、见证，参加人数不多，最多的一次有十五人。基督家庭教会和以后改为基督教会向联邦注册，都是我为President 所以，申请免税、开立银行账户等事宜，我都要出面。我退休多年，实际上是退而不休，神仍然安排我另外的事奉工作。

三十一. 创立福音录音带及小册子传道机构

十二年前，当闽恩堂刚刚开始，我在那里事奉的时候，有一位外州的姐妹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她是医生叫杨溢基，她有许多亲戚朋友在洛杉矶，都是福州人。不会听普通话，广州话、更不会听英语。她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将闽恩堂福州话讲道的录音带寄给她的亲戚朋友，我听她这样说就很高兴。虽然当时闽恩堂讲道录音，不一定是福州话讲的，许多是讲国语翻译福州话，也有讲福州话翻译国语。我就选了一些福州话讲道的录音带寄给她的亲戚朋友，他们收到以后非常的高兴。他们就在家里召集一些福州人信徒在家里聚会听录音讲道。以后这事就发展了，另外一个加州的很爱主的姐妹陈丽英，也写信给我说她那边也有这样的需要，希望我也寄福州话讲道的录音带给她们，我也寄了许多过去。一年多以后，我寄去不同地方的要福州话讲道的有三十多个人，甚至加拿大的都有。受这事启发，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同时想到大陆还有许多弟兄姐妹很需要福州话的讲道录音。我们几个人就祷告这件事，很清楚地看到；这是神家的需要是神的安排和神的托付，呼召我们在福音录音带以及翻印福音书刊寄到各地传福音的事上，成立一个组织。我们就商量成立什么组织的事项。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几个非常同心的弟兄姐妹。刘弟兄，他是负责大陆的，林姐妹负责布鲁克林工作站的，郭姐妹负责财务，还有邱弟兄负责外勤联络等，我们几位很同心于这个机构的工作，就向联邦申请注册了一个机构执照。这个名称就是“纽约福音录音带、书刊宣道”。我们请方利明律师楼申请，因为是教会的事情，律师楼免去了我们的500元的费用。十天以后我们获得批准，并且拿到了州政府发给的执照、钢印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立即着手进行这项事工。开头我们以福州话讲道录音为主，其次有文字的工作，如

福音单张、福音小册子。后来需要的人增加了许多，我们就征得一些有名望的牧师、传道人，如吴恩溥等，複印了他们部分的讲道文章、撰写的书刊，大概有几十种，装订成小册子，免费分发给有需要的信徒。同时我们还扩展到国语（普通话）的录音带。其中有国语翻译成广东话的，有国语翻译成福州话的，有的甚至是国语翻译成英语的。这项事工经过几位同工的艰苦努力，发展很快。东南亚的信徒也来要求我们寄录音带给他们。我们就想到在东南亚也应该有一个工作站。我们就征求马来西亚沙巴的一位萧牧师，1991年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接待过我，在那里有一个星期的培灵会。他负责的教会有八九个，他是会督。他的办公室设备齐全。他听我说要在他那里设立工作站，立即就同意。我们就买了一部录音带翻录机器，一次可以翻录五片的机器给他，然后我们就把要複製的母带和要邮寄的名单交给他，由他们那边办理、分发。这样就避免了东南亚寄录音带高昂的邮寄费和时间上的拖延，很受当地信徒们的欢迎。这样我们就有了第三个机构的分支——东南亚工作站。第二个工作站是在大陆，由刘弟兄负责。这项事工一直在进行着。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教会的传道人的讲道和书刊资料等，已经发展到用VCD光碟的形式录製发行，我们也想把这项事工加以改进，以适应新的需求。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十几年来，由我们机构发送出去的录音带有三十万带以上，翻印的书籍、小册子分发出去的（包括陈振文弟兄在香港印刷的或在温哥华印刷的福音真理小册）也有三十万本以上。这项事工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事工，这实在是神自己在做工，圣灵亲自动工感动许多人，因着我们分发的录音带、小册子，很多的人信主得救、很多的信徒得到造就，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

目前各地教会不仅录音带印刷品非常流行，甚至VCD等也很普遍。除大陆、东南亚、北美偏僻地区仍有GTBM机构的工作外，圣灵又为我们建立一带一（一带二、一带三、甚至一带五）布道小组，向未信主亲友、同学、同事、邻舍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他们相信、接受

主耶稣作他（她）们救主。今后GTBM机构将以较多的人力、财力开办传福音函授训练班工作。

2004年10月GTBM机构正式开始了这种一带一传福音的函授训练工作。参加函授训练班的人数已达100人。我们也收到好几位肢体来信来电，他们建议把一带一传福音训练班工作推广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和东南亚各地教会。GTBM机构正努力将这一事工开展得更加扎实，求主带领，也切望各地肢体代祷。



三十二. 纽约康宁大厦（团契）老人院传福音



我在康寧大廈老人院傳福音

1992年（那时我已经78岁了），我在闽恩堂事奉的时候，有信徒是从康宁大厦（老人院）来的老人家和护理员，他们要求我说，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能不能到他们那边参加一个聚会。康宁大厦的老人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有150人左右，大部分都是信佛教的，台湾、香港来的居多，信主的很少。我听到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就大大感谢主。我很高兴地答应下来，有五年的时间，我没有缺席过，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我都会提早到那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因为住在那边的有几个老人信徒，还有二十几个护理员当中，有三位姐妹很热心爱主。他们早就有这样的想法，邀请传道人到他们那边讲道。但是因为康宁大厦是政府管理的大厦，是不能有任何宗教活动的。但是有

一个助理经理是基督徒，非常热心，就邀请了十几位的基督徒去找经理商量，经理看到有这么多人来求他，就答应了拿出一个看电视的小厅堂，在礼拜五下午有一个小时给我们作为活动的地方。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了康宁老人院团契的地方。我到那里，开始的时候都是传福音，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推选出五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就像执事会一样。那时候选举许伯沃医生当执事会主席，他是广州的一个军医以后移居美国。他国语、英语都很流利。但需要预备，事先安排好，因此精力、视力等都有困难所以我就向执事会提出来，请他们另外再请人负责这里的事工。实际上闽恩堂那边也只有我和另一个传道人在负责教会的事务，我实在不能再到康宁老人院。另外我觉得在老人院事奉的人应该是年龄比较大的有一定经历的人，因为信徒都是七老八十的人，有老人的特点、需要和脾气。以后我就与执事会主席共同去请一个救世军的牧师，他是救世军的上校，是从香港来的。他做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安排不过来，也不能再来了。以后又去请了一个姓陈的牧师，也是香港来的，他是在《角声》那个教会刊物当义务工作人员。这样，执事会主席也兼做传道，与他一起负责这个老人团契的事工。不久，执事会主席被主接去，角声的陈牧师一个月来2次。到了2001年，我们就觉得也应该向政府注册登记，也请方利明律师楼办理申请事项。这个老人团契，我在那边事奉的时候，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有六十多个，现在人数少了一点。但愿主自己祝福管理，荣耀归给主。



三十三. 奉主的名祷告医病和赶鬼的经历

我信主得救之后，我相信主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祂有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的能力。我也相信主也给圣徒有某些特别的恩赐，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病赶鬼。但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在协和职业中学三年，在协和大学四年我都是跟在有恩赐的老师、高班的同学后面去医病赶鬼，同时我也不禁医禁药，不走极端。

1950年至1966年我在福州尚友堂担任主任牧师期间，教会里有一位老弟兄和多位老姐妹，他（她）们都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信徒中有患病到甚至医生不能医好的，被鬼附的到神经病院找精神病医生也医不好，这几位有恩赐的肢体就带我和女传道一起去奉主名医病赶鬼。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8月的第二主日，政府命令关闭所有的礼拜堂。1970年我和妻子被押送到建宁县深山劳改，两个月后大队64个小孩患麻疹肺炎并发症，我们被迫当起了“犯人医生”，并被告知，如果发生一个医疗事故，我们将会受到加倍的处罚。在这生死的关头，我们只有求告天父，禁食流泪祷告，恳求主赐我们有医病赶鬼的恩赐。这时我回忆过去主曾经赐我这方面的恩赐。在我信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协职二年后，那年冬天我放假回老家。我三兄的长女8岁，住进六都善牧医院已病入膏肓，一星期昏迷不醒人事。我跪在病床前，流泪求主医治，祷告结束后，我起身，她的眼睛睁开，过几天就出院回家了。我读大学二年的时候，坐骨神经痛发作，不能走路八个月，在福州协和医院治疗了两个星期，没有效果，只好赶回邵武上学，我有些绝望，有一天午休时间，我正辗转不眠的时候，就向神恳求，圣灵有微小的声音向我说话，读诗篇103篇，我马上翻开圣经103篇，读到第二、三节时，那些字特别大、也特别光亮。“祂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我相信；“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不相

信；“祂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我也相信。奇妙的很，圣经把我不相信的“祂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放在我相信的“祂赦免……”和“祂救赎……”之间，圣灵大大责备我不信的心，我流泪认罪悔改，完全接受那三句话的应许。我起来把桌上的三十几种西药、中药、草药都放入了字纸篓，同时向前走大声唱：“祂医治我，赞美祂名！我要歌颂祂的救赎，释放我脱离疾病，大能的主是我的大夫。祂医治我，祂医治我，祂有权柄医治，祂医治了许多人，我今相信祂医治我。”与我同房间的三位同学，两个信主，一个不信的，他们对我的举动感到困惑，都以为我有些神经失常了。但是后来我很轻松地与他们一起步行15分钟到北门的科学实验楼，知道了我经历神的医治的时候，我们都大大地感谢赞美主！

虽然如此，我的信心仍然很差，当我在尚友堂任牧师的时候，我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医病的恩赐。所以在建宁县被迫当医生的时候，感到十分的恐惧，因此我和妻子唯有默默祈求主让我被主使用，虽然通过医药，确是依赖主施行医治的恩赐。主垂听了我的求告，使我治好了那些患病的小孩。我在山区七年半的时间，靠主的恩赐，医治了8000多的病人，没有发生过事故，这岂不是神迹？！当我移民美国之后，主为我在海外开了传道的门，同时给我医病赶鬼的恩赐，使我见证了许多神迹奇事。



三十四. 基要信仰与现代派（不信派）的斗争

我信主得救重生以后，与魔鬼的争战和斗争一直没有止息过。1930年我还未上协和职业中学的时候，那时我还在社会上寻找临时工的工作，我也参加事奉和主日的聚会、布道会、培灵会，我也向人传福音，这时就有了争战和斗争。不过这种斗争有时温和有时紧张。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是一生都会有的。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种争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地进行着，因为这是属灵的争战。我们唯有依靠圣灵，才能攻破撒旦的营垒。在这种争战中我所能记忆的，都是主大大地得胜。

王明道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书中写道：“中国的教会同世界的教会一样的，都存在着信仰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发生在‘基要派’（Fundamentalis）与‘现代派’（Modernist）之间的。‘基要派’是信仰基本要道的，他们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信圣经中所记载的：基督藉童女降生，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各各他山上为人舍命流血，成就了救赎的大工，死后三日身体复活，出了坟墓，四十日以后被接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到地上，接祂的门徒，使他们复活、改变，得着属灵的、不死的身体，与祂自己复活后的荣耀身体相似，以后在地上施行审判，最后建立祂的天国。‘现代派’却对这些要道都表示不信，但他们不明说他们不信，却用一种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解释，来讲解这些要道。他们说他们并非不信这些要道，他们也信，不过他们的解释与‘基要派’的解释不同而已。”唯有基要派信仰的福音才会救罪人免沉沦得永生。感谢赞美主，当我在仓前山任教员时，教职员15名中，新派10名，非信徒4名，只有我一人是基要信仰。另外有一个寄宿在我们宿舍楼的女教师也是基要派信仰的。那时邻近的天安堂常有布道会、培灵会，

我对全体教职员说，你们都是老教师，我才18岁，由我每晚带学生听道，每日的早祷也由我带领，主日的聚会由我和寄宿的女教师带学生去参加。我们对学生甚至教职员、堂会的会友，总是讲救恩、传主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也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配合救恩的诗歌。到了年终70%的学生都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成了基要派信仰的信徒。

1955年6月全国各省市召开批判，控诉王明道反革命罪行大会。王明道弟兄因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书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也判了十七年有期徒刑。当时我暗中翻印了这篇文章100多份分发福建各地教会。基要派信仰与现代派信仰（不信派）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着。“三自会”负责人视察福建教会，我请求批准出版30万本新旧约圣经，与他有过冲突。1997年以来他推行现代派信仰，改造基要派信仰的运动。他的思想、言论集于《XXX文集》之中，是他的现代派神学导向。其最大的危害是所秉承的自由主义神学，更改了福音，混淆了真理；其次是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不加分辨的服从，无原则的配合政治需要，致使“自治、自养、自传”办教沦为空喊的口号。

为此我们一定要像王明道弟兄所警告我们的那样防备不信派。王明道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书中告诫并教导我们：“全国各大都市的教会中的领袖多多少少都知道中国的教会也像全世界的教会一样的有基要派和现代派的冲突。我这三十年来不断的用口讲，用笔写，警告教会防备不信派，（我这样称呼他们），敌挡不信派，远离不信派，又警告教会万不可与他们相交，万不可与他们联合。我不能看着这些人混乱主的正道，败坏神的教会。我拼上一切和他们战斗。我曾和他们战斗了三十年之久，如果我的主暂时仍不回来，我将要靠着祂复活的大能，继续与他们战斗。”



三十五. 我的盼望

感谢天父，赐给我九十岁的寿命，我年纪大了，身体差了，很软弱，我觉得有亏负主的爱，我也亏欠几个地方的教会。我在第一次去东南亚三个月，那时我答应他们那里的几个教会说，我至少还会再来一次、两次，也包括台湾、香港的教会，但是现在我是不可能了，我也答应加拿大的教会说我会再来，虽然这么近，也是不可能了。还有我从大陆出来时，许多信徒流泪要求我能再回去，我答应他们说假如是神的旨意，我一定会回去。不是长期的回去，而是多次的回去。但是我不能回去，主要的是我的身体，我连坐飞机都不行了，坐火车也很难。我对这几个地方的亏欠感一直在我的心里存留着、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着，特别是大陆的教会，三十六年共患难的肢体的主内情谊，使我永远难以忘怀。我只能在祷告中记念这几个地方，东南亚、加拿大、还有我们的祖国，但愿主还没有来之前大大地复兴各地的教会，特别是我服侍过三十六年的教会——尚友堂——花巷堂。据说现在这个教会很兴旺，千禧年圣诞节他们寄给我一个圣诞卡，上面写着：“福州花巷基督教堂主任牧师陈立福带领七百位一同事奉主的执事们还有一万两千个信徒，向老牧师祝贺圣诞喜乐，新年平安。”去年圣诞节前又收到他们寄来的圣诞卡，上面写着八百个执事和一万六千个信徒，恭贺我圣诞快乐。是啊，他们有很多的团契，很多的青年团契，很多的妇女团契、很多的老年团契、还有企业家团契和各种主内的团契，八百位执事又怎么能应付这么多的信徒的需要呢？我想今年一定要写上更多了，可能是一万八千个甚至是两万个信徒了。感谢赞美主！

有这么多的信徒，多么需要一个大大的礼拜堂啊！可是现在的花巷堂却因为扩建的问题而陷入了僵局，信徒奉献的钱，早已足够兴建一个容纳五千人的礼拜堂。可是政府说教堂占地的三分之一是政府

的，这完全是不符事实的。我听说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证明从解放前开始所有的房子、财产包括空地都是属于教会的，信寄给了福建省三自会的负责人，寄给了省宗教局，也寄给了省政府。我说假如需要我向卫理公会的总会（在纽约），索取以往的一切档案，我可以拿到，这些档案可以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教会的。这件事我们只有祷告在主的面前求主赐恩典管理花巷堂这个教会，一切荣耀归给主自己，阿们！写到这里，实在感谢赞美主！祂俯听我的祷告、祈求、花巷内的托儿所已于去年10月搬走了，占用的房屋已交还我们了，五千座位的新教堂不久就要兴建了。“当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梦的人。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詩篇126〕

我和貞娟計劃到美國半年還福音的債，然後回中國大陸繼續侍奉主的教會。但後來發生的事，我不得不留在美國：我和貞娟於1985年2月20日到紐約，住在小女Anne家。離開福州時計劃在北美三個月，以後用三個月的時間前往我少年生活，學習的南洋各國（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香港，台灣）還福音的債。一到紐約，我們前往這些國家或地區駐紐約的領事館或辦事處申請簽證。得到答覆：必須是美國公民方可申請簽證。（我們仍是中國公民，必須在中國申請）到東南亞各地的計劃只能暫時取消（直至1990年我成了美國公民才如願前往這些國家和地區還福音的債。）但神為我在北美開了傳福音的門，我先後前往加拿大十六次，到過美國十二個州領會。在紐約參與建立北美第一間福州話教會——紐約基督閩恩教會，義務任主任牧師六年，建立另一間福州話教會——紐約基督家庭教會，任義務牧師五年：我學習保羅，叫人不要花錢能聽福音。因此，我在教會的侍奉都是義務。

我不能按計劃回中國大陸的直接原因是：我和貞娟到美國五個月

后，应加拿大教会和亲友的邀请于1985年7月15日到加拿大的Montreal宣道会领会。20日凌晨爱妻贞娟在睡眠中蒙主召回大家，风雨同行四十三年，爱妻的突然离去仿佛将我击倒：我的血压升到极为危险的程度，心脏也出现严重的症状。我的儿女，亲友，主内的兄弟姊妹都劝我不要一个人回中国。

在中国大陆特殊的环境中侍奉主的教会三十六年，与教会众肢体风雨同行，生死相依的经历，将伴随我的一生。我从未忘记，1949年中国大陆教会面临重大考验的危难时刻，我放弃名誉，地位，和美国的舒适生活风雨兼程赶回中国进入教会侍奉时在主前立下的约。我时刻在心中纪念中国的教会和肢体。求主垂听每天在祂面前的祷告：眷顾，赐福给祖国大地的教会。这些年我身在北美，从未停止参与中国的事工。眼下中国社会道德沦丧，诚信扫地，遭遇最大的信仰危机。许多的有识之士苦于找不到能让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良方妙药而忧心忡忡。但我坚信中国的基督教一定比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无可比拟的强大的生命力，必将在中国有所作为，对中国社会有决定性的贡献。只有基督教能救中国！

1998年后我曾有过三次重病送医院抢救。每一次都是主全能的手医治了我的病痛。正如以前所经历的苦难，我坚信基督与我同在，并不是不会遇到苦难，而是祂与我同在苦难之中：在危难中有主同在，比在安逸中没有祂反而更安全。愿我一生中所得到的眷顾也临到每一位肢体，慈爱天父的手牵你我的手一同度过人生的坎坷，直到见主面。

让我借用新荒漠甘泉中的一首短诗结束我的见证：

忘记以前的不幸，忧患都已过去，

忘记流浪的遭际，抹去沉重记忆。

记得主的恩眷，助我渡过苦辛，

记得祂的医治，我心快乐难宣。

忘记一切的疑虑，不让信心遮蔽，

忘记阴霾的日子，悠悠不见白昼，

记得温煦阳光，有主慈爱照亮，
记得主的忍耐，赞美主恩无涯。



怀念主的使女、我的爱妻陈贞娟姐妹

承加拿大Montreal宣道会和从大陆移民来的四家亲人的邀请，我和妻子陈贞娟姐妹于1985年7月15日前往证道并探亲。7月20日凌晨主突然把姐妹安然接回天家。21日大、二小女两家由美国赶来奔丧，22日当地宣道会简牧师、陈牧师、陈长老主持了既虔诚又朴素的安息礼拜。23日我随小女们回美国。

经文：箴31：10-12，28-30；赛57：1-2；诗116：15；帖前4：15-18

经过多日的灵修，住在我里面的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最苦难时刻，时常给我启示，安慰和力量。再一次证明祂是永不改变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1. 作为一个基督徒，尤其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是遵行神的旨意且相信神的旨意总是美好的。主把她接回天家，关系到她在世生死问题。生命操在神手中，她的离世必然是神的旨意，我只有敬拜并默然顺服。

2. 文革期间当我们还是被管制关在深山里时，有一次她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神垂听她病危时的祷告，叫她起死回生。实际上她所求的，过了三年，神已为我们全家开了存活之路，大家都有了工作和经济收入，不要全靠她一人了。所以这晚年的7年寿命实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多增加给她为主作见证，且叫她的年岁达到70岁，因此我不应该有怨言和过份的悲伤了。

3. 就我俩适应日常生活而言，她比我强。近三、四年我经常对她说，同时在主前也一同祷告说，我俩都有暗伤明疾，如果主要接我们去，那就先接我去……她因体贴我而不加反对。现在看来，她因受过多年的创伤以致产生严重的心脏病，发展下去她要受更大的痛苦。

如果我先她而去留下她一人在世，势必十分可怜和难过，神是无所不知的，祂的美意本是如此，在她最快乐时叫她安然而去。她真像睡着那样安祥离去，停止了世上的一切苦难，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她。“我听见从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14：13）

4. 在我一生中有过好多位亲人离世，尤其在“文革”中，我也主持了不下百余次的安息礼拜，其间我也流过同情的眼泪，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悲伤、难舍。原来神也要我有这个经历好叫我懂得如何去安慰他人，同时也学习到如何从圣灵那里得到安慰和力量。林后1：4—5

5. 我俩交友二年，结婚43年，同甘共苦。其间她为我牺牲太多了，同时我也依赖她太多了。从今以后神要我专心依赖祂、仰望祂。世上最亲爱的人都会离去，惟有我的主永不离开。祂爱我到底，救我到底，保守我到底，祂是永不改变的主！“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来13：18）

6. 今后我不再挂虑她的疾病了，也不要担心她过多惦念亲友了（她的惦念也是36年来她所受的遭遇使然）。但是我们，特别是我自己，从今以后失去了一位有信心、有恒心和那样忠心祷告的战士。数十年来她一直坚持每日除三餐外，一定三次的祷告并提名祷告。她离世的那个晚上，她就是跪在床边祷告一小时后，然后上床在睡眠中被主接去的啊！

7. 我曾这样想，也这样盼望：她既来到美国，应该让她比较开心和自由地度过晚年。其实她的本性既不求物质享受更不喜欢游山玩水，她倒喜欢像马利亚那样安静在主脚边。如今在没有一点痛苦之下，主安然接去，在主怀中真正享受安息，其乐也无穷！

8. 神安排她在最美好、最理想的地方把她接去。在那里有十几位亲人，有属灵的教会，有虔诚而朴素的安息礼拜。如果在Pottstown或Jersey City没有别的亲友，没有华人教会，又没有经验，那是不堪设

想的!

9. 神还使用她的离世激励了许多同工同道更加爱主、更加热心事奉主, 更加警醒等候主。他们从大陆和各地来信说: “主快再来, 主真爱牧师娘而把她先接去而免去将来的患难。” “她是位福建省模范牧师娘, 她的脚踪是何等佳美啊。” “陈姐妹的一生都是充满圣灵的喜乐, 就是在文革受尽折磨中, 她也没有发过一句怨言。” “她的恒久忍耐众口皆碑, 叫撒但无从下手害她。” “她的笑容叫人从她得安慰, 得力量。” “陈姐妹在信仰原则上从不屈服, 而在物质生活上却愿付代价, 她是我们的榜样。” “我饿了给她吃, 我冷了她给我穿, 她真像天使深印我心。” “她是牧师娘, 我是女传道, 但在事奉上我不如她。我与她同庚, 我是否配得象她那样被主安然接去? 在陈姐妹身上我感到她是黄金、乳香、没药、她真是主恩爱的标本。” “贞娟弟妇是个坚定信心的基督徒, 她是个善良、贤惠、恬静、谦和的弟妇、好媳妇、好妻子、好妈妈。四十多年来作为家庭的纽带和支柱, 她是模范的牧师娘, 她也是优秀的教师, 她的一生堪称荣神益人的一生”。同时也叫我们的儿女们得到更深的造就和更大的信心。他们说, “妈妈一生是敬畏神、仰望神、依靠神的一生。” “妈妈于1966年‘文革’初期, 1969年‘清队’时, 1970年押送上山时, 以及1975年在山区心脏停止跳动时, 都有可能离世, 但蒙主怜悯留她活至1985年, 我们应该向神敬拜, 向神感恩和赞美!” “愿主赐安慰、刚强和感恩的心给我们, 好让我们在世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愿神赐我们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人前为神作美好的见证。” “愿主安慰我们悲恸的心, 更加亲近祂、依靠祂。” “神用灾祸压伤了我们, 却要用怜悯医治我们。” “这次看到神奇妙的安排, 我们深信妈妈已回天家去了。当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将会美丽的彼岸再相聚时, 我们都从主那里得到了满有指望的安慰!”

10. 十年前的今天, 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仰望主”。这次她说: “主啊, 赦免他们。”我们在大陆36年, 来美国虽只有五个半月, 有许多经历叫我们难过、伤心, 甚至埋怨。但她对我说: “我们

不能像主耶稣，但我们能学习司提反。主啊，赦免他们。”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徒7：60）是的，我不要难过，不应失望更不该埋怨。相反的，我应当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地说：“主啊，赦免他们！”

11. 胜过撒但的干扰。7月20日凌晨主接她回家,当地的牧师得悉后就来慰问祷告,并问我说：“明天（主日）你能如约讲道吗？”圣灵感动我要胜过撒但的干扰，我说：“我要去！”果然，我去了，那天圣灵感动了所有的人,我也觉得来到北美以来,没有像那天那么有能力，我自己也受到造就。是主的手亲自托住我,主得胜了,撒但失败了。回美国后,我也就继续为主作见证和事奉了。Montreal教会肢体来信说：“多年来没有听过这么有力量的信息，我们希望你接受我们的邀请于十月下旬前来参加第十届宣道会年会讲道……”我答应了。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归给祂。

12. 我是否配得让主安然接去或被提？七月十九日晚我跟贞娟姐妹同睡一张床上，她的灵魂被主接去，我一点也不觉得，通过这活生生的事实，圣灵一直在提醒我说我是否配得让主安然接去或被提？姐妹被主接回天家，正值她离世翌日，我守晨更，顺序读到以赛亚书57：1—2所说：“这义人被收去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各人在床上安歇”。因此，我要更加追求圣洁、更加儆醒、更加忠心事奉主。巴不得照恩主所赐我们的荣耀、盼望，在祂来时，坦然无惧地见主，我配得被主安然接去或被提，阿门！“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西1：4，5）“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弗4：4）“小子们哪，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祂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祂来的时候，在祂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约一2：28）“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4

: 17)

13. 奇妙得很，北美教会中已有三处教会想邀请我当主任牧师。但我不会讲广东话，不会驾驶汽车，尤其主要的我没有圣灵的感动和神的话语，我怎敢答应呢！目前许多福州同胞来到美国，我倒希望跟几位肢体在纽约市建立一个福州话聚会。由别的年长的肢体为负责人，而我在开始的三个月或半年负责讲台的事奉。贞：我们一到纽约就有人跟咱们谈过这个设想，您似乎也有这个感动且付出祷告，现在要等候神的时候了。

14. 去年以来收到不少国内外亲友和肢体的来信。有的是以教会名义寄来的慰问和祷告。他们对您的灵命，忠心事主、爱人待人，推崇备至、赞扬不已。他们对我也多劝勉和慰问，我实在感激！他们说：“师母的一生为主留下光辉的一页，那美好的仗她已打过了，当跑的路已跑尽了。这一切的一切都为我们的众信徒留下了好榜样。她的一生也见证了主的荣美，‘她也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来12:13）我们为她感谢主，赞美主。”；“师母蒙主召回天家，好像令人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神不会错，神是爱，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愿主耶稣亲自安慰您，满足您的一切需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与您同在、同工。加倍使用您，使国度一天天增长，神的旨意得以通行在地如在天，荣耀神的圣名。”；“惊悉阿贞姐妹被接回，安息主怀。悲痛之余深感万事临到我们均出于神的美意。在这没有安息的世代里，她息了一生劳苦，有工作果效相随是好得无比，因是永与基督同在。另一面更激励我们在这不多的余日为主而活，他日天家再会。”；“帖前5：9-11，送给您爸爸和辉美。我母亲离世后也很悲伤，但这节圣经叫我大得安慰想到亲人是睡着，活在天家，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神同活。”；“惊悉贞娟姐妹已回天家，我们全家万分怀念她。人生如梦，天家再见吧！”；“我们虽然热泪盈眶，舍不得一位慈爱的属灵母亲离开我们而去，但是她舍己为人，荣神益人的光辉榜样留给我们学习……我们主内肢体要学习贞娟大姐能凡事仰望主，做

醒自守，过着成圣，胜利的晚年且为忠心祷告的战士……。”“贞娟姐妹的生命非常秀美，真如荆棘内的百合花全然美丽。她是常常喜乐，脸上堆满笑容。凡同她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感到她的态度雍容和蔼可亲。记得抗战福州沦陷时，许多在将乐协职求学的福州及融岚同学，由于家乡沦陷而忧心忡忡，愁眉苦脸。当时贞娟妹妹正在协职，总是面带慈容好言安慰他们。难怪协职同学都说：“我们满腹忧烦，一见贞娟老师便云消雾散如释重负。”陈姐妹就是这样劝勉，安慰忧愁伤心的人。死是世人必走之路，一对夫妇生死总有先后。摩西在神前祈祷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月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活到八十岁。”（诗90：10）陈贞娟姐妹达到七十岁的年月。走完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的道路，打过美好的仗，跑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她存留，哈利路亚，赞美主！贞娟姐妹没有丝毫痛苦安然去世，这是神怜悯、恩待、喜悦的见证。她的为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提前：4：12）值得我们努力效法学习的。

15. 86年4月由陈荷生、林述琳医生夫妇宴请我和其他亲人，汽车先开到他们住宅取东西。我下了车，却身不由已呆立在门前，一幕幕令人心碎的情景历历再现：去年7月20日就在这座住宅里主把您接去……。我明知这是主的美意，但我肉体软弱，禁不住大哭一场。我的贞，您在乐园中一定看见我的眼泪，但您不会白流同情的泪，实际上您过去的眼泪主都已拭乾。就是我现在在地上，主也时时拭干我的眼泪呢。神对我们的眷顾是无微不至的！“您把我的眼泪装在您的皮袋里。”（诗56：8）

16. 86年1月20日是您离世半周年，我买了一束您喜爱的玫瑰花放在客厅来纪念您。大家都上班去，只留下我一人在家倍感悲伤，正当我伤心痛哭时，圣灵给我一个微小的声音说：“10年前我听您们的祷告，叫她已停止跳动的心脏又恢复跳动。已经十年了，难道您还不

满意吗？她的心脏病是如此严重，我叫她免去地上的疾病和痛苦，叫她回天家安息，您难道不乐意吗？人都有一死，您们总得有一人先走，她不过比您先走一步，您如果真爱她就应该欢喜神的美意，叫她先你而去免得她在世孤苦零丁。何况神今天给你的祝福实在比过去更大、更多，你应该多多数算主的恩典，叫你惊讶喜喜欢呼。”

17. 86年2月22日是我们结婚44周年。我不能不回忆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同甘共苦，同安乐共患难的经历：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当校长院长7年、出国留学2年、解放后36年，由于咱们是基督徒，特别是主的僕人、使女似乎我们所受的苦难特别多。但是我们得主的恩爱也特别厚。因此咱们也有特别多可纪念且是有意义的经历，时时处处都显明是神的作为，叫我们认识“你的旨意原是如此”。

18. 86年4月26日外甥女安娜在Montreal教会举行婚礼，盛况空前。如果您也能参加，是何等的美好呀！那天我成为最大、最被尊敬的佳宾。这叫我联想到将来在主的国度里在主婚筵上我在祂里面也会占有一席？这是何等恩典，我要靠主恩典，儆醒等候，忠心事主直到祂来。

19. 想不到我在加拿大遇见45年前的协大同学陈德能、谢秉刚、陈瑜英、郭农、黄仁昭，在纽约也遇许牧世、张柜槐、李一兴、高雄等。他们都是学术界、科技界权威，但他们又都是忠心、热心的基督徒。尤为可贵的其中陈、谢、高还是现任牧师呢。我们见面时是何等亲热、欢乐。大家都述说主的鸿恩大爱，同时同学们得知您的离世，还寄以同情的眼泪和哀思。

20. 上月我从Montreal去Edmonton，由于走错了路，及至机场时只剩下10分钟。办完手续又碰上因防“恐怖分子”为害，海关要对旅客进行严格检查。大家排长队，我心急如火，两步并一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及至登机后一分钟飞机就关了门并即起飞。这时我想到将来主再来时，情况可能也象这样。亲爱的贞，您已在主怀，您要先复活与主一同来到，而我还要努力奔跑，向着标竿直奔，如果能及时“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何等的福气啊！

伤心的人啊！我们的主知道你的忧伤和痛苦，祂知道你心灵的孤单，如何切望得到这世上不能给您的宁静。当你出去到你所爱的人的坟墓那里时，不要让你的眼泪阻住了你的视线，也不要把头低得看不见主基督已经行近来扶持你，听祂在坟墓边发出慈爱的声音：“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11：25）

你所爱的并没有死，她那信靠主的灵魂现在与基督住在天家；她的基督徒的肉身现在甜蜜地睡着了。复活大日来临，她要变成那不死的、荣耀的和不朽坏的。基督的爱能把她带进无罪无忧的天家，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21：4）你因此连接在一个超过世上的大爱里，这就是基督的爱，你将在这爱里生活到永远。把你的眼睛，从你属世的忧伤的景象移开，瞩目那有永远福祉的天家。基督曾经在坟墓里埋葬过，祂让坟墓变成馨香之地，让你所爱的人肉身可以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当你也来到坟墓中，你会看见这坟墓是已经打开了的，复活的主从坟墓里打开一条通道，通过裂开的幔子，通过那永远的天门，一直到达上主的乐园。你循着这条道路，行近那些来欢迎你的众天使时，会看见有位比天使，还光明的人，从她改变了形状的外貌，你会认得她，明白原来你并没有失去她，只是她比你先进到我们天父的家中罢了。——摘自新荒漠甘泉



传福音的经历和见证

我于1930年4月16日得救，重生之日起，第二日就向堂兄家传福音作见证，夜间就去市郊一个庙里教识字班，逢人都劝人信耶稣得永生。可能由于我过于“热心”、“恳切”被人视为疯子。以后念高中三年，小教一年，大学四年，大学工作一年，联合中学校长五年，福州协和医院院长一年，留学美国二年，共十七年均带职事奉。以后全时间事奉五十六年。有人为我统计，我靠主恩典领人信主数以万计。带人归主，一个带一个或是开布道会一次几个人，几十人，最多一次一百八十三人相信、接受主，都要靠祈祷，靠圣灵动工才有功效。

这次“一带一”传福音函授第一期训练班，我先提七次经历和见证如下，供参考：

（A）在福州尚友堂开新春布道会。

1949年8月3日我从美国学成回中国大陆福建省福州市。同月17日福州解放。我先在福建神学院教课。同时教会组访问团到福州年议会八个教区访问。访问团人员计八位，我担任佈道培灵事工，同年12月中召开最后一次年议会。我和十九位男女传道按立为正牧师。我被委派到城内花巷尚友堂任主任牧师。1950年5月第一主日举行送旧迎新聚会，由我讲道，参加聚会人数仅29人。原来前任牧师是卫理公会政治牧师兼任政府二、三种官职，且是不信派。他前后两任12年，把百余人聚会降至二十余人。悲也。

解放初期教会各种聚会、活动照常。故我建议仍举行新春布道会。我邀请各大学基督徒学生佈道队，春节期间无法回济南、上海、厦门等地过年的基督徒学生五十多位住进尚友堂。白天随带福音单张、海报、乐器到各教堂协助开佈道会，且在街上、汽车上分发福音

单张。晚间六点就集中尚友堂，把广播机挂到南街街口，由音乐学院同学奏乐、唱圣诗，讲见证。一部份同学则到大街、巷口邀请行人不分男、女都请来聚会。两星期的布道会，感谢主，讚美主，圣灵实在动工、感动了一千两百多罪人归主名下。其中八百多人都成为尚友堂会友。证明“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1:16）

（B）一个决心投水陪葬丈夫的女士得救

抗日战争期间，各省大城市的大学甚至有名的中学都迁入内地。基督教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也迁到闽北邵武县，（现为市）。1938年夏放暑假，来自上海、山东、江西、广东无法回家的同学多留校，其他地方来的同学多回家。那时交通十分拥挤，只能三五人分组的离开。我们一组三人，一人来自上海，要到福州他胞姐处渡假，一人回厦门，我则回靠近福州的闽清县。我们第一天从邵武乘长途汽车至南平一天，第二天乘汽船南下到古田县、尤溪县、闽清县及福州市一天，第三天由福州乘汽车到厦门一天。第一天从邵武至南平十二小时，我们三位，加上乘客二位也是基督徒也加入，轮流向车上乘客三十四人传福音。圣灵感动，有三位乘客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作他们救主。到站时，我们还邀他们到当地教会介绍当地牧师。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人赶到汽船码头，上船时已人满为患，我们三人只好站在出入口。厦门的弟兄先发现坐在台上一位白衣制服及白帽的护士。她左手拿起一把大红色的玫瑰花，右手拿一白色手帕拭眼泪，分明她十分伤心！我们三人揣测她应是南平人或福州人，所以另二人推我大声背诵马太福音11:28“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安慰）。”我又大声喊两次，当时社会是男女“授受不亲”。我不敢到她身边“寒暄”，尤其对一个伤心流泪的女士。我又大声的唸马11:28的经文，而且十分恳切。我们三人都看到那位女士把手帕拭乾眼泪，脸向着我们。我手指指着我们可否到她处传福音。她点点头，表示可以。三人已为了她流了同情泪，挤到她处，厦门弟兄说，让我们先为你祷告。他祷告得十分恳切，我们都应声阿们。我又大声以福州语，也向全船一半，五六十位乘客传福音说，世

上伤心流泪的事太多了，疾病痛苦啊、生离死别啊、家破人亡啊、天灾人祸啊、战祸连连啊……，说到这里，她大哭大喊，我们也陪她哭了，总有十五分钟。她对我们说：“我是福州人，高中是在教会办的女中毕业，以后读高级护士学校。我自以为书读得好，又是学校校花。一心贪爱世界，追求荣华富贵。曾听过福音，但我心硬如铁，不肯谦卑接受主耶稣作我救主。毕业后我来到南平市教会办的吐比哩医院当护士。碰上年轻英俊少将参谋住院，我亲自护理。久而久之，他出院后向我求婚。我一拍即成，且成为恩爱夫妻。结婚三年，生了两个男儿，且他正得上级器重升为中将。这次他出差福州，船下游至樟湖畔遇上洪水，且行岩石，船分成两半。汽船乘客2/3遇险。我的丈夫也死于非命。”她又大哭特哭，多数乘客也流了同情眼泪。“今天丈夫归天七七我以巧言巧语把两个小孩交婆婆照顾，说我跟勤务兵到丈夫墓场献花。婆婆信以为真。其实我是要到丈夫遇害处跳水陪葬啊！”她又大哭，一船乘客也陪她流泪。我又大声呼喊圣经话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的人免沉沦得永生。”“信主耶稣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上帝差祂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又大声呼喊说，我们在世上为何有各种各样苦难啊？原来我们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犯罪了。罪入了世界，世界的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是死。人有灵魂，身体会死，灵魂不会死，永远活着。故人死后灵魂还要受审判。这是肯定的。但是人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所以神仍爱世人，爱你爱我，所以差遣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降世为人，背负世人罪孽，为罪人受上帝公义的审判。被人钉死在十字架，流血捨命作我们的赎罪价就会赦免我们，洗淨我们。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救主，且得主耶稣的生命，就是永生。圣经说：“凡接纳祂（主耶稣）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了。”这是何等的

奇妙，罪人信耶稣作救主，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人说，我作上帝的儿女了，在世还会受苦难吗？会。但是我信主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永远不离开。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就是圣父的神、圣子的神和圣灵的神。主耶稣被钉死后，被埋葬。照圣经多次预言，祂要第三日复活，在世上四十日，以后升天坐在天父右边，为信徒祷告，作中保、作祭司，过十天按主耶稣的预言降下圣灵。圣灵与信徒同在，与教会同在。圣经明白告诉我们祂是安慰师、赐平安、喜乐、仁爱、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复活、能力……。圣灵住在每位信徒里面，我们还怕什么苦难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是复活的主耶稣和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告诉我们，祂已证明是神的儿子，已经胜过魔鬼、撒但、胜过死亡、胜过罪恶……。我们还怕什么呢？护士女士：今天你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作你个人救主吗？她点点头。你愿意请你举手，请放下。今天在这里恐怕有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这是你们的机会。你们也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吗？愿意的请举手。感谢主、赞美主，还有谁？感谢主，赞美主！总有三十几位。请上海弟兄领大家认罪、悔改祷告。……请厦门弟兄领大家接受主耶稣祷告。……我把带来写在大纸张诗歌张开，由我们三人领大家高唱：（1）真神实在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无论何人信耶稣，能免沉沦得永生。现在正是拯救时，耶稣愿意救罪人。奇妙救恩快接受，耶稣愿意救罪人。（2）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罪愆。主宝贝血真能洗我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今主宝血已经洗我心，荣耀归主名。（3）我们如今走这天堂的路。在这今生和那来生都得福。我要问众朋友到底你如何，肯不肯同走这路？请你来，快快来，走天路能得福。信耶稣实在好，主能救你我灵魂。我们如今走这天堂的路，在这今生和那来生都得福。我要问众朋友，到底你如何。肯不肯同走这路？

码头快到了，我们把“永生”福音单张分送许多乘客。我们三人也随护士上码头，并陪她流泪，由我作了短祷。护士姐妹把随带的

玫瑰花放下水里。我们看着它随水流流走。我们到岸上有个很好的交通，且有赞美、感恩、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告诉上帝。祂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彼此写了通讯处，且求彼此代祷。我们跟姐妹握手、仰望主，送她上上水船返南平……。

以后在通信中知道，她回家把今天的见证讲给婆婆听。圣灵也感动婆婆相信接受主耶稣作她个人救主。姐妹获得一笔很大的抚恤金。姐妹辞职带婆婆及两个小孩回娘家。她自己申请到福州女神学院求学三年。毕业后跟一位同班女同学到漳州自由布道。栽培两个儿子读教会中学，又继续读福建协和大学。解放前留学美国都获神学博士。现二家都居美国。姐妹二人迁居闽南一带广传福音，结果累累。86岁高龄，主接她安然回天家。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名！我们三人迟了三小时乘下水第三班船前往福州。

（C）中共卫生厅厅长得救

大陆山东、山西省比较早解放，所以有一批南下干部随解放军南下。其中一位20岁的党员卫生兵分配在某市当科员。因他工作认真、勤劳，不久就升为科长、副局长、省卫生厅副厅长、正厅长。厅内有位姓俞的护士长，长得很美丽又能干。她是信主的，主日常来聚会。有一主日聚会后，她来找我说：厅长向她求婚，我明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他追求很迫切，我又无法离开福建。说着还流了眼泪。这种情形我不好说什么，只好安慰她，为她祷告，求主为她开出路……。过两个月不见俞姊妹来作礼拜，据说她已与厅长结婚了。后来经过十几次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礼拜堂被关闭了13年。我和妻子也被押送深山劳动改造。1978年政府开始开放政策，几乎所有“犯人”包括我夫妇都从劳改队释放回福州、各县。我们尚友堂，福建省第一个于1978年8月恢复聚会。人山人海，高唱哈利路亚，赞美天上神。她又来见我，其实我已认不得她了。她自我介绍说她与厅长都已退休了。他患严重高血压、心脏病，住医院高干病房。她见到许多信徒都要找我，所以说让她明天上午九时来见我。我答应了。第二天上

午她真的来了。一开始就流了眼泪，承认自己灵性软弱。当时她跟厅长结婚……“但是三十几年来我蒙主保守，我是信主的，得救有永生的。我也曾多次劝说丈夫要信主得永生。他总是“若即若离”。现在病重住院已一个月多了。我请求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向他传福音。求圣灵光照他，认罪悔改信耶稣。”我知道宗教处规定不得到医院向病人传福音，更不能向党员传福音。我很勉强跟她去了。到达时，俞姊妹把我介绍给她丈夫。我发现他满面通红，说明血压很高。我作一些默祷后，我就为他背诵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他大发雷霆，喊着说：“你好大胆子，竟敢向我一个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传教。告诉宗教处，你马上就要坐牢的。”他的爱人即刻说，“是我请牧师来的。”我也说对不起，对不起，一面说一面两步当一步走开了。傍晚俞姊妹流泪来到我家，千对不起万对不起说着。我安慰她说我不会见怪。我心中倒很欢喜，因为算是我为主名受辱呀！过了两礼拜，厅长病情转危，俞姊妹又来邀我说，“两礼拜来，我禁食祈祷。求圣灵感动我丈夫肯认罪悔改，谦卑接受主。为主的爱，请你再跟我去……”。我们又去了，到了医院，遇见高干病房陈主任，他是医务界的名医。他见到我就走来跟我握手寒暄，厅长有气无力的对陈主任说，原来你也信教的呀？陈主任说我们三代都是、信主耶稣基督的。厅长转过身来，对我说，“上次牧师来，我对你很没有礼貌，很对不住。”我表示多谢。我继续上次读的约翰3:16。特别着重说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灵魂还要受审判……。神已经差遣祂的独生子来到世界。藉着主耶稣担负世人罪孽，被钉死十字架流血舍命。我们肯认罪悔改，主所流的宝血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现在请陈主任带我们认罪悔改，圣灵光照感动厅长流了很多眼泪。他自己也感到圣灵已进到他心中，满有喜乐，也满有平安。过两礼拜厅长出院回家，我送他一本新出版的新旧约圣经。听他太太说他在家每天祈祷好几次，读经10章以上，也学唱赞美诗。我应俞姊妹的要求，在我夫妇未出国之前一个月，到他们家三次交通，造就圣经的话语。最后在他们家瓷缸施浸。俞姊妹说，她的丈夫是名党员，不方便跟妻子一

同教会聚会，也学习旧约但以理。当俞姊妹离家去聚会，她的丈夫也拿了圣经、诗歌，跪在那个朝教堂的窗户，唱诗、祈祷、读经，等俞姊妹回家才起立。

（D）一个迷信头得救

1979年各地教会及家庭教会陆续开放。一个主日福州尚友堂来一个父亲领四人以竹床抬来13岁少年人，放在钟楼下。礼拜结束，我从台上下来，那位父亲和四个农民上前见我。我见了那床上可怜的皮包骨少年后，请他们到接待室。许多信徒也跟着。那位父亲哭诉着说：“我儿子13岁，一个月前跟一群同学到一间庙里玩，大概对菩萨不敬，回家后被鬼附着，不吃、不睡，且大喊大叫。我是迷信头，也曾行邪术、赶鬼、医病，故我也为他念咒，结果他越来越凶，且说我比你大，我比你大……。日夜如此喊叫，没睡好几天。邻居一家信教的，劝我快请刘牧师来为儿子祈祷赶鬼，他劝我先相信、接受主耶稣作救主。为了独子病危，我满口答应。其实我是口是心非，我也听牧师吩咐把我房里所有迷信品搬到天井烧掉。但我舍不得偷偷地把铜铸的佛祖和黄大仙像放在衣袋里。我也闭眼睛跟牧师和众教友婶婆等恳切祷告。真灵，我的儿子竟睡着了好几个钟头，醒后大吃大喝。这样有两星期，以后原形再现，比前更可怕。紧闭眼睛，停止呼吸似的，不理不动。牧师叫我马上带他去福州市立医院看神经科或精神科，也要到尚友堂。今早五点，我的四个学徒把他抬至码头乘汽船，再乘汽车到省立医院。体检两小时，说无病。只好抬来教堂先救……。可怜呀，牧师！

我向大家说，让我们低头作一个祷告。求主宝血遮盖我们，洗净我们。圣经说，“弟兄胜过他（魔鬼）是因羔羊的血，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的宝血先洗净我们，也洁净这个场所，叫魔鬼撒但，邪灵在这里没有地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注意：我们都是罪人，但你们五人更是罪人。你们还是迷信头，犯的罪更多、更重，作魔鬼的差役，害人害己，无恶不作。现在你们五人要先解决，解决你们的罪和住在你们身上的撒但、魔鬼。圣经告诉我们“除祂，就是主

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4:12）。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首先祂为人类担当罪孽，受神公义的审判，被钉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舍命。祂被埋葬，三日复活。因祂从死里复活证明是神的儿子，证明已胜过撒但、魔鬼，证明祂胜过死亡，也胜过罪恶。所以首先你们要先认罪、悔改，求主宝血洗净，求主赦免。今天就相信、接受主耶稣作你们每一个人的救主。不但如此，我们也有权柄作神的儿女，圣灵也永远与我们同在。同时撒但就完全逃离你们。主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能够得永生。”圣经又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灵魂还要受审判，永死，下地狱。”你们今天愿意认罪、悔改吗？你们愿意相信、接受主的救恩吗？迷信头痛痛哭，跪下认罪说，主耶稣阿，我们多年都是跟魔鬼为伍，屡次作恶害人、骗人、骗钱，我们真是罪大恶极，所以我儿子也犯了鬼。见儿子病得如此地步，我在神前说所有迷信品都烧掉了，其实我还偷偷地把两顶铜铸菩萨暗存起来。尤其我们作法时所靠的四个根基（水缸）仍埋在那个房间四角土里。这次回家一定挖起，统统打碎，并洗手不干。我也要劝我五十个学徒相信主耶稣……。我大声说，我们一同跪下认罪悔改，祷告祈求……。愿主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后一位信徒从钟楼下跑出来大声说：“快来啊，那少年醒了。”叫他父亲买龙眼炖鲜鱼。半小时都吃光了。围着的信徒一同大声唱“主断开一切锁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们送他至街口，叫他们到家要请当地牧师帮助。一个月后，从长乐信徒来报信：少年完全好了。他们也分别参加家庭聚会。哈利路亚，赞美主！

（E）北美福州人、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

陈霖先生一生崇尚个人奋斗，做慈善，抵制耶稣。圣灵动工，临死前三小时，皈依基督。

陈霖胞弟陈钟的亲家母林雪斌姊妹是虔诚、热心的信徒。移居纽约后一直关心陈家数十人灵魂得救问题。她的女儿是森美进口公司董事长陈霖的秘书。她告诉他说刘扬芬牧师是纽约唯一福州话闽恩堂

主任牧师。有一天陈夫妇请秘书打电话约我某日下午二时到金门客厅见面，且送一些款给闽恩教会作慈善。按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不能接受非信徒的奉献，作慈善是可以的，我按时往访。客厅摆设为迎嘉宾，我心感激。我们一见如故，就向他们传讲福音。由于我们都是英华书院董事，就提起校长、教师和几位传教士都是热心基督徒……。

他说：“当年宋尚节博士在天安堂领布道会。我全班同学都每晚参加，三十几位都信耶稣，就我不信。”他又说：“我为何不信呢？我最好班友黄仁山，绝顶聪明天才，数、理化全校最尖，恐怕也是全省最好。他如果有机会留学（意指跟他一样）必得诺贝尔奖学金。以后他信耶稣，大学一年后因抗日战争，全家迁去新加坡。黄仁山以后还作传道”。我说他作传道很成功呀，他两个男孩子都留学美国，跟他们的母亲都移居美国。不觉已40分钟了，我把随带的福音小册子和单张都送给他们，希望他们研读。英华校友倪玉隆夫妇来美探亲，我托他们前往公司向陈董事长传福音，结果他也不肯接受主耶稣。一个自认是个德高望重的好人很难接受主耶稣作救主。听林雪斌老姊妹几次电告：当他们唯一女儿，还是硕士，患肝癌接受第三期住院，亲家母要求陈夫妇同意我到医院为她祷告，他们拒绝。陈自己癌症，两次住院也不让我跟亲家母一起为他祷告。陈心脏手术也拒绝我去为他祷告。陈太也患癌症住院，也婉辞我去看她。这样硬心实属罕见。但亲家母和我们为他们祷告，求圣灵动起善工。陈第三次住院，医生诊断癌细胞已转移至全身，无法手术，也无药可治。只有一周寿命。他听后说，既然如此，我回家等死好啦。回家第六日，也就是他离世前三小时，他叫太太电话亲家母，转请我去给他传福音。亲家母电我家，时我正开门要外出。听到电话铃声又回来，接听亲家母的电话：“陈先生命危，希望你去他家祷告，半小时专车要到达你家楼下。”我说是神拯救他的时候了，我一定去。又半小时专车到达陈府，陈太带我见陈先生。他闭着眼，面如土色，蜷缩着，我轻声喊陈先生，他眼勉强半开表示欢迎。我即打开头一次念的经文，约3:16，用普通话一字一字的朗读后说，“……神仍是爱你！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

埋葬三日后复活。这证明祂是神的儿子，也证明祂已胜过魔鬼，死亡，罪恶。你现在接受祂作你个人救主，你就得救，就得永生。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你现在就有权柄作神的女儿，免沉沦得永生，请你相信，请你接受。我以右手按在你头上为你祷告。”我说阿们，他也跟着说阿们！七位站在一旁的男女都看见陈先生面貌转为微笑，且发光。其中有一位黑人特别护士，我又用英语背诵约3:16 “For God so lov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陈太带我离开前，我还举手向陈先生告别。我们经过厅，有个贴金观音菩萨，约两尺高是属于陈太的。故我对陈太说现在要轮到你信主了，陈太送至专车，握手告别。听说是晚八时陈弟兄十分安详的蒙主恩召回天家，过几天在一个洋人殡仪馆举行安息礼拜。我在亲友前为陈弟兄得救、重生作见证。哈利路亚，赞美主！

（F）陈霖太太范承顺女士信佛8年，临终前两天改变，随夫皈依基督。

2000年7月最后一个主日，我在纽约基督家庭教会讲道后，林雪斌老姊妹来电话说：“陈太肝癌三期，已昏迷住院12日，我要最后去见她一面，而且为她祷告。今天下午二点，我的亲家、小女、女婿开车前往，希望你 also 去，二点到教会接你。”我答覆愿意去，约一小时，我们到达医院。林姐妹女婿，金门食品公司经理陈希要我们先在大厅坐着，他先进病房看伯母情况如何。五分钟后陈希十分惊喜从病房跑出来说，“十二日昏迷，今日甦醒了，身体虚弱，亲友又多，刘牧师不可多讲话。”我们走到病房，里面已有陈太胞妹外甥、甥女、特别护士等。陈太精神尚好且表欢迎。林老姊妹抱住陈太说：“请刘牧师向你传福音好吗？”她微笑点着头说好。我请大家先祷告后说：“陈太，谢谢你在圣诞节给我教会送来一车快熟面。我还分一半给闽恩堂。你记得三年前我跟董事长传福音，且读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把祂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能免沉沦得永生。’他清楚得救了，你记得吗？”她点点头表示记得。还说陈

先生死时没有一点痛苦，面容显得十分慈祥。我又对她说：“宇宙间只有上帝是真神，只有祂独生子是唯一的救主，其他宗教都是伟人，都是信的人敬仰他把他当作神。像佛教的释迦牟尼、道教的老子、回教的摩罕默德、儒教的孔子，他们都是人，不是神，不是救主。他们自己也需要救主。惟有真神耶和華，惟有祂的独生子耶穌基督才是救主。祂降世，為人担罪，被釘十字架受神公义的审判。受死流血舍命、埋葬、三日复活成就莫大的救恩。教主因是人所以死了就不会复活，惟有是神才能复活。主耶穌复活证明祂是神的独生子，也就是神；也证明祂已胜过魔鬼、撒但、死亡和罪恶。所以圣经说，无论何人只有相信、接受主耶穌作我们个人救主，罪就得赦，就有永生，也就有权柄作神的儿女。”她又点头说，“……我现在就相信接受主耶穌作我救主。”我请雪斌姊妹领我们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穌作陈太个人救主，今天就免沉沦得永生，圣灵也即刻住在她心里，且永不离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说愿主与陈太同在之后离开。在路上，林老姊对女婿陈希说，“我想明天公司下班时，你再开车载我们来看她好吗？”陈希说，“下班一定有很多职工都会来看她，你还是跟刘牧师明天上午包一辆TAXI来看她。”我们同声说好，翌日上午9时我们包了TAXI来到医院。陈太精神也好，说话也更清楚。我们对她说，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因为主说“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耶穌）的人，就有权柄作神的儿女”主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因为你有永生了，实在感谢主赞美主！最后她对林老姊妹和我低声说：“我乐意奉献60万元建500人座位的教堂作为纪念我夫妇成为基督徒。”我说愿主悦纳，愿主祝福！过一个礼拜，也在她丈夫的殡仪馆举行安息礼拜。丧家安排我祷告和为她得救作见证。我也提起建堂纪念的事。后来听说她的谊女也是陈家财产授权人，也是她带领陈太信佛8年，知道谊母陈太改信主耶穌，十分忿怒、生气，特别那天，林老姊妹和我离开病房后，谊女邀请二个尼姑也到病房为谊母念经，被两个女中学生讥笑说，陈太已信上帝了，你们来作什么？推他

们离开。陈霖董事长胞弟陈琴博士代表到金门大楼（据说可值1000万元，陈太生前遗嘱送谊女和胞妹。）找谊女要建堂款，谊女说没有陈太的亲笔字就不能给。感谢赞美主，过了一年，我们教会信徒奉献了80万元，购买了市场街48A作为聚会所。

（G）大陆有个教会，每年有3000-5000新教友加入。大陆政府和“三自”不准教会设布道团。但有一间教会，过去留下的老布道团员三十几位，组织一个带一个传福音，新信徒增加很可观。2001年该教会寄给海外会友的圣诞卡，内容这样写：本堂XXX主任牧师代表12位传道人，70位职事（包括三个姊妹、正副主席、四个青年团契、四个唱诗班、十六个主日学、五个祷告团、四十个聚会点正副主席及13000多名会友向你祝贺……。2002年的圣诞卡会友不是一万三千，而是一万八千多名了。难怪要建5000座位的圣堂，主日聚会得分五次。可见一带一，走群众的路线是何等蒙上帝得祝福啊！）

先写以上传福音的经历和见证七篇。求圣灵感动我们从学习中得到造就。第二期函授训练班还要继续。

传福音、救灵魂是与撒但争战。我们必须靠祷告、必须藉圣灵动工，才能得胜。

红十字和红卍字

在一次战争中，某市的一个红卍字会，为了避免战火的危险，和保障自己生命的安全起见，就把他们看为宝贵的红卍字旗高悬于屋顶，使飞机容易识别。那些信靠红卍字会的男女老幼都以为悬了这面旗，就可能免去战火的洗礼，所以他们就若无其事地聚集到那里。

不料，事情竟出乎他们的意外：对方军队的飞机为了侦察敌情，偏在那座有红卍字旗的屋顶上空盘旋不止，避难的人们，都觉得诧异，惊慌万分，他们所倚靠的平安和保障，立刻变成恐惧战兢。

原来飞机看见那面红卍字旗疑为德国国旗，所以在那里盘旋侦察。及至军队进驻市内，才了解那面红卍字旗的真象；就令其急速除掉，并说：“它怎能代表救济的标志？反倒令人误会……”

他们是在某军的慎重作战下而幸免于难的。这面红卍字旗，非

但未能收到保护的效果，人们几乎因它而灭亡，这是何等令人可怕的一件事呀！

假设当时他们用红十字的标志，将如何呢？肯定地说，那就不至于弄出这样祸为福的事来了。

红十字虽是每个人见惯的，但它却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拯救徽号了。朋友！你晓得它为何被用为拯救的徽号吗？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所致！它是象征着流血牺牲，不是寻常平凡的！而红十字旗就不可能代替拯救的徽号了。

这就正如圣经所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必成为灭亡之路”。也正如俗语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一样。

朋友！你对这件事有怎样的体会？要求幸福、平安和快乐是古今人类所共有的希望，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然而你必须找到正路，否则，非但不能求得幸福、平安和快乐，反而要演出如上所述那样适得其反的恶果来。圣经上又说：“除祂（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朋友！你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是为了拯救你？祂肯作你的救主；不要疑惑，要接受祂，相信祂能拯救你，你便是一个得救的人。





1936年时任福州
培元小学教员



1937年6月贞娟
同大姐在协大



1937年贞娟摄于
福州鼓山



1940年与贞娟于福州
北门住家



1941年2月与岳母、大姐肖娟、贞娟在福州北门住家



1943年10月和贞娟、圣儿于闽清六都



1945年1月閩清天儒毓真聯中教職員及第六屆畢業生



1945年2月閩清天儒毓真聯中校長
樓前，我与贞娟手抱圣、辉合影



贞娟摄于1946年



1947年夏，扬芬、贞娟赴美途经上海与二哥全家摄于上海兆丰公园



1945年12月福州亲人于福州塔亭医院



1947年10月1日乘坐海燕
总统号客轮到达旧金山



1949年1月贞娟带小女儿Anne先行回国前于友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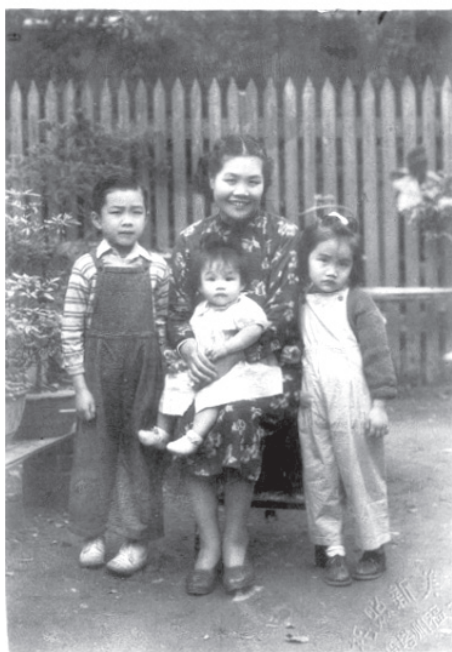
1949年春于
Nashville,
Tenn 住家



1949年春贞娟
与 Anne
于礼拜堂前



1954年4月福州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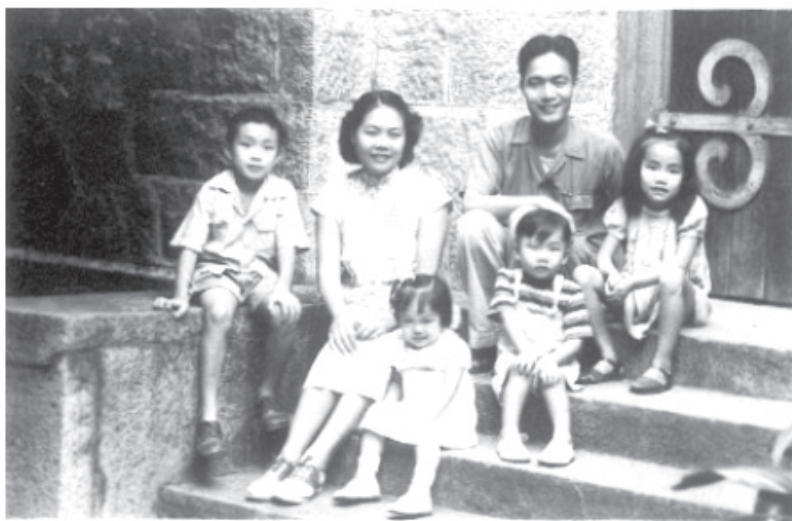
1949年4月于福州塔亭医院



1959年夏主内肢体于
福州基督教尚友堂



1964年夏全家于福
州尚友堂住家前



全家人1954年夏于福州基督教尚友堂



1969年全家发配山区农村前留影



1973年3月回福州探亲



1975年建宁均口卫生院



1975年建宁均口卫生院



1985年2月到达美国
于小女儿Anne家



1991年在诗巫与大姐、二姐相聚



与田雅各牧师、何晓东兄弟合影



1991年在加拿大领会

1991年在
菲律宾领会



退休在家製作福音录音带

